

文 革 語 錄

毛澤東：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1966年6月對越南胡志明談文革）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1966年6月對李志綏醫生談文革）。

謝富治（公安部長）：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1966年全國公安局長會議講話）。

鄧小平：文革死多少人？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1980年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談話）。

江青：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比較清楚了。好得很！（文革接見造反派講話）。

康生：部隊必要時可以發槍自衛。（1967年8月指示寧夏軍隊後，軍隊打死保守派一百餘人）。

張體學（湖北省長）：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你要死，怪哪個？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該！（1966年8月湖北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講話）。

——丁抒：《兩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死亡人數統計》

序

● 胡績偉

評價毛澤東尚待努力

文

革結束以後，對於這場長達十年、損失慘重的「全國內亂」，究竟應由誰負責？這個問題，全國人民一直在問，在想。當時的黨中央把一切罪責都歸之於林彪、江青和「四人幫」。可是經過十年的磨難，迷夢早醒和方醒的人們都不滿意這個結論。當時最樸素的意見是：難道「親自發動、親自領導」這場「偉大運動」的「偉大領袖」，就不該負責任嗎？

文革後衝破「兩個凡是」是一場批毛的艱巨鬥爭

老實說，「如何評價毛澤東」這個根本性的大問題，從「文革」結束以後，就為人們所關注、更加突出了。

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新黨中央，包括一大批各級領導幹部，不僅肯定毛是一貫正確的，而且還要繼續推行他那一套既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還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華、汪直接領導的寫作班子，按照「文革」時的老辦法，撰寫了一篇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命令全國報紙同一天登出來。社論的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甚麼是「綱」呢？就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當時，主持宣傳工作的耿飆說：「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甚麼事也辦不成」。

首先辦不成的大事，就是「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大批黨國元勳、老師、政治局委員、將軍和大量的高中級幹部不能立即「解放」出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新整治起來。因為這些領導人物被打成「反革命」，都是毛澤東指示和決定的。於是，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一批理論界、新聞界和組織部門的同志，首先站出來，為這些人鳴冤叫屈，發動了一場平反冤假錯案的鬥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效果。

這場鬥爭，首先從組織上衝破了毛澤東多年所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禁區，破除了毛的「兩個凡是」的框框。這一鬥爭開展下去，阻力實在太大，毛的禁令，很多人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這是因為毛在思想上、理論上的錯誤太嚴重，對毛個人的迷信程度太深。於是，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又開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逐步解除毛設置的精神枷鎖，這個影響就更為深遠。不僅是推動了平反冤案進一步更廣泛、更深入地進行下去，而且推翻了整個人民公社制度，開始了廣大農村的大改革。

我這裡想特別說一說當時文藝界衝破「兩個凡是」的鬥爭。文藝界一些作家創作了很多的

幾部以「文革」為題材的作品，像《渴望》、《於無聲處》等，反響強烈。當時領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胡喬木就站出來反對，他把這些反映「文革」題材的作品叫作「傷痕文學」。他主張不要再以「文革」作為文藝寫作的題材。他竟然說，我們年青一代，本來就是不知道「文革」的情況，這樣的作品一出來，反而讓青年們知道「文革」的情況，這就影響了青年對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他認為這是「衝著毛主席來的」。理所當然，他這禁令受到文藝界和思想界的反對。胡喬木所謂的「傷痕文學」，不只是指以「文革」為題材的各種文藝作品，還包括反映「文革」實際的報告文學和回憶錄等紀實作品，還包括採寫「文革」題材的新聞通訊和各種形式的調查報告。這些，只要是忠於史實，就不能不影響毛的「崇高形象」，不能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做人的道德品質上，有損於毛的「四個偉大」。

引起一場很大風波的是白樺的小說《苦戀》以及根據《苦戀》改編的電影《太陽與人》。這部小說所寫的主人公是一位高級知識份子，他在文革期間受到殘酷的鬥爭和百般污辱之後，在他痛苦地離開祖國時說：「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對這部小說和電影，首先發難的是《報告文學》雜誌的執行主編向中紀委寫了一個建議，希望限制發行和放映。他說這「是從十月革命以後，世界電影史上罕見的立場來對待社會主義祖國的一部很壞的電影」。

在這以後，報刊上出現了對《苦戀》和《太陽與人》的批評。《人民日報》對作品中主人公說的「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的觀點也進行了批評（只評論了觀點，未點明作品及作者）。大約在一個月以後，《解放軍報》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能違反》，對這兩部作品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

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以為對文藝界又要來一場「大批判」了。胡喬木立刻指示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編輯部認真研究以後，認為文藝批評應該說理，不能動輒就扣上政治帽子，不能重複「文革」中流行的大批判的辦法，拒不轉載。五月十七日，胡耀邦找文聯和文化部門的負責人瞭解和商量對《苦戀》的批評問題，人民日報文藝部的同志旁聽了這個討論。會上反映，有的有權勢的人主張給白樺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然後在全國展開批判。胡耀邦很堅定地說：「中央不同意這樣做。我們決不輕易把一個作品說成是毒草，也決不給作家戴上甚麼帽子。不能採取過去那套做法」。

這樣，儘管胡喬木幾次催促為何不予轉載，人民日報答覆說，我們不同意那樣文革式的批判，人民日報自己另寫批評的文章。胡喬木為此向鄧小平告狀，鄧找周揚（文聯副主席）、張光年（文聯書記）、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和我談了一次話。鄧問我為甚麼不轉載軍報的文章？我說，對《苦戀》的錯誤，我們主張批評，但不主張像軍報那樣採用「文革」式大批判的批法，所以，我們自己另寫一篇，不轉載軍報的文章。鄧當場指定由周揚、張光年負責組織人撰寫，文章寫好後，先由文藝刊物登載，人民日報再轉載。

這樣，雖然阻止了一場文革式大批判，但是，從此以後，極左勢力對思想文化戰線的控制更嚴了。以「文革」為題材的文藝、新聞和調研作品就很難發表和出版。一九八三年批「人道主義」，一九八四年發動「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辭職，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又被罷黜，直到這年「六四」大鎮壓以及因此而開展的聲勢更大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樣，這類反映文革歲月的作品就更難見天日了。

文革的一切暴力罪行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國外一些報刊和出版社並沒有忽視文革史料的搜集和出版。即將出版的《文革大屠殺》記錄了「文革時期」這個極權專制統治下的種種暴行，若干怵目驚心的事實真相被揭露出來，詳實地公諸於眾。

這事實的揭露，在全面評價毛澤東功過的天秤上，在「過」的這邊，又增加了一個砝碼。

去年七月，《開放》上刊登的《道縣大屠殺》，駭人聽聞。在這之前，我先後聽過關於雲南解放軍血洗沙甸回民村的慘案，內蒙殺害所謂「內人黨」的大血案和廣西吃人肉的慘案，但都沒有看到真實的詳細材料。《文革大屠殺》這本書，收集了道縣、內人黨等等暴行，為讀者提供了較為詳實的歷史資料。

宋先生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說：「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學者魏昂德教授和他的助手蘇揚博士，對六十年代以來數千種縣誌作了統計，發現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決不是一九六六年興起的批判資反路線、中共各級政權癱瘓時，也不是在一九六七年兩派武鬥中，相反，是一九六八年各級革命委員會廣泛建立之後，是以新的國家機器的名義進行公開的暴力和屠殺。」

編者告訴我們，這些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並不是發生在「文革」初的無政府時期，也不是兩派武鬥時期，就是說，並不是「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為非作歹所造成的惡果，而是發生在一九六八年最高領袖指示解放軍支「左」，「軍宣隊」進駐各機關、各單位、各級政府奪權、建立起一個一個、一級一級的「紅色政權」以後。

這就是說，「文革」中的各種慘無人道的罪行，是在無產階級全面奪權以後，是在「紅色政權」下公開進行的，正如宋先生的序言中所說的：「簡言之，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的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

說得很對！這些都是毛澤東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大革命行動。」因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決議》中，就不能決定：「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應負上主要責任。」

我以為，不能把「文革」的一切罪責都推到林彪、江青和「四人幫」身上，主要的責任者是毛澤東。當然，嚴格說來，也不能完全由毛一個人負責，因為很多都是一個黨一個政權的決定，但毛畢竟是當時「決定一切、統帥一切、指揮一切」的「四個偉大」的最高領袖呀！

對毛的評價，官方的意見是「三七開」，「七分功績，三分錯誤」。很多人不同意，認為應當倒過來。民間暗中流傳的評價，就更尖銳。毛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認為應該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有的人說，毛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老實說，對這些結論我都以為並不是完全科學的評價，因為這也只是注重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文革」中的毛澤東，不是對毛的革命生涯所作的科學地、全面地評價。僅僅從時間上劃分，的確有一個前期後期之分，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之分。當然這也不能機械地劃分，前期就完全正確，後期就完全錯誤，這都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既要看到主流的方面，也要看到非主流的方面，這就突出了全面評價的重要，這裡要強調的是科學的，是全面的，也才是公正的、合理合情的。

鄧小平繼承毛的獨裁專制，也否定毛的路線政策

這些年來「全面評毛」的意見、呼聲很高。據傳，鄧小平曾經提出過「科學、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主張。據說，鄧當時還說，這個問題要放一放，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現在一晃又是十年，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因而在幹部中，對這個問題的議論又多起來。

鄧的一生確有完全不同的兩個方面，既有很光彩一面，也有很不光彩的一面。從他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來：「文革」以後，在他初步鞏固最高領袖的地位後，提出了以「堅持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四個堅持」，因為其他三個堅持，都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四個堅持」實際上就是「一個堅持」——「堅持毛澤東思想」。據說，這個報告是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四個堅持」的主意也是胡喬木為他設計的。總之，鄧提出「四個堅持」，為胡喬木那些極左人物早就想把中央的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反右為主的方針提供了權威的根據。從此他們就把「四個堅持」作為「四根棍子」來打擊那些反對「兩個凡是」，堅持改革開放的人。這以後一系列的「反對資產自由化」的反右運動，就是以「四個堅持」為旗幟的。

其次，在鄧的個人迷信極度膨脹、也成了太上皇的時候，他還是繼承了毛的獨裁專制的暴力統治，悍然罷黜了我們黨歷史上兩個最好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時的學生為哀悼胡耀邦，開展了反對貪污、爭取民主的遊願鄧竟然調動國防軍進京，宣佈國都戒嚴，以至命令人民解放軍武裝鎮壓學生，釀成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這不僅阻撓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為他自己的晚年留下一個可悲的污點。

不過，這只是他不光彩的一面。他的確還有相當光輝的另一面。

「文革」以前，就不去細說了。「文革」以後，歷史事實一件一件地記在中國人民的心裡，鄧小平支持平反冤假錯案；為衝破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路線，起了促進作用；他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衝破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理論路線，起了促進作用；他否定了幾十年來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總路線，確定以建設社會主義為中心的總路線；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他堅決支持農村改革，破除了人民公社體制，促使八億農民得到第二次解放，促進農村經濟大發展，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他贊成建立深圳特區，主張在沿海建立五個特區，大膽學習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推動了對外開放的新局面；他作出「一國兩制」決策，大膽保留香港、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他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特別強調黨政企分開、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和各種特權現象；他支持否定急於越過新民主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確定我國現在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他破除姓「資」姓「社」的老框框，大膽提出廢除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大膽推行市場經濟等等。

鄧在一九八六年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當相互依賴、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戰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可惜，鄧這一重要指示，至今也未得到落實。

這一件一件，都是否定毛澤東路線、方針、政策及思想理論方面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敢想敢幹的決策。鄧的「全面評毛」的思想，醞釀了整整了十年。據我所知，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後，中央考慮作出《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時候，他在起草小組的幾個人的小會上，談了他對這個決議的設想，其中，對毛的評價提出「成績講夠，錯誤講透」的八字方針。我雖然不是起草小組

的成員，但我當時是中央黨報的總編輯，列席了這個小會。他這個話我是親耳聽到的，印象是很深的。可惜以後，受到極左勢力的反對和阻撓，鄧自己也動搖搖搖，最終寫成的決議，對毛的評價沒有貫徹他的「八字方針」。我以為：在十六大的時候，第三代領導核心，對「全面評毛」的重要問題，到了應該解決的時候了。

《開放》出版社決定出版《文革大屠殺》一書，約請我寫一篇序言，看了宋永毅先生的文章，激起我的舊思新感，就趁這個機會向本書讀者，簡單說說我的想法，供大家參考。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胡績偉：前中共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現居北京

序

◎ 徐友漁

還原和再現歷史的真實

從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歷史中最為怪異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方面不斷發生大規模的清洗、鎮壓、殺人、處決，另一方面真實發生的事件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幾乎不留痕跡，當事人和目擊者緘口不言，史書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傳，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歷史。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這是大多數中國人都承認的，但文革中曾經發生多起大屠殺，這卻是許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的官方史學不願面對的。宋永毅君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將中國當代史中最殘暴慘烈、令人不忍卒讀，同時又被掩蓋的一頁展現在讀者面前，就宋君而言，這是對中國史學和歷史本身的一個貢獻，對大陸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機。

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

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視無睹，這是另一重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恥辱。中國人的心靈似乎不適宜在善與惡的絕對性和對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們寧願苟安於當下的日常生活而不願正視過去的苦難，當需要弄清事實、明辨是非、追究責任時，我們慣於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儘管如此，掩埋歷史的罪責不應該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尋找，因為人們的淡忘不僅出於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壓制、威脅，感到恐懼。在中國，說出真相是再困難不過、再危險不過的事。

也許有人會說：「官方不是也對文革作全面否定了嗎？」是的，官方曾經有過這樣的表態，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期左傾錯誤路線」同時又要「堅持和捍衛作為革命的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種表態。不錯，大陸也批判過文革，但從來沒有涉及到最根本的問題即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和言論的權利、個人尊嚴、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利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大陸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本書記述的事實發生時的同一政權和同一制度之下，所以，一個最著名的左派理論家在反對批判文革時一語道破天機：「說到底，文化大革命畢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污點。」

文革中發生大屠殺，並非偶然事件，並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失控產物。殺人，並不輕而易舉的事，文革中殘忍地殺人、滿門抄斬、大批地屠殺，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支撐，沒有物質條件，沒有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成了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漠視生命。毛澤東多次說——對印度總理尼赫魯說，在莫斯科共產黨、工人黨大會上說，在中共

的會議上說——核戰爭並不可怕，全世界人口二十幾億人，死掉一半還有一半，即使只剩三分之一，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有甚麼不好？毛把文革說成是改朝換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領導的上一次革命，以數百萬人的生命換來一個新政權，這一次他又準備以多少萬條生命貫徹他的意志、實現他的目標呢？我們不知道毛的具體打算，但毫無疑義，他對成千上萬地死人毫不懼怕，就像他對幾年前因為他忽發奇想「大躍進」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而不為所動一樣。相應地，受他蠱惑的文革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也不會在鮮血和屍體之前卻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中有以下文字：

一九六八年五月，陝西省某縣發生第一次大武鬥，一派紅衛兵組織用步槍和迫擊炮打敗對立派，對方死五十人。戰鬥結束，當勝利者看到遍地死屍時，嚇得心驚膽戰，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本派一個成年人提醒因開殺戒而手腳無措的學生：「打得好！必然要打，毛主席剛有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學生們一聽，立即從驚惶不安變得理直氣壯，原來自己打死人屬於打國民黨！於是開慶功會，頒獎受獎。我的被採訪者告訴我，心理上越過了這一關，以後做甚麼事就無所顧忌了。」

毛澤東對於文革中大批殺人不僅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且命令軍隊「武裝支援左派」

，文革中許多地方發生軍隊向群眾開槍事件，就是在「武裝支左」的指示和口號下進行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命令軍隊發槍給一派組織，使其得以放手對另一派實施武裝攻擊，也迫使另一派從別的部隊或兵工廠搞到槍支彈藥，以殺人對殺人。對此，毛澤東輕鬆地、甚至興高采烈地稱之為「全面內戰」。

文革中的大屠殺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評價文革迴避不了的話題。當這方面的史實披露出來之後，一切對文革的辯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腳了。

有人說，文革是毛澤東為了實現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會實驗，這個實驗失敗了，但毛的出發點應該肯定，文革精神將永放光芒。憑甚麼應該相信毛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輕的左派引證毛的語錄，引證文革中《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及文章。但是美妙動人的言辭能夠遮蓋屍骨和鮮血嗎？難道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可以根據當權者的自我標榜和宣傳？果如此，希特勒的辯才和鼓動力比毛澤東不知要強多少。退一步說，如果實現一種社會理想帶來的是大屠殺，這種理想的價值何在？如果有人願意為這種殘忍的理想捐軀，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讓成千上萬的人當犧牲品，那就未免太異想天開了。

有人說，批判和否定文革不過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場上發言，文革確實傷害了一些人，但遭到衝擊的多半是當年養尊處優的官僚和待遇不錯的知識份子，老百姓並不是受害者。但看過本書之後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殺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慘、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劃為異己份子的各類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而屠殺者、施虐者除了軍隊，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種紅人、積極份子，特別是掌權者的子女。實際上，持這種觀點的

人自己就是片面的歷史知識的受害者，他們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殺和類似的事情，不知道殺人者，施虐者和被殺者、受虐者到底是些甚麼人。他們所閱讀的只是文革後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憶與控訴，他們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這些東西，這是不錯的，他們錯在把這些東西當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個年輕的左派知識份子，他沒有經歷過文革，在美國讀書和任教，在文革發動三十周年祭日發表文章說：「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我希望他認真讀讀《文革大屠殺》這本書，想想文革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下發生的一切，再考慮自己還能不能堅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無知或一廂情願使人天真，天真有時顯得可愛，但天真到為浩劫辯護，挖空心思尋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

我知道，在出版《文革大屠殺》一書的同時，由宋永毅君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也將出版發行，這是多位學者為海內外瞭解和研究文革嘔心瀝血、耗時多年才完成的基礎工作。我希望宋君及其合作者再接再厲，為復原和再現真實的歷史繼續作出貢獻，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人參與、關注、支援這項工作。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革研究者，發表《形形色色的造反》、《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組織》等著作和論文多種，二〇〇二年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奧洛夫·帕爾梅客座教授。

前言

◎ 宋永毅

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

文

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和大屠殺，不僅是中國官方至今竭力掩蓋的歷史，不幸還是中國知識份子在無意中扭曲了的歷史。在文革後稱為「傷痕文學」的大量作品中，人們看到的只是所謂的「紅衛兵」或「造反派」在為非作歹。久而久之，人們的記憶中便只留下了這些極為抽象模糊的「紅衛兵」或「造反派」。他們成了暴力和殺戮的唯一罪人，承擔了本來主要不應當由他們承擔的歷史罪責。而「紅衛兵」或「造反派」又幾乎被描繪為所有的青少年和群眾，如此邏輯地推理下去，文革中自然是人人有錯和人人有罪。這樣，文革發動者和普通參加者的責任便在無形中劃上了等號；因與果，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歷史研究界限也變得模糊了起來……

二〇〇一年七月在紐約召開的紀念文革發生三十五週年的紀念會上，一個年僅十三四歲的、在美國長大的華裔中學生在聽了北京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紅八月」血案後提問：「當時的北

京有沒有政府？是誰允許這些老紅衛兵殺人的？」全場先是震驚、愕然，繼而爆發出一片掌聲：這個從小在法制社會長大的少年的問題如同一個鐵錘般的巨大問號沉入思想之海，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文革初期「紅八月」血腥恐怖之因來自中共高層

就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色恐怖」而言，表面上看來，主要的形式是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在校園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所謂的「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十萬守法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非常不完全的統計材料，當時的北京就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被抄家搶掠，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一時共有約四十萬居民被「遣返」到農村和邊遠地區。①然而，僅就「遣返」而言，今天所披露的一些歷史檔案表明：這是中共早在一九六二年就開始策劃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的繼續。當時的市長彭真就公開講過，要使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要把所謂「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②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發佈前夕，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③在五月十六日正式揪出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這個工作組採用了一系列的「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五月十八日起便調動六十三軍的

一百八十九師和六十五軍的一百九十三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和所有的宣傳機關，由傅崇碧出任衛戍區司令外；由公安機關出面，大規模地遣返驅逐所謂「成份不好」的居民也是工作組的長期計劃之一④。這便不難理解：為甚麼「紅八月」中老紅衛兵對佔北京總數百分之二的居民的抄家、殺戮、遣返得到公安機關如此大力的支持。這個「首都工作組」的副組長、公安部長謝富治便公開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那些事」（指紅衛兵的亂打亂殺）；相反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⑤在本書中所收的《文革初期紅八月暴行：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血案》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民警羅××主動引來了本來根本對韓模寧一家素不相識的紅衛兵對韓家進行了血洗，殘殺了五條人命。盡管片警羅××毫無疑問是那地地區的國家機器的代表，但沒有上面的指示和精神，他是絕不敢造次的。羅××背後是誰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或許，另一個「紅八月」血案更能說明國家機器對「紅八月」殺戮的決定性的指導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攬桿市附近廣渠門大街一百二十一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不僅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作了反抗，便當場被活活打死⑥。李的反抗又被周恩來在不久後接見紅衛兵的講話中點名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又是周恩來下令，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以「行兇殺人」的名義，由北京市法院判處劉文秀死刑。其實，就連當時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行兇殺人」。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協調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抄家——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得到了國家機器

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⑦。這一血案後來被老紅衛兵譽稱為他們反抗了階級敵人「階級報復」的「攪桿市前灑碧血」事件。又以此為名，掀起了新的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

李文波夫婦血案在一九八一年當然已經徹底平反，但當時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正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據一位大陸學者今天的調查，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了李文波家^⑧。如果考慮到「紅八月」中在北京主持殺戮、驅逐近十萬守法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都得到過周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祕書長）、許明（國務院副祕書長）、李夢夫等人的修訂^⑨。任何人的腦中都不難想像到這些血案深藏的內幕：中共上層早已經定下了所謂「淨化北京」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計劃，一九六六年八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只不過是他們審時度勢地利用來打頭陣的法西斯「衝鋒隊」而已。

一九六七年初，因為「老紅衛兵」也被中共拋棄，不少人還成為「聯動份子」而入了大獄；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十萬居民便不斷上訴。三月十八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就此發了一個通行全國的文件：《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在這一後來得到中共中央以一九六七年一零一號文件轉發全國的通告裡，仍然堅持所謂「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也從反面說明了對北京守法居民的抄家驅逐早已經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決策和預謀，而不是甚麼紅衛兵的一時過激行為。

濫施暴力的兇手大多是軍人與黨團骨幹

對於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殺，還有一種流行的錯覺是：這些大都發生在造反運動興起而造成「無政府」時期，殺人者大都是所謂的「造反派」。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蘇揚博士對八十年代以來的數千種縣誌作了統計，發現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決不是一九六六年底興起的批判資反路線中共各級政權癱瘓時，也不是一九六七年的兩派武鬥中，相反是一九六八年各級革命委員會廣泛建立以後，是以新的國家機器的名義進行的公開的暴力和屠殺^⑩。

（如果對他們的卓越發現有所補充的話，那就是：就全國著名的大屠殺案而言，濫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兇手大多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他們毫無疑問是中共國家機器最主要的代表。）簡言之，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而已。以遇羅文先生的調查報告《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為例，時值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新市委成立不久，各級縣委更沒有任何變動，這不是一個權力的真空期。據今天可查的檔案材料顯示：這一屠殺源起於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議。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一講話的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開號召公安幹警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其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刻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

的計劃^⑪。據遇羅文先生調查，大屠殺興起直接受到北京紅八月殺戮的影響，而直接的指令則來自縣公安系統——中共國家機器的最重要的部分。組織殺人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都是民兵^⑫。這種實際上由公安系統策劃的對所謂的「階級敵人」亂打亂殺的現象，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中國農村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的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等政治運動中。

這一不應迴避的歷史史實在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的大屠殺中再一次得到印證。在道縣的大屠殺中，組織者是穿軍裝的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等人，執行者是各區、各公社的武裝部長和武裝民兵。至於廣西賓陽的大屠殺，更是由軍代表兼縣革委會主任的王建勳直接指揮公檢法系統和當地駐軍一起進行的大屠殺。而在一九六八年廣西以所謂執行中央「七三」、「七二四」佈告對反對派「四二二」的武裝大剿殺中，除了數萬奉命殺人的軍人外，最積極殺人的竟全是共產黨員。僅據後來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統計：「據後來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二萬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九千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一萬九千多人」^⑬。請注意這裡的行文措詞，這還僅僅是一種「不完全统计」，就有近四萬六七千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歷史史實是，就全國著名的大屠殺血案而言，被殺者除了所謂的「黑五類」外，大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廣西一九六八年被剿殺的近十萬冤魂大都是全省的造反派，湖南道縣縣被殺的除「黑五類」外的群眾也都是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單純的受害者。相反，他們對一九六六年批判資反路線中的暴力和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的武鬥自有他們的責任。但是對所謂「走資派」的批鬥，即便有些

有嚴重的暴力傾向，畢竟還不是類似道縣、廣西、內蒙那樣的以謀殺為明確目標的屠殺。就武鬥而言，雙方都擁有武器，都至少還有參加或退出的自由。這和弱勢群體被強大的國家機器宰割殺戮有極大區別。指出這一點更不是說文革中的造反派有比由黨團骨幹組成的保守派更高的覺悟，實際情況是他們很少有掌握國家機器屠殺別人的機會。文革中的造反派大都出身不好、成份複雜，本來就是中共國家機器的天然專政對象。在批判資反路線中，毛澤東打出人權牌發動他們造反，以剷除自己在黨內的反對派。一旦大功告成，除在所謂的「一月革命」中的少數省市仍允許有造反派掌權外，大都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鎮反」中便被軍隊作為反革命鎮壓。接著，造反派又都在一九六七年底一九六八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成為清查對象，而保守派則因為「根正苗紅」而被選入專案組執行專政。綜觀文革的全過程，造反派與中共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和專案組始終無緣。毫無疑問，如果造反派掌握了這一嗜血成性的國家機器，他們也可能作出上述的大屠殺血案來，但客觀的史實是在文革中他們更多地是這一嗜血機器下的犧牲品。這也就不難理解，在震驚全國、被殺了五萬餘人的內蒙古所謂的清查「內人黨」運動中（官方統計被殺僅一萬六千二百餘人），最早挺身出來反對的是內蒙古的造反派。因為他們有某種難以名狀的惺惺相惜之感。

作這一如是觀，也就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為甚麼保守派（和軍隊）在與造反派的鬥爭中常常同時大殺「黑五類」份子。而他們明明知道文革中的任何「黑五類」份子被當時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參加任何群眾組織，事實上他們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自然，中共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及黨團骨幹（保守派的主要成分）殺戮「階級敵人」是為了表現他們無可爭議的「正統性」。另一方面，在他們血統論的潛意識裏，確實認為出身不太好的造反派和

「黑五類」有某種「血緣關係」。因而，「黑五類」是對手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如果說文革中尚有根本無罪，甚至沒有一點錯的社會群體，他們就是所謂的傳統「階級敵人」——「黑五類」或「黑七類」。他們從來就是中共嗜血的國家機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處於更悲慘的境地。而他們的人數按百分之五的總人口計，也有三千多萬！由此可見，不加分析的文革「人人有罪」，「人人有錯」論是沒有根據的。

中共軍隊武力鎮壓造成眾多大血案

在各級黨組織一時癱瘓的情況下，中共的軍隊幾乎承擔了國家機器的全部職責。軍隊幹部紛紛成了各級革委會——新的國家機器的主要負責人。軍隊還軍管了公安、法院、監獄等其他重要的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中共的軍隊歷來是其國家機器中最保守、最殘暴又最腐敗的組成部份。在階級鬥爭中這支軍隊所有的，只是五六十年代亂打亂殺的「鎮反」的經驗。而毛澤東卻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異想天開地號召他們去「支左」，同時又賦予他們開槍「鎮反」的權力。在人民解放軍官兵的眼裏，由黨團骨幹、武裝民兵組成的「保守派」自然是他們要支持的當然左派，而膽敢犯上作亂的出身成份不好的造反派以及與他們有某種血緣關係的「黑五類」，自然是他們要鎮壓的「反革命」。文革中好幾個出名的血案，都是這樣造成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內蒙軍區領導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前面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內蒙古師院學生韓桐挑起殺戮。結果因為造反派的克制，這場預謀的屠殺沒有發生。但是，這打響了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平民的第一槍。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當時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准下，

調動十三個連的軍隊向在西寧青海日報報社中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當場打死一百七十四人，打傷二百零四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由湖南道縣縣武裝部的現役軍人出面組織，基層民兵執行，對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和「黑五類」進行屠殺：「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一千五百九十個生產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被殺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殺三百二十六人……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十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殺七千六百九十六人，逼迫自殺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另外，致傷致殘二千一百四十六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份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四類份子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貧下中農一千零四十九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四百一十一人。其中未成年八人二百二十六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⑭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十月，廣西軍區章國清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調動數萬軍隊，連同武裝民兵，對廣西反對派「四二二」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圍剿；同時在農村大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僅據今天的民間調查和在官方內部材料上可查的數字，被殺者就達十萬之眾。

自然，由於中共的軍隊絕對是黨的忠誠工具，他們還直接參與了另外一些類型的屠殺。如一九七五年春昆明軍區的「五個師級單位兵力不下一萬人」在中央的批准下，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屠殺，殺死「不下千人」，把整個村莊都夷為平地^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康生的批准下，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

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反對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一百零一人，打傷一百三十二人。自然，所有這些不實之罪在八十年代的「撥亂反正」中都得到了徹底平反。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必然會浮上讀者的腦際。那就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文革的發起人毛澤東對這些暴力和殺戮的態度。由於文革檔案至今被嚴密封存，我們至今無法看到毛本人對這些大屠殺事件的具體處理批示。而不少中共官方的回憶錄都說：毛一直反對武鬥和暴力。我們或許可以相信毛並沒有具體地指示那些士兵、武裝民兵去殘殺平民。但更為確鑿的史實是：毛決沒有竭力制止，相反是在客觀上縱容了它們的發生和發展。僅舉幾例就能說明毛的責任。首先，自六十年代開始的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準備把北京近十萬「黑五類」強行驅趕出北京的陰謀，毛不會不知情。至少周恩來的「首都工作組」的計劃，是毛批示同意的。另外，在北京和全國的紅八月恐怖中，毛雖然也有過「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但另一方面，在各校發生打人事件後他又輕描淡寫地說：「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①⑥}。毛的這一講話，當年在暴虐一時的紅衛兵中廣為流傳和引用。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殺戮怎麼不會如星星之火，遍地燎原呢？

縱觀十年文革的歷史，歷數一個個大屠殺的案例，盡管三十多年前的許多血腥的內幕仍大多被中共當局竭力掩蓋著，但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恐怕是不難的。首先，如同任何對人權的迫害首先是一種政府行為一樣，文革中的許多著名的暴力屠殺案完全是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它們中有的甚至還是中共長期的預謀和決策，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

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中共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他們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到在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因與果，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歷史界限。最後，中共國家機器的嗜血性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無論毛澤東、林彪還是周恩來、葉劍英，在領導這一國家機器吞噬無辜公民上是一致的。盡管他們的個性會有差異，對無辜公民的打擊上會有因為他們政治權爭的需要而產生的選擇性，但在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殘殺無辜公民，尤其是所謂的鎮壓「階級敵人」上是決沒有分歧的。

【註釋】

- ① 陳東林、苗棟、李丹慧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福岡市：中國書店，一九九七年，一〇六八頁。
- ② 轉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東方紅報》（北京地質學院）。彭真的原話是：「我們計畫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一樣，沒有不勞動的人，沒有靠剝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掃乾淨，當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十一——三十二頁。
- ④ 對中共某高級幹部的採訪。

文革大屠殺目錄

- ⑤ 見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和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
- ⑥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李文波》，原載《民主中國》二〇〇〇年十二期。
- ⑦ 周恩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 ⑧ 北京大學教授印紅標的調查。
- ⑨ 《西城糾察隊罪行錄》，載北京地院《東方紅報》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 ⑩ 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二〇〇一。
- ⑪ 陳東林、苗棟、李丹慧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福岡市：中國書店，一九九七年，四七三頁。
- ⑫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原載《民主中國》二〇〇一年三——四期。
- ⑬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一三二頁。
- ⑭ 章成《道縣大屠殺》，載《開放雜誌》二〇〇一年七期。
- ⑮ 見收入本書馬萍所著《雲南回民村被趕盡殺絕：解放軍血洗沙甸》。
- ⑯ 載《毛澤東思想萬歲》（編印者不詳），第二卷，一九六七年，二〇四頁。

宋永毅：美國狄金森學院圖書館研究員

| | |
|-----|-----|
| 胡績偉 | 1 |
| 徐友漁 | 10 |
| 宋永毅 | 15 |
| 李相 | 1 |
| 遇羅文 | 13 |
| 丁抒 | 37 |
| 吳迪 | 59 |
| 章成 | 111 |
| 鄭義 | 205 |
| 徐勇 | 227 |
| 馬萍 | 257 |
| 金鐘 | 268 |

- 序：評價毛澤東尚待努力
- 序：還原和再現歷史的真實
- 前言：文革大屠殺——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
- 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血案
- 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
- 青海二二三事件
- 「內人黨」大血案始末
- 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
- 廣西賓陽慘案調查記
- 韋國清剿殺四二二派
- 解放軍血洗沙甸
- 文革七大慘案一覽表
- 出版後記：文革屠殺事件的特徵

文革初期紅八月暴行之一角：

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血案

◎ 李相

大

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是韓模寧先生永遠抹不掉的記憶。三十三年前，在這裏，他前妻一家五口死於紅衛兵的木棍下，至今不知魂歸何處。他們是：前妻黃煒班、前妻的外婆李秀蓉、媽媽陳玉潤、弟弟黃瑞五和男傭等五人。

現已年近七十的韓模寧是水電部高級工程師。早年曾生活於蘇聯國際兒童院，畢業於莫斯科動力學院，是人大委員長李鵬的校友，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科技參贊。其父母均在二十年代入黨，父親曾在李大釗領導下工作，解放後任職於最高人民檢察院，母親與向警予、蔡暢、帥孟奇是老戰友，解放後在中國紅十字會工作。韓模寧現在的妻子邱鍾惠，是著名的乒乓球國手。筆者在採寫另一篇文章時，韓模寧先生說他正準備打一場房產官司——「文革」中他前妻黃煒班家的房產被強佔，至今沒有完全收回。為了這場官司，韓模寧先生不得不講述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世的黃家人也滿足了筆者的要求，打開了那段塵封已久的痛苦記憶。

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是黃家的私房院落，是五人慘死的發生地點。

大紅羅廠這條胡同東西走向，長不過三四百米。坐落於北京西城西四的北面，林彪宅邸毛家灣的南面，程硯秋故居所在的報子胡同東面，國防部以及北大醫院的西面。而「南巷」是在大紅羅廠中間朝南走向的一條小胡同。「二十號」在南巷東側的最南頭。這是個收拾得頗為雅潔的二進院，是黃家外婆李秀蓉於一九五二年花一萬餘元購置的。因為老人只有陳玉潤這一個女兒，「文革」前她與女兒一家一直住在這裏。這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家庭，也是一個熱愛黨、有覺悟的家庭，為了幫助社會緩解住房緊張的現象，他們認為自己住的比較寬裕，「文革」前幾年，將東廂房的其中兩間租給了海軍某部的姜某一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紅衛兵「破四舊」進入了瘋狂階段，死人的事不斷發生，「紅色恐怖」籠罩京城，但黃家還未感到威脅的來臨，更未意識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們逼近。因為儘管他們是有保姆有男傭有房產的「大戶」，但從一九五二年住到這裏以後的十來年裏，始終安分守己，從不張狂，與街坊四鄰相處很好；並且家裏有黨員有軍人，都是典型的知識份子，與「地富反壞右」不沾邊，內心坦然地認為紅衛兵造反還不至於造到自己頭上。

安分守己一家被房客誣告，紅衛兵上門抄家

然而，一件不經意的事，竟引來了殺身之禍。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黃家遭受血腥毒打的前兩天，黃家的兒媳汪克寬從供職的東方歌舞團趕回家。她要找一些屬於「四舊」的東西拿回團裏，因為她們單位的紅衛兵也在破「四舊」，她必須表現「積極」一些，完成破四舊的任務。她從家裏找出了一些唱片、樂譜、香水和一條假珍珠鏈裝在一個大書包裏。不巧的是，汪克寬出門時正碰上租住她家的姜某的父親，姜老頭厲聲叫住她，問書包裏是什麼，並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准轉移財產。汪克寬小心翼翼地告訴他：「我們單位紅衛兵也在「破四舊」，這些東西是準備交給單位紅衛兵的。」汪克寬邊作解釋邊返回院中，恰好碰上了姜老頭上小學的孫女，她急忙叫住了小女孩，說：「小姜江，你看看阿姨包裏的幾樣東西。」那個十多歲的小女孩往包裏看了一眼，只是莫名其妙地「哦」了一聲。她並不明白汪克寬這位與平時沒什麼兩樣的阿姨做出此舉的目的，汪克寬是想借這個孩子的口告訴她爺爺：包裏並沒有什麼「財產」，以解除姜老頭的懷疑。因要趕回單位，汪克寬乘姜老頭不注意，還是於當天匆匆離開了家。

汪克寬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後在東方歌舞團擔任鋼琴伴奏。其實她平時每天都回家住，只是因忙於給單位緊張的運動作記錄，天天忙到很晚，也是為了表現積極，她這幾天一直住在單位的宿舍。直到二十七日，她意外地接到丈夫黃瑞五從家裏打來的電話。

汪克寬丈夫黃瑞五的工作單位在靠近通縣的管莊，當時是離北京市內較遠的地方，他平時住在單位集體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但恰巧二十八日這天單位組織參觀學大慶展覽，為不誤參觀學習，黃瑞五在廿七日回到了家裏。

黃瑞五問家裏衣櫃的鑰匙是否在汪克寬手裏。「是在我手裏。什麼事？」「他們（紅衛兵）來了，櫃子鎖著，打不開不太好。你還記不記得我保存的子彈殼？」「記得，是步槍子彈殼。」

「那你趕緊回家，把鑰匙送回來。」前一天才離開家的汪克寬怎麼也沒有想到，姜老頭這個街道積極分子把所謂她「轉移財產」的情況報告給了轄區派出所的片警羅××。羅××第二天（廿七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讀的弟弟率紅衛兵來抄黃家。

當汪克寬從位於和平里的東方歌舞團趕回家時，家裏已經被抄得七零八落，全部物品都被封存起來，一家人也都被集中在她與黃瑞五平時住的屋裏。她看到大姑姐黃煒班（韓模寧前妻）也在場時，不禁吃了一驚，因為黃煒班、韓模寧夫婦有住房，平時不住在這裏。汪克寬驚訝地問：「你怎麼也在這裏？」「他們把我叫回來的，不能隨便離開。」黃煒班無奈但又很坦然地回答著弟妹。原來，紅衛兵來抄家的前一天，姜老頭讓小孫女把黃煒班從她的工作單位北京醫學院附屬平安醫院叫了回來。之後紅衛兵命令，黃家的人只許進不許出，凡是已進了院子的都不能擅自離開。

雖然紅衛兵命令森嚴，但在黃家人集中的屋子裏並沒有紅衛兵把守，看管得也並不是很嚴。汪克寬默默地掃視了一遍家人，將目光落在了丈夫黃瑞五的身上，似在對愛人說，又似在自言自語：「我在單位還有任務，走不開，我得回去。」你回來了，走了就不好。」黃瑞五提醒妻子。「家裏這種情況也沒地方住，有事你給我打電話吧。」說完，汪克寬匆匆離去。可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她留給愛人和其他家人的最後一句話。

八月二十八日，紅衛兵血洗黃家。

一家五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這一天，在羅××帶領下紅衛兵繼續抄家。黃瑞五把衣櫃鑰匙交給了他們，他們搜出了幾粒子彈殼。這幾粒子彈殼是黃瑞五小時候隨父母在開灤煤礦居住時撿到的。那時，解放戰爭正在進行，戰爭過後，隨處都有戰鬥的痕跡，收集幾個子彈殼十分容易。黃瑞五也無法擺脫男孩子的天性，他撿到子彈殼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來。紅衛兵命令黃瑞五交待子彈的來歷，他如實說明。紅衛兵哪里信他的「謊言」，首先對其進行抽打，血腥由此開始。

抽打「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轉移物件，叫出了隨黃家生活十二年、當時三十幾歲的獨身男傭。男傭出身不好，派出所是掌握的。本來「文革」一開始，黃家就想把他辭退，但不巧他出了車禍，他們本想等他養好傷，再讓他出門。而恰恰是男傭的出身給紅衛兵們找到了藉口，紅衛兵的邏輯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變天」；現在又搜出了「子彈」，有「子彈」就必然有槍。紅衛兵「順理成章」地審問男傭。一個老實巴交

的獨身男人，到哪里去找槍，無情的皮帶、木棍雨點般落在他的身上。

黃瑞五和男傭都正直，內向，不會撒謊，不知道該怎樣保護自己，在紅衛兵的淫威下，也不可能保護自己，「負隅頑抗」的兩個人被紅衛兵打倒在地。黃家的三代女人黃煒班、陳玉潤、李秀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倒地「呻吟」，她們的心在流血，但又無能為力，甚至連一滴眼淚都不敢掉！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給這三個女人扣上了「窩藏逃亡地主」的罪名。此時的紅衛兵不知是打累了，還是想看看親人打親人是什麼滋味，他們命令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煒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話激怒了紅衛兵：「不打你媽，我們就打你！」他們一邊罵一邊抽打黃煒班。

八月份正是北京最熱的時節。黃家人在烈日下慘遭紅衛兵毒打，衣服打飛了，幾個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他們呻吟著要水喝，紅衛兵倒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正是這一「要求」加速了死亡的到來。當天，黃煒班、黃瑞五和男傭相繼停止了呼吸。兩天以後，黃母陳玉潤死去。陳玉潤死前，曾給遠在浙江部隊的大女兒黃煒孟寄出一封只有六個字的短信：「我已無處可去。」可憐的是，信佛而常年吃素、視殺生為罪惡的李秀蓉老人，親見外孫子、外孫女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幾天以後，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也受驚嚇而死。

在場的黃家人倖免於這場劫難的只有黃瑞五和汪克寬的惟一幼子，年僅兩歲。是黃家六十多歲的老保姆保全了黃家的這一骨肉。就在紅衛兵瘋狂毒打黃瑞五等人時，保姆一直抱著孩子跪在院子裏，不敢抬頭也不忍抬頭，她雖然不斷地變換姿勢，但雙眼從未離開過緊緊抱在懷中的孩子，生怕誰把孩子奪走。

終於輪到紅衛兵審問她了，一句「下中農出身」的回答救了保姆，紅衛兵讓她站起來。乘解脫之機，保姆抱著孩子悄悄溜出家門，跑到東方歌舞團，把孩子交給了汪克寬，並訴說了家裏的遭遇。

當汪克寬和黃煒班的丈夫韓模寧知道變故後，現場已經被紅衛兵處理，他們連親人的骨灰也沒見到，更不用說遺體了。三十三年過去了，黃家尚在的人仍不知道屈死的親人魂歸何方！

悲傷綿綿仍未消

黃煒孟接到「我已無處可去」的信後，感到莫名其妙，「父親沒有政治歷史問題，母親、姥姥也沒有問題，弟弟黃瑞五沒有問題，妹妹黃煒班更不會有問題……」她寬慰著自己，但隱隱感到可能發生了什麼，猶豫中沒敢給家裏回信。

黃煒孟的丈夫胡家俊和妻子在同一個部隊，他背著妻子給岳母回了封信，意思是老人可以到他們那裏住。信發出後，其實黃母已經命歸黃泉，紅衛兵將信截獲，寄回了部隊，胡家俊因「劃不清界限」而遭到了批判。

幾天後，韓模寧給黃煒孟寄去一信，告訴他們家裏發生的一切。而他們也只能躲在門窗緊閉的家裏暗自流淚，思念親人。同時，還要把來信上交組織，以此表示與家庭「劃清界限」。

在韓模寧給黃煒孟寫信的同時，汪克寬因為原在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與家人同住，衣物等生活用品都不在身邊，特別是兩歲的兒子吵著要他的小暖瓶，不得不找到設在離家不遠的小拐棒胡同的紅衛兵辦公室。幾個紅衛兵告訴她：「他們（指黃瑞五、黃煒班和男傭）都是反革命

，有槍有子彈，都被我們用木棍打死了。」「他們既然是反革命，我支援革命行動。」面對稚氣未脫還只能算是孩子且又無法無天的紅衛兵，汪克寬只能違心地這樣說。那一刻，她想的更多的是為了可憐的幼子，她還得活下去。

經過紅衛兵的允許，汪克寬回家取衣物，又碰上姜老頭，被告知去派出所遷戶口。在派出所，片警羅××接待了她。因為羅××清楚抄黃家的全過程，汪克寬為了核實情況，問到：「我們家抄出的是什麼槍？」「沒那回事。」「紅衛兵說幾個人是他們打死的。」「沒那回事。」這個讓紅衛兵頭目即自己的弟弟帶人來抄家、並打死幾條人命的警察完全否定了紅衛兵的話。

汪克寬進一步到北京市三十八中學校實情況。那裏的紅衛兵說：「大紅羅廠一帶本來不歸我們管，因為有人來通知說有人在轉移貴重物品，並且叫我們去，我們才去的。」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的黃家，經過八月二十八日紅衛兵的血洗，丟掉了五條人命，全部家當被抄。韓模寧找到片警羅××，想要回妻子黃煒班生前帶的手錶，那是朱德送給女兒朱敏、朱敏又轉送給韓模寧的，此錶對韓模寧的意義不同一般。但羅××只說了三個字：「不知道。」

不久，黃家被從大紅羅廠南巷徹底「掃地出門」。姜某一家由廂房搬進了寬敞的北房。後來由房管所安排，又搬進了四戶人家。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黃家活著的人感到為親人昭雪的機會到了。為核實情況，他們找到姜某所在的海軍機關。有關人員接待他們說：「姜某得了一種病，已經喪失記憶，過去的事都忘光了。」他們又找到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負責人針對追究兇手和指使人的責任說：「這是當時依照謝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現這種事。」他們給胡耀邦同志寫過信，也

找過中組部、僑聯、北京市委，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對黃家的遭遇都很同情和重視，分別有過指示。當時的中組部負責人帥孟奇、章蘊都親自過問。黃家死去的親人當然都有了「結論」，但他們要的僅僅是一紙「結論」嗎？

採訪中，韓模寧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在身邊的黃煒班的照片，久久地注視著；黃煒孟說起自己死去的親人時，儘管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但仍然禁不住淚流滿面；汪克寬在丈夫黃瑞五死後的日子裏，曾有兩個月失去記憶，她常常夢中驚醒，此後身體一直不好，她在電話中與筆者交談了一個小時。末了，她抱歉而又悲傷地說：「我再也說不下去了……」

從大量的事實中，黃家人始終認為，片警羅××是始作俑者，他是五人慘死的元兇。但他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歷史還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可以接受的「說法」？親人們的冤魂能不能得到安息？

附：部分黃家人生平簡況

黃家男主人：黃國聰，廣東中山人，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教英文，抗戰期間任教於西南聯大。後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做英文翻譯。一九五〇年攜全家定居北京。一九六五年病逝。黃家女主人：陳玉潤，曾就讀於唐山的孔德女中，當過小學教員。隨丈夫黃國聰到北京後，沒再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被紅衛兵毆打，於三十日死亡。

黃福麟，黃國聰和陳玉潤的長子。一九四八年輔仁大學畢業後到香港謀事。每當想起親人的慘死，他都夜不能寐。九十年代遷居加拿大，儘管家人多次寫信告訴他，國家已經改革開放

，盼望他回來看看，可他仍然不回。「當我踏進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時，我會是什麼心情！」

黃瑞五，次子，六十年代初畢業於清華大學，分配到建材部玻璃設計院。性格內向，不善言辭，視工作如生命，一心鑽研業務。死時才三十幾歲。

黃煒班，長女。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北醫附屬平安醫院婦產科大夫，兼黨支部書記。早在一九五〇年上高中時，她就入了黨。有一年她到京郊巡迴醫療，把一位患重病的農婦接到父母家中，吃住好幾天，再陪她到附屬平安醫院就醫。農婦病好後感激涕零，黃煒班卻認為自己只有這個條件，此事實屬太平常。在家人的記憶中，年年除夕她都在醫院值班中度過，而讓其他同事回家團聚。她留下了一對當時不滿三歲和五歲的兒女。

黃煒孟，次女。在北平的貝滿女中高中畢業後未考大學。於一九五〇年報名參加志願軍，結果被分到四川江津的防化兵學校。一九五三年調到北京大學化學系深造，一九五七年學成後又回到防化兵學校。一九六六年，當她得知親人們的噩耗時，強忍悲痛，不敢有絲毫流露。一九七六年和同在一個學校的丈夫一起轉業回到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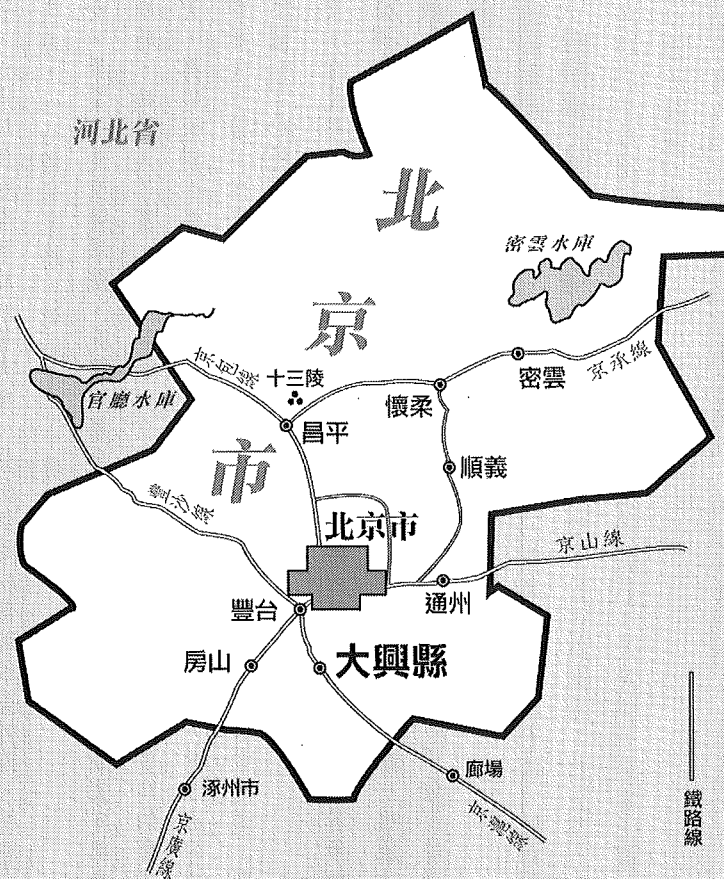
李相：中國大陸作家。此文原載廣州《南方周末》

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

◎ 遇羅文

殺害地富家庭成員三百餘人

北京市大興縣位置圖



遇

一、緣起：北京市紅衛兵的瘋狂暴力

羅克在一九六六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六六年八月、慘絕人寰的中國首都，「天子」腳下的北京市大興縣的大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儘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縣內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九八六年九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鑑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佈告（俗稱「三一八佈告」），內容是規定了十一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十一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資本家、黑幫份子、反動軍官、偽警

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六六年開始到六七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一九六六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十一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五天前發佈的「三一八佈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發生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瞭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家庭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上資本人家、「黑幫份子」）。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八一八」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做法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不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人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錘、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八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欖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蟲。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採訪老韓：說八三一事件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里，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瞭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八三一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八三一」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九月一日）上午，縣裏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八三一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

乎都在九月一日這天。

大辛莊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听生、紅升、楊各莊、東黃莊；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十九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動。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重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生在廟裏，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九月一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玉春的妻子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拼命。」

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玉春的妻子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鋤刀鋤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份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鋤刀鋤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鋤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份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五五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八月三十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玉春的妻子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麼？」老韓說：「有什麼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只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玉春的妻子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

三、來到大辛莊：一天殺人一百〇六口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听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七十歲，一九四九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七三年才給予恢復，八〇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五〇〇，空氣質量是污染程度非常嚴重的五級。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三十三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七十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八月三十一日那天，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一百〇六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听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九月一日上午，大興縣副縣長劉英武、傅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福興、胡德福兩人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窪兩個

大隊在九月一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員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兩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九月五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就建立了，五九、六一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九月一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

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佈：「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儘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藉口也與攬桿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福興、胡德福兩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八月二十四日就開始殺人，到九月一日已經殺了三十四人，還關押著一〇八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兩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八里遠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殺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

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八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十四年，在「幹校」的六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八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八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窪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還在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七十七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到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六十一歲，「文革」那年他二十七，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份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八月三十一日開始，殺光「五類份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九月一日以後，縣長傅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一九七〇至七一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一九八六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

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五十三人，馬村死三十四人，六合莊死十人，共計九十八人。

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裡，有正房五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

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枝」、「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七十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哆嗦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

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三十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枝，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內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鑽到井裡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人隨提，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八月二十七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九月三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一〇八人的敬意。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

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准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准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復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繫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元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一九六七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挨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答。

為了瞭解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副村長，他的妻子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三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一九六三年

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一九五四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人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學生叫譚潤方，死得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鋤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他妻子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他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老王夫婦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五十五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門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門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

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份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採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裡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麼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麼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麼了？中國人怎麼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謎團。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日

遇羅文：中國旅美作家，其兄遇羅克因撰寫《出身論》，文革中被中共殺害。

解放軍武力鎮壓造反派

青海二二三事件

◎ 丁抒

一

九六七年初，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倒台已成定局，舉國遍地都是「打倒劉鄧陶！」（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一類的大字標語。一月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參與上海奪權的造反團體的賀電。全國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繼垮台，省委第一書記幾乎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代理人」，揪上鬥爭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接到安徽省軍區的報告，請示群眾組織召開大會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是否應該派部隊警衛會場。毛澤東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①

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當天發出了一份《關於革命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決定說明，「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份子手裡奪權」的，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並指示「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份子的防空洞。」②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發出《八條命令》：「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証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份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③

二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作了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④林彪將毛的「部隊可以開槍自衛」的批示轉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元帥，葉又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的令箭。

毛澤東製造無解的矛盾：讓軍隊支持「左派」

但問題出來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

起來造反、力主打倒當權的「走資派」並參與奪權的群眾組織，是毛澤東定義的左派。他原本設想的是：支持左派群眾組織奪權。但新的領導班子由原領導人中與劉、鄧、陶無瓜葛的幹部及軍隊將領掌握，加幾個左派組織的代表在新政權裡作點綴。可是此時已不同於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熱衷於鬥爭「走資派」，沒有哪個組織還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個組織都要打倒「走資派」，都高喊「打倒劉鄧陶」；每個組織都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有資格參與奪權。可謂人人「革命」，區別僅在先後。

而這些組織又彼此對立、彼此反對，使「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語無法嚴格定義，更使「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組織」很難執行。

軍隊既獲得讓他們「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訴他們誰是「左派」，他們祇能依靠自己的判斷去「支左」。那些黨團員多、老工人多、基層幹部多的群眾組織背後多半有「黨的領導」，天然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再加上由於黨領導一切，省委第一書記往往兼任大軍區或省軍區的第一政委，地委書記往往兼任軍分區政委，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頗為惺惺相惜。對於地方幹部被指為「走資派」而殘酷批鬥，軍隊幹部難以接受。雖然中央說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就是「左派」，可是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組織核心一般是大學生，黨團員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純」、「行為過激」，怎麼看都不像左派。要軍隊支持他們，無異於緣木求魚。

而在造反派看來，省委第一書記倒了，軍區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書記倒了。軍分區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為甚麼司令員就不能打？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在地方上有「爪牙、同黨」，作為軍隊的政委，他們在軍隊裡自然也應當有「爪牙、同黨」。既然領導一切的黨的機關都可以造反，軍區就沒有不可衝擊的道理。更何況當時毛澤東正在支持鬥爭軍隊內的反黨份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司令楊勇相繼被打倒、鬥爭。十九日，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和一批將領在北京十萬人大會上被批鬥。二十六日，海軍政委蘇振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上被鬥爭。因此，造反派組織無懼與軍隊對立，無懼衝擊軍區司令部。這樣一來，左派又成為毛澤東所說的右派了。

這個矛盾無解。要麼奪省委權和衝擊軍區都是革命行動，要麼都是反革命行動。說奪省委權的是左派，衝軍區的是右派，行不通。至於毛澤東說的右派衝軍區要追究，左

派衝軍區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嚴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這一條。

大刀長矛時代，老百姓還可能用刀劍和軍隊搏殺，而今有機槍、坦克、飛機、大炮，根本不會有人以卵擊石，對軍隊「動武」。因此，對軍隊「動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軍隊應當堅決還擊」這一條卻給了軍隊巨大的空間。當軍隊要為鎮壓製造理由時，只要說「對方動武，我們還擊」就夠了。而這是軍隊領導人的尚方寶劍，足以使下級軍官、戰士接受，把槍口對準群眾組織成員，對準老百姓。

製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青海軍區負責人趙永夫就是這麼說、這麼做的。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奪權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上海造反團體的賀電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紅衛戰鬥隊」「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赴西寧支隊的支持下，奪了《青海日報》的權。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組織。但他們的首要打擊目標不是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而是第二書記王昭。

正如李葆華在安徽餓死二三百萬人後於一九六二年初被劉、鄧派到安徽取代曾希聖，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語），造成大飢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後調去的。安徽有人稱李葆華「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

稱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來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親自談了話，羅瑞卿保駕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發軔，「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認為王昭是「彭、羅安插在青海的死黨份子」，應予打倒。^⑤青海省軍區內部對王昭是否「走資派」、是否應予打倒分歧甚大。省軍區司令員兼黨委書記劉賢權在黨內積極揭發王昭和彭真、羅瑞卿的關係，認為王昭應該打倒。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等與劉賢權素來不和，趙認為「王昭有錯誤，如果和彭、羅沒有關係，是批判的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關於革命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下達的當天，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兼黨委書記劉賢權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支持「八一八」。而趙永夫心裡對「八一八」恨之入骨，在黨委會上卻不情願地表態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追隨者是多數。當時，毛澤東對是否許可軍事首腦機關成立群眾組織和奪權還沒有明確的指示，有關政策相當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軍委才發出《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說「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奪權和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趙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間，效仿地方群眾組織，在省軍區黨委決定支持「八一八」三個小時後，起來造反，成立「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他們宣布省軍區支持「八一八」的決定無效，奪了劉賢權的權。劉賢權被軟禁在家，電話被切斷，住處放雙崗，警衛員、秘書不得與他接觸。他們擁戴趙永夫，趙則以「顧問」名義成為指揮部乃至軍區的實際領導人。

一月二十五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獲總後勤部青（海、西）藏辦事處副主任張曉川支持。趙永夫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當然不買趙永夫的賬。他們在軍區樓前張貼大字報，提出「當指揮員叛變革命時，革命戰士不僅不應該聽取他的指揮，而應該掉轉槍口對準他。」並拉出巨幅標語「打倒軍區一小撮混蛋！」「堅決揪出青海軍區內一小撮混蛋！」

此時，中共青海省委內部也嚴重分裂。王昭早於一月中旬離開青海治病，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書記王昭。「奪權」受中共中央支持，無法抗拒，與其被「奪」，不如交權。楊植霖幾次召開會議，決定支持「八一八」奪權。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奪權，毋寧說是省委、省人委和平移交政權給「八一八」。

其實，全國各地奪了權的「左派」都沒有掌權。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澤東「奪權」。對毛澤東來說，這個國家是共產黨的，掌權的必須是共產黨的官員，這是極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歷史使命祇是幫助毛澤東打垮劉、鄧那條線的人物，現在毛澤東已用不著他們了。毛澤東安排了軍隊「支持左派」，實權落到了「支左」的軍隊手裡。

青海也一樣，由於楊植霖、劉賢權、張江霖皆較軟弱，強悍的趙永夫控制了軍隊，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了一份電報，說「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將電報發給中央，被趙永夫拒絕。劉的夫人安紹傑將電文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蘭州，由蘭州軍區發給中央軍委。但未獲回應。

因此，「八一八」名義上奪了權，其實祇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他們唯一奪到手的，只是一個《青海日報》社。

趙永夫軍管《青海日報》失敗

青海對決之勢十分嚴峻：趙永夫及其在省軍區內的追隨者對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和省軍區司令劉賢權、副司令張江霖；「紅衛兵總部」、「捍衛隊」、「貧下中農紅衛軍」對「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這時，由於對方攻擊其組織「不純」，「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決定純潔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整風」，將幾個成員定為「反革命份子」，交給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門嚴肅處理。結果給正在伺機行動的趙永夫和張曉川一個出手打擊「八一八」的機會。

二月三日，張曉川掌管的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出動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軍車，省軍區的部隊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武裝全城遊行。他們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壞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寫著「八一八」的高帽，遊街示眾，借以向「八一八」示威。

這使雙方對立局面更加激化。二月四日，青海大學紅衛兵張貼大字報《炮轟青海軍區機關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賀龍、小羅瑞卿揪出來示眾，我們死不瞑目！」而趙永夫和張曉川也決心打垮摧毀整個「八一八」組織。軍權、政權都在他們手裡，摧毀「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針，問題祇在何時動手。

中共明文規定，某省的日報都是共產黨該省委員會的機關報，此外並無省報。可是此時青

海省委已交權癱瘓，《青海日報》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繼續出報。趙永夫等視該報為眼中釘，起先想封閉報社，未獲省軍區領導層的支持。此時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備區對《天津日報》軍管的先例。趙永夫等遂轉念，決定由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宣布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管。

二月十四日，軍管小組到報社。但佔據報社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組織動員守衛報社。西寧市各「八一八」成員組織劃分地段守衛報社。報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員組織派去近兩千人守衛報社，相當擁擠。當時氣溫很低，有的就睡在臨時搭的帳篷裡。

趙永夫調動軍隊封鎖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橋，暫時沒有動作。軍隊不許運送物資進去，但許可人員出入。「八一八」控制報社繼續出報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連日遊行支持對《青海日報》社軍管。但青海省軍區的上級蘭州軍區給趙永夫發去「三條指示」，要求部隊撤離報社。趙永夫派省軍區副司令員劉斯起等十二人到蘭州軍區抗議，要求收回「三條指示」。而蘭州軍區把要求青海軍區將部隊撤離報社的指示用電話傳給了「首都三司聯絡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堅定了守衛報社的決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組織遊行示威反對軍管《青海日報》。途經《青海日報》社時遭對立派阻攔。「八一八」的車輛不慎壓死了捍衛隊成員張桂蘭。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擬將「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定為反革命組織。

二十日，捍衛隊抬張桂蘭屍體遊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組織調動十萬

人，再次抬張桂蘭屍體環城遊行，並沿途砸「八一八」等組織的辦事機關。

省軍區決定武力強佔《青海日報》社

雙方在《青海日報》社僵持的幾天當中，青海省軍區向中央發了十幾份電報，但未獲明確指示。據當時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林彪「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著急。」^⑥中央對青海事態雖不表態，但實際上正在全國支持軍隊「鎮壓右派」。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中的「堅決反對右派」、「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實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眾。」^⑦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人入獄。^⑧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四百餘人被拘捕關押。^⑨

成都軍區於二月十七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⑩如安岳縣公安局於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二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局關逮捕、拘留九百餘名紅旗派成員。^⑪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趙永夫和張曉川知道形勢對他們很不利。二月二十一日，他們再次主持會議，確定二十三日取締「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武裝佔領《青海日報》社。青海省軍區黨委常委劉賢權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見一致。他們擬定行動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頭、武器進行頑抗，就堅決予以鎮壓。」二十二日午夜，趙永夫向「參戰」部

隊下達任務，說：「部隊開進時，八一八動刀，我們也動刀（指刺刀）；八一八動槍，我們也動槍；若遇阻攔，就強行開進；乘車的部隊如遇阻攔，可以壓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趙永夫再次召集動員會議，強調說：「一定要佔領報社，用刺刀挑，也得挑進去。」^⑫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時，全城戒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發表通令：一、從即日起，立即取締青海省反革命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如再非法活動，一定嚴加懲辦。

二、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份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該反革命組織中的小頭目和指揮部門一般成員，坦白者從寬，抗拒者從嚴，立功者將功折罪。

三、對受蒙蔽的群眾一概不追究。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團結教育他們。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敵我，與那些反革命壞蛋徹底決裂，並堅決進行揭露和鬥爭。

四、立即交出一切兇器、武器、電台及其他軍用物品。破壞或拒交者，嚴加懲辦。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號、公章、證件、檔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廣播器材、佔用的房屋、積存的資金等。不准破壞國家財產，違者依法嚴懲。

六、自取締之日起，不准更換名目，另建反動組織，有違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派駐外省外地的辦事機構，接到本通令後必須立即撤銷，所有人員應即刻返寧回衛戍司令部登記。如有違抗者，依法逮捕嚴辦。

八、（略）

與此同時，省軍區調動獨立師、獨立團的部隊，計十三個連，團團圍住《青海日報》社。

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四樓指揮，後為安全改到二樓。

「一二三」：文革中首次軍隊大屠殺

青海日報報社地勢較低，架在周圍樓房、高地的機槍居高臨下，報社內的人不可能抵抗。雙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時，軍隊槍擊報社外的「八一八」的廣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啞。下午近二時，趙永夫所在的賓館和報社後們臨河的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部隊從報社前面以及後面臨河的橋頭同時向報社院內密集射擊。

守衛報社前院大門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員。水文站三個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當場身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橋，守在橋頭的是汽車三場、五場、六場的工人。他們手挽著手，高聲朗讀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動，仍然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堅持，結果又壯烈犧牲。」^⑬

「二十二日晚，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給她守報社的爸爸送飯，由於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沒讓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彈後，她撲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這時一梭子彈打過來，她就被當場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談起非常傷心。」^⑭

後來周恩來處理青海「一二三」事件，接見青海代表時，讓清華大學學生許寶生匯報當時的情況。許說：「一個解放軍要我們舉手，我們手挽手站成一排，他頭一低，往後一退，用機槍

掃射過來。當時我旁邊的一個同志就打死了，另一個同學旁邊的一個女同志的腦袋都被打碎了。」¹⁵

趙永夫還調去一個噴火器班。但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噴火器未用上。軍隊未遇抵抗，僅用了二十分鐘就輕易佔領了整個報社大院。二時半左右，報社內倖免於難者一千餘人全部被押到操場。據被俘的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說：「捍衛隊的人紛紛跑來，在（被俘者）人群中走來走去，從八一八派的大隊長到小組長以至一般成員，全被抓出來，高舉雙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們說：『八一八先開了槍。』並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虜堆中找機槍射手。」¹⁶

槍聲停止後。趙永夫、張曉川等趕到現場。他們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隊迅速將屍體拉走、掩埋，並層層傳達編造的統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傷我幹（部）、戰（士）五人，才開槍還擊。」他們自己用機槍督戰，打死四十餘名。」部隊進攻時，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員朝過道撤退，有幾個人被設在臨近科委大樓門口的一挺機槍從背後掃倒。事後，軍隊說他們「背上中槍，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軍隊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員打死，而是被參戰的戰士誤傷的。由於部隊從報社前面、旁邊以及後面臨河的橋頭同時開槍，而報社範圍僅一百米見方，有戰士被對面的火力擊中。據《青海日報》記者周衍慶目擊：「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背著另一個受傷的解放軍戰士，另一個解放軍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別打，是自己人。』這樣對方才停止射擊。」¹⁷

周恩來處理青海事件時，有人匯報說：「一個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槍，解放軍問誰打的。她

說是解放軍打的。那個人講『你說是八一八打的，我替你養傷治療，你說是解放軍打的就送你進監獄。』那個小女孩說：『我看見是解放軍打的。』於是被送進監獄。」¹⁸

青海軍區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八一八」有槍、有機槍。後來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接見青海代表時，有如下對話：

周恩來：「你們就是想找藉口鎮壓，下那麼大的毒手。報社有槍，趙永夫你有甚麼證據？」

趙永夫：「以前瞭解有槍。」

周恩來：「現場有沒有？」（趙永夫回答含糊）

康生：「你就回答有槍沒有？」

陳伯達：「有？沒有？」

趙永夫：「當時沒搜出來。」

戚本禹：「為甚麼報告裡說有槍？」

趙永夫：「不是在報社裡有。其他地方開槍了，但沒搜出來。」

周恩來：「現場上怎樣？」

趙永夫：「有彈殼。」

周恩來：「沒槍，你開第一槍，打死那麼多群眾！」

周恩來：「全部把他們包圍起來了，你還沒搜出來！除非偽造假槍！謊報軍情，欺騙中央！」

趙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周恩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趙永夫：「死傷二百六。」【實際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傷一百七十八人；軍隊死四人，傷四十六人。①9】

周恩來：「你去現場看了嗎？」

趙永夫：「沒有。」

周恩來：「這麼大的慘案，你身為副司令員還不到現場去嗎？」

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並當場宣布對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②0

趙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

事件發生於二月二十三日，而上述周恩來出面處理是三月二十四日，隔了整整一個月。這期間發生了甚麼？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遲第二天就知道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的夫人葉群說：「二十四號聽到此事，死亡那麼多，（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氣，他們下令調查此事。林彪同志執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調查這個事件。」②1可見事件一發生毛、林就知道了。但葉群所謂毛、林「非常生氣」卻是十足的謊言。毛、林根本不需「非常生氣」，只要一個簡單的批示，趙永夫馬上就得負荊請罪，哪裡還用得著等一個月！

事實是，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林彪都著眼於保護軍隊，都不打算處理此事。當時毛澤東

剛將衝擊部隊的組織定為右派，批准軍隊鎮壓，所以不想把火往軍隊引。林彪秘書張雲生說：「主席最初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主席已有過內部指示：對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對和衝擊解放軍的右派群眾組織，當一再的說服工作和忍讓態度不能奏效之後，可以進行鎮壓。」②2

中央文革欲將此事定性為軍隊血腥鎮壓紅衛兵的事件，以便打開缺口整肅葉劍英、徐向前等軍隊領導人。無奈毛澤東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趙永夫不得。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周恩來當然不會有所動作。據張雲生分析：「毛主席的戰略意圖似乎是盡可能穩住部隊，並給那些把造反矛頭指向解放軍的『右派』以有力的回擊。因此，儘管中央文革印發的告狀材料寫得感人肺腑，並未受到最有權威方面的理睬。」②3

「二二三」當天，趙永夫通過電話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元帥報告，說佔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但不知為甚麼消息到了西寧大街上，「葉副主席」變成了「林副主席」。秘書向林彪報告說，西寧傳說「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林彪聽了一笑了之，不加評論，不置可否。②4

有中央軍委撐腰，趙的膽子也壯了。據劉賢權說：「二十四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革命師生，打死打傷十二人。」②5

趙永夫繼續「平定反革命暴亂」，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一萬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

和軟禁三千五百〇四人。」²⁶「一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進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進一百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一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看管人員說：『反革命死了也活該！』」²⁷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八一八』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分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²⁸

三月八日，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指示劉賢權、趙永夫、張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們到北京時，「軍級幹部會議」後來又叫「軍以上幹部會議」已開了兩個星期。趙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在會議上他被安排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他借機自我表功，吹噓「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據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後來說：「趙永夫表了三天功，說二月三日武裝遊行是他組織的，『二二三』時他如何指揮、如何開槍……甚麼功勞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記錄和錄音。」²⁹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接見青海代表時，葉群也對趙永夫說：「前幾天在京西賓館介紹經驗的是你吧？有聲有色，全部功勞都是你的！現在怎麼都沒你的事，推得光光的？」³⁰

由此可見，葉劍英把趙永夫請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軍隊領導人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的。

為平定「二月逆流」而處理「二二三事件」

但就在這時，毛澤東改變主意。當他發現對文化革命表示不滿的元帥、副總理們是最大威

脅時，他對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態度就變了。他要回擊幾位元帥、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反對文化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當中央文革張春橋等給他寫信要求重新審查此事件時，他於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³¹

葉劍英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等人因為「二月逆流」問題而搖搖欲墜。為保自己，祇好丟車保帥。葉劍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澤東寫了檢討，承認對青海事件處理錯了。³²

對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評論，不置可否的林彪開始表態了。三月二十日，他在軍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毛澤東聽了林彪講話的錄音後，指示把該錄音大量錄製，發給全國各地播放。³³

直到這時，一直沒明確表示意見的周恩來才著手出面處理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見青海代表，宣讀中央關於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為被定為「反革命組織」的青海「八一八」平反，甚至指揮戰士當場撕掉趙永夫、張曉川的領章、帽徽，押走。

可是，如果葉劍英、徐向前等沒捲入「二月逆流」，毛澤東很可能不會改變對青海事件的態度，趙永夫將繼續當他的「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青海「二二三血案」的冤魂也就將含恨九泉，永無翻身之日了。

【註解】

- ①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84頁。
- 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杭州：浙江省聯總，1968）第111頁。
- ③ 同上，第114頁。

- ④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87頁。
- ⑤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安紹傑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1967）第45頁。安紹傑是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夫人。
- ⑥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31頁。
- ⑦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99頁。
- ⑧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30頁。
- ⑨ 《黔陽縣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第32頁。
- ⑩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3頁。
- ⑪ 《安岳縣志》第30頁；《宜賓縣志》（成都：四川書社，1991）第456、457頁。
- ⑫ 一九六七年四月青海軍區軍事管制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宣傳材料，《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9、53、54頁。
- ⑬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36頁。
- ⑭ 同上，第38頁。
- 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13頁。
- ⑯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33頁。
- ⑰ 同上，第36頁。
- 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紀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14頁。
- ⑲ 文庫《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435頁。



- ⑳ 同上，《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7至10、15頁。
- ㉑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15頁。
- ㉒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6頁。
- ㉓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2頁。
- ㉔ 同上。
- 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21頁。
- ㉖ 同上。
- ㉗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38頁。
- ㉘ 《貴德縣志》（1995）第28頁。
- 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安紹傑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44頁。
- ㉚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9頁。
- ㉛ 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204頁；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6頁。
- ㉜ 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103頁。
- ㉝ 同上，第101至102頁。

蒙族人民空前的浩劫

「內人黨」大血案始末

◎ 吳迪



● 1966年5月中共中央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把烏蘭夫打成三反份子，是內蒙文革極左狂潮猖獗的直接根源。圖為文革後1981年烏蘭夫（右）和鄧穎超（中）廖承志（左）在上海。



與

其他省市、自治區相較，文化大革命在內蒙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民族問題。即作為「主體民族」的蒙族的「民族分裂」問題。這一問題構成了內蒙文革的主要內容，在內蒙古的三大冤案中，蒙族死、傷、殘最大的兩個冤案——「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都是整「民族分裂」的產物。可以說，文革在內蒙「革」的就是「民族分裂」的命。

所謂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其實是一個產生於四十年代，活動於內蒙東部的，試圖走民族獨立和共產革命道路的革命黨派。這一黨派在三十年代曾直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後來其成員大都融於中共的執政集團，對此，中共在解放後早已經有過政治結論。然而，文革中此事又一次災難性地重提，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由中共中央支持，新生的紅色政權內蒙古革命委員會領導，掀起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挖「內人黨」的運動。僅在這場運動中，據後來的官方統計，有三十四萬人（主要是蒙族）被抓、關、捕並打傷至殘，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餘人在刑訊逼供下慘遭殺害。而據上北京喊冤的全內蒙的受害者統計，決不止這個數字，有名有姓被殘殺者就有五萬餘人。總之，這是一個震驚中外的文革大冤案、大血案。

發軔：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批判「烏蘭夫叛黨集團」

這一民族屠殺雖然始於一九六七年，但其發軔卻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剛開始時的中共華北局北京「前門飯店會議」。會議自五月二十二日開始，至七月二十五日結束，歷時六十

四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會議。自治區黨委成員、各盟市書記，區黨委各部委、直屬機關黨政負責人，部分旗、縣負責人，共計一百四十六人出席會議。七月二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找烏蘭夫談話，對烏蘭夫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此二公「以階級鬥爭為綱」，理直氣壯地站在大民族主義立場上，對烏蘭夫痛下針砭。指斥他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比較而言，劉少奇口氣溫和，尚有替烏蘭夫說話的意思。鄧小平則口氣凜冽，態度強橫，思想更左。接著，與會者自然對烏蘭夫窮追猛打，提出了嚇死活人的誣衊性問題（共計十個）：

- 1、搞加盟共和國、獨立國以及印發《三五宣言》的目的和具體活動。
- 2、反大漢族主義的真實目的何在？搞了哪些陰謀活動？
- 3、搞反革命政變的陰謀權術。
- 4、同高崗、習仲勳、李維漢等反黨集團的關係。
- 5、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華北局的具體活動。
- 6、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間，為甚麼允許蒙修情報員留在內蒙古？
- 7、對以哈豐阿為首的「內人黨」這個反動黨派，為甚麼不按反黨反動派論處？對其骨幹分子不做處理，居心何在？
- 8、為甚麼長期重用、頌揚舊官僚和民族上層人物？
- 9、積極推行斯拉夫文字，與蒙修成立「統一名詞術語」的四十三人委員會，是何居心？
- 10、為甚麼對區內許多民族分裂案件和叛國案件不做處理？

七月二十五日，會議結束，四天後，由華北局起草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報告「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1、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2、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3、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5、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報告給烏蘭夫下的結論是：三反份子、民族分裂份子、修正主義份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從此，烏蘭夫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開始了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比起他的同志、朋友和同胞們，他要幸運得多，至少，他沒有挨過鬥，沒有受過皮肉之苦。「絞肉機」再次發動起來，在「階級鬥爭」的惡能驅動下，它轟鳴著，張著血盆大口，吞噬著一個又一個犧牲品。左得可憎的李雪峰認定烏蘭夫是反黨叛國的總頭目。他自己則被江青考證為林彪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在秦城一待就是七年。劉少奇、鄧小平剛剛把烏蘭夫歸入彭、羅、陸、楊一類，自己就成了這一反黨叛國集團的總後台。革了一輩子命的劉少奇成了「無業」的「劉衛黃」，死無葬身之地。鄧小平成了一名鉗工，在江西新建縣拖拉機製造廠監督勞動。而那些拼命上綱上線將烏蘭夫打倒的內蒙古自治區的頭頭們，也都或先或後在後來清查所謂「內人黨」等等的政治運動中，無一例外地被送進了這個絞肉機。

歷史證明，這個會議是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思想上，它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在內蒙古的蒙、漢民族中造成了長達十年之久思想混亂。極左思潮

由此得以大力推廣。組織上，它以反宗派為名，造就了一批以極左起家的「反烏英雄」。它打倒烏蘭夫和他的土旗幫，卻扶植起以漢人和東蒙人為主體的新的宗派，它使左傾勢力掌握了內蒙古的領導權。民族關係上，它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下，將一切從實際出發，維護民族正當權益的言行、訴求都視為民族分裂活動，在全黨、全軍、全國的範圍內大肆宣傳、鼓吹以踐踏民族自治權利為宗旨的極權專制主義政策，明目張膽地打擊、迫害維護少數民族利益的領導人。從而使本來已經十分猖獗的大漢族主義更加肆無忌憚，更加變本加厲，在後來的「挖肅」運動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方法上，它為內蒙古的幹部、群眾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整人公式：揭批——檢查——再揭批——再檢查——直至打倒。即從打倒的願望出發，經過從無到有，胡編亂造的和蠻不講理，上綱上線的批判；達到把人搞臭、整垮的目的。這種整人方式與毛澤東提倡的「群眾專政」結合起來，進一步演化成了誣陷——逼供——再誣陷——再逼供——

自革委會成立後，「挖烏蘭夫黑線，清烏蘭夫流毒」就成了一個帶有指導性的提法，經常以通欄大標題的形式出現在《內蒙古日報》上。但是，這一軍人政權總覺得「清」這個動詞不帶勁——為甚麼要用「清」而不用「肅」呢？後者比前者更響亮，更少用，因此也就更吸引人，何況從語義學上講，「肅」比「清」顯得更徹底，更賣力。於是「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這個提法被固定下來，成為內蒙革委會成員的共識，一場以「揪叛徒」、「挖「內人黨」和「清理階級隊伍」為基本內容的全區性浩劫「挖肅」運動登台亮相。

「挖肅」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開始至六九年五月結束，歷時一年半，經歷了輿論準備（六七年十一月——六八年三月）、重點突破（六八年四月——六八年九月）、全面鋪開（六八年十月

——六九年四月）和草草收尾（六九年四月——五月）四個階段。貫穿這四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挖「內人黨」。在各種大批判的文章、大字報、發言稿中，「挖肅」的注意力從「老內人黨」到「新內人黨」，一個含義模糊、內容廣泛的新黨被製造出來，它既指四六年一月哈豐阿企圖重建的「新內人黨」，又理所當然地包括四六年一月以前，活動在東蒙地區的第二代「內人黨」。既包括人們想像中存在的、六十年代初復活的「內人黨」，又包括幾十個「變種組織」——一個個霍霍磨刀的、極其陰險、極其隱秘又極其龐大的地下組織被製造出來。

如果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前「新內人黨」的存在還只是少數激進份子的看法，那麼到了六七年底，這已成了革委會和造反派的共識，成了漢族民眾強烈的心理期待。從此，「新內人黨」成了一個無所不裝的垃圾桶，一切「污泥濁水」都被填入這個桶中。剛剛從內蒙文教界挖出來的兩個反動組織——「大眾黨」和「統一黨」即作為它的變種組織被填入其中。

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圓。關於「新內人黨」反黨叛國的神話，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似「一川煙草，滿城飛絮」迅速蔓延到城鎮鄉村，街頭巷尾、口頭筆下。整個內蒙古像個巨大的養蠶場，熱心革命的人們像蠶寶寶吃桑葉一樣，貪婪地咀嚼著各種流言蜚語，辛勤地吐絲，編織著一個包羅自身的巨大蠶繭。「挖肅」使內蒙古成了一個蘊藏豐富的金礦床，叛國事件和民族分裂組織就像埋在歷史中的金子，使無數善良的人們變成了「淘金狂」。「二〇六案件」、「師院叛國案」、「民族統一革命黨案件」、「陶、松、納案件」、「四十三人委員會案件」、「二毛案件」、「老小寡婦案件」、「莫力達瓦達幹爾獨立案件」等一些五、六十年代做了結論的舊案，或沒有線索的懸案，或不成案件的案件，統統被翻騰出來。穿鑿附會，上綱上綱，成

為聳人聽聞的、證明「新內人黨」存在的十大案件。各種專案調查組應運而生。

群眾專政：毛澤東發明的殘忍殺人新形式

如果說「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挖肅」的理論基礎，那麼「群眾專政」則是「挖肅」的重要手段。內蒙古「挖肅」創立的種種「豐功偉業」——發現了上百個反動黨團，破獲了無數個重大案件，製造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打死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打傷、打殘幾十萬無辜民眾（官方數字）——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群眾專政」。這是毛澤東比斯大林的高明之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中國特色」。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通俗表達，作為「公檢法」機關的一種辦案方式，「群眾專政」原指相信群眾的覺悟，依靠群眾提供破案線索，發動群眾監督壞人。在文革中，這種「群眾專政」被歪曲，誇大，推向極端，成為一種在革命的名義下，任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正義行為，成為踐踏國家法律而不受法律制裁，反而得到政府保護的普遍權力和社會活動。它意味著法制廢弛，綱常淪喪，人性泯滅；意味著隨心所欲地抄家、抓人、打人、刑訊以至草菅人命而逍遙法外，甚至立功受獎。它包括私設公堂、私立監獄、濫施刑罰、濫殺無辜的行為方式，包括辦學習班、關牛棚、批鬥會、大會戰、隔離反省、交群眾監督改造等具體措施；還包括「群眾指揮部」、專案組、聯絡站、委員會、戰鬥隊等機構組織。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間，毛澤東到華北、中南、華南視察。在發表了一通「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的高論之後，又說了幾句令億萬中國人一想

起來就戰慄不已的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抓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

老人家回到紫禁城後，這個「最新指示」見諸報端。人們歡呼雀躍，連夜慶祝，慶祝的鑼鼓方歇，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形形色色的「群眾」活動就像盛夏的野草一樣蓬蓬勃勃地鋪滿了神州大地。紅衛兵、革命派以前的暴力行為由此合法化、理論化。八億人民從此沐浴在「群眾專政」的腥風血雨之中。

內蒙的「群眾」組織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正式成立的。最初，旗、縣以上的政權機構才設立「群眾」，隨著形勢的發展，這個新生事物迅速普及到公社（鎮、蘇木）以至生產大隊、街道委員會及各個單位。內蒙有一百多個旗、縣，一千四百多個公社（鎮、蘇木），在「挖肅」全盛期，各級的群眾機構在萬數以上。在這些機構中，最權威、最正規、也最掌握「政策」的要算呼市「群眾專政總指揮部」。這個建立在舊公檢法的廢墟上的組織是呼市革委會的下設機構，由呼市「革委會委員、軍隊代表、群眾組織代表」三種人組成。

為了慶祝它的誕生，《呼三司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發表了三論「群眾專政好得很」的社論，一月二十七日，群眾專政總指揮部的機關報《聯合戰報》發表創刊詞——「就是要群眾專政」。

最足以說明「群眾」運動深入人心的是關於兩姐妹、一啞巴和醫學院七百多人搞專案的事蹟。「述評」說，呼市「群眾」組織三次全市統一行動後，「出現了許多揭發壞人壞事的動人事例」——有一對十幾歲的姐妹，過去看到母親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考慮

生活問題，一直沒有揭發。在「群專」的高潮中，她們的覺悟大大提高，勇敢地揭發了自己的母親。

最足以說明「群專」運動深深入人心的是關於兩姐妹、一啞巴和醫學七百多人搞專案的事蹟。「述評」說，呼市「群專」組織三次全市統一行動後，「出現了許多揭發壞人壞事的動人事例」——有一對十幾歲的姐妹，過去看到母親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考慮生活問題，一直沒有揭發。在「群專」的高潮中，她們的覺悟大大提高，勇敢地揭發了自己的母親。

另，某日，「群專」總指揮部接待站闖進來一位衣衫襤褸的中年啞巴，他站在當地比劃了半天，工作人員也不知道他的意思。人們給他紙、筆，他卻寫不出一個字。但是，根據他在紙上塗抹的「人物速描」，人們做出判斷：他在揭發階級敵人！

平心而論，呼市「群專總指」是比較「掌握政策」的。根據之一是他很少往死裡打人。另外，它的工作效率也較高，當「新內人黨」成為「挖肅」的重點，而其看押場所人滿為患時，它就會放掉那些流氓、小偷、打架鬥毆者和投機倒把份子，騰出地方接納更重要的政治犯。還不管甚麼犯人，在呼市群專總有一日三餐，儘管遠遠談不上吃飽，但總不至於餓死。其審訊用刑也較克制。旗、縣一級的「群專」，尤其是公社以下的「群專」機構使用的「冷靜思考」（放到雪地裏凍）、「熱情幫助」（放到火爐上烤）、「驢拉磨」（人騎在犯人身上，令其繞屋爬）、「蕩秋千」（吊起來打來打去）、「拉大鋸」（在女性兩腿根部拉麻繩）等等刑法在這個「文明」單位是不曾有的。最為「人道」的是，這裏還允許某些犯人家屬送衣送飯。當然，對於

那些連家屬也成了「新內人黨」的犯人就無法享受這種「人道主義」的待遇了。總的來說，呼市「群專」總指揮部一方面在「挖肅」中建立了「偉大功勳」，另一方面，它又是同類組織中的模範單位，因此，能被扭送到這裏實在是內蒙人的幸運。

就機構而言，「各地群專」主要指的是一百多個旗、縣級的群專機構，這些機構在組織上受旗、縣革委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一般由一個革委會委員或籌備小組的成員掛帥，支部左部隊的軍人擔任實際上的第一把手，工宣隊、貧宣隊的隊長們也往往是群專領導班子中的一員。其工作人員大都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搞專案的「白領階層」，另一部分是看守犯人並在審訊中充當主要打手的「藍領階層」。前者多半是從公檢法系統中挑選出來的出身好、歷史清白、立場堅定的革命左派和其他單位的保衛幹部、復轉軍人；後者基本是從基幹民兵和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中抽調來的，其中不乏貧下中農出身的流氓、苦大仇深的地痞、不務正業的潑皮等社會渣滓。

「群眾指揮部」的所在地一般都在旗、縣委所在的區、鎮，沒有監獄的旗、縣往往因陋就簡，把中、小學校舍或某單位的大院當作本地區的「東、西廠」。有監獄的旗、縣則因時制宜，把「監獄」或「看守所」的招牌換上「群眾專政指揮部」即開張營業。

旗（縣）群專關押的犯人層次較低，最高的不過是旗、縣黨政一班人，低一級的是各公社的頭頭腦腦。根據內蒙革委會諸公的說法：「明裏是共產黨支部，暗裏是『內人黨』支部。」這些頭頭腦腦在「新內人黨」中擔任的職務與他們原來擔任的職務基本一致，即原中共旗（縣）委書記一定是「新內人黨」的旗（縣）委書記，其餘以此類推。

可能是繼承了正規監獄的傳統，這裏的刑法也比較正規，它沒有公社「群專」或民間專案組採用的二十六刑，七十二法等種種花樣，沒有往肛門裏捅燒紅的通條（如托縣五申鄉），沒有用鐵鉗子拔牙、撕耳朵（如呼市物資局）等酷刑。其刑法無非是棒打、鞭抽、戴背銬、用火爐烤胸脯、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通用的辦法。

在這個外表平靜，沉默無言的世界中，犯人的心裏卻如滔滔江河。誰也不願意自誣與誣人，但很少有人頂得住嚴刑拷打。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承認自己是「內人黨」只是開頭，緊接著還要交待具體的反黨叛國活動，同時檢舉揭發上面的領導，下面的黨員。交待得好且不翻供的就不再用刑。過堂時享受俘虜待遇，可以坐下，還可以喝水，如果沒有別的專案組找他核對問題，要他提供證詞，他就會獲得長久的安寧而不必擔心黑夜的降臨。然而，淚水、歎息、夢中的驚悸將伴隨這種人度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直至他說服了自己的良心，改變了做人的標準，變得問心無愧為止。硬漢子是有的，他們付出的代價是：敲碎腳踝骨、打斷肋骨、內臟受傷。提審一次，十天半月臥床不起，好的落個傷痕纍纍，終身殘疾，壞的或瘐死獄中，或斃命於刑具之下。

公社、大隊及生產小隊的「群專」機構在數量上無法統計，在質量上難以形容。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的「雙百方針」在這裏得到了認真地貫徹——用刑而「百花齊放」，構罪而「百家爭鳴」。在托克托縣落實政策辦公室的檔案裏，記載著「挖肅」時使用的三十六種刑法：「爬肉條」（用燒紅的爐鉤子燙犯人），「烙油餅」（將燒紅的爐蓋按在犯人身上一），「金鉤釣魚」（鼻上穿孔），「擰麻花」（吊兩臂旋轉打），「戴拉東」（將打場和平地用的中間帶孔

的圓柱形石塊——「拉東」，用鐵絲拴住，掛在犯人的脖子上），「掛火爐」（將生著火的火爐用鐵絲拴住吊在犯人的脖子上），「炒庫倫」（庫倫：音譯，內蒙農村的一種食品，這裏意謂幾個人將犯人圍在中間，你打過來，我踢過去），等等。錫盟蒙民家中至今還珍藏著一本出自知青之手的畫冊，畫的全是拷打「內人黨」的種種刑法，其手段又超出托克托縣。比較而言，在七盟二市中，烏盟是這方面的冠軍，其刑法種類有上百種。

與刑法比起來，陷人於罪的名堂更多。即使把歷次政治運動創造出來的「階級敵人」、「黑五類」、「公安六條」中人、「走資派」等全國性的名目的除外，僅內蒙的「地方特色」就足夠「挖肅」積極份子使用——參加過「聯社」、「衛東」的人自然是反革命。其家屬、親友、同學、鄰居亦被列入反動份子或嫌疑犯之列。「內人黨」固然以蒙族為主，但其他少數民族也不吝賜之，漢族被「吸收」入黨的也大有人在。一人入黨，八方「群專」。株連九族已成定則，有些地方連死人也要挖出來鞭屍示眾。至於其週邊組織——真理黨、大眾黨、統一黨、民族黨、合併黨、牛糞黨、柳條黨……更是暴民們陷人於罪的方便法門。不但民族、成分、出身、歷史、社會關係就可以置人於死地。而且個人恩怨、家族仇隙、派性分歧、鄰里芥蒂都會成為被「群專」的原因。簡言之，只要掌權的人認為你有罪，就一定有一個或者幾個罪名送給你。

這類「群專」機構往往無「機構」可言，它無須「指揮部」、「辦公室」一類的招牌，也用不著相應的公章和專門的人馬和設施。會議室、大隊部、飼養院就是審訊室、監獄和刑場。貧宣隊、工宣隊、支左人員、民兵、「挖肅」積極份子和隊長、支書就是警察、法官、打手和劊子手。在這裏「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土左旗北什軸公社南海流大隊中海流小隊的雲宜

常一家的遭遇或許可以說明一點問題。

五十八歲的雲宜常是蒙古族。貧宣隊隊長、圪速貴大隊的漢族社員崔柱柱剛一進村，就逼他承認自己是「內人黨」。雲宜常被押到大隊部，審訊之後關在隊部裏。雲宜常害怕，半夜逃走。崔柱柱即將雲家大小十口人全部綁到大隊部吊打。雲宜常在村外的機井房裏躲了一夜，本想跳井自盡，猶豫再三，決定回村自首。他剛進大隊部，崔柱柱就抄起一把鐵錘，迎面劈過去，雲宜常的耳朵被劈掉，鎖骨被打斷。然後，崔柱柱等人將他吊起毒打，一個長條板凳竟被打折，雲宜常的腿骨被打斷，血流遍地。崔柱柱命令雲妻跪到地上舔血。在雲宜常被打死之前，崔柱柱及其他貧宣隊隊員給雲宜常及其家人上的刑法有：頭顱穿洞、生豆芽、炒碗豆、老虎凳、跪鋤刀、洗冷浴、烤火爐等十幾種。雲死後，崔下令將他的屍體用馬拖著繞村一周，然後拉到村外荒灘，不許掩埋。不到一天，雲宜常一家十一口，一人被打死，七人被打殘。

這類事例在內蒙古的「群眾」活動中不勝枚舉。土左旗檔案館中至今還保存著成千份被害人家屬平反後寫的上告信及目擊者的證明。

造反派內部出現反對群眾專政的聲音

「群眾專政」發展到這步田地，自然要遭到一些批評和反對。有趣的是：反對最力的是內蒙的老造反派。

內蒙最早的「右傾」出現在內蒙工會的造反派組織中，其產生背景與「挖肅」直接關聯。六八年一月，工會造反組織《東方紅聯隊》派王見喜（民族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等七人去呼

盟、烏盟等「挖肅」成績顯著的地區搞調查，他們寫回的調查報告很可能是內蒙古最早的反「挖肅」宣言書。報告認為：

- 1、「挖肅」不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鬥、批、改」這一大方向。
- 2、批判烏蘭夫的民族分裂應該實事求是，否則就等於否定了黨的十七年的少數民族政策。
- 3、「挖肅」中重新翻出已經解決了的，有正確結論的歷史問題，這不符合黨的政策。
- 4、「挖肅」出現違反政策的事，存在著刑訊、武鬥以及打死人的現象，應予制止。

這個報告遞上去後，區三把手高錦明等人認為這是有組織地反「挖肅」，故意與革委會唱對台戲，遂立即派人處理此事。《東方紅聯隊》隨即成了「把矛頭指向紅色政權」的假造反派組織。王見喜等人並不示弱，在黨委大院貼出「揪出黨委機關的『座山雕』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高錦明、權星垣、郭以清、張魯等靠反烏上去的『革命領導幹部』。這下子捅了馬蜂窩，六月二十二日，高、權等人唆使黨委其他群眾組織在黨委禮堂召開大會，會上革委會代表突然宣佈參與此事的七個人：王見喜、白銘傑、程正華、范聚全、董錦康、韓立春（女）等為「七人反黨集團」。當場被捕，批鬥後，押解「群眾」。會後，高、權等人心有餘悸，擔心有人到內蒙檔案館查閱他們的檔案材料，遂下令對檔案館實行軍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師院造反派姜振華等七人給中央文革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烏蘭夫的問題是複雜的，這不僅是劉鄧路線的一個重要側面，而且從內部材料來看，毛主席對此另有看法。」假如烏蘭夫的問題定成黑幫，那麼與烏蘭夫有關的一切問題就升格了。假若不是這樣，其他問題就應重新考慮。」「內蒙黨委書記們都因揪出烏蘭夫而成了左派書記，左派幹部。」

「高錦明、權星垣都非把力沙克（烏蘭夫之子，師院教師）打成黑幫不可。」力沙克對內蒙黨委、華北局李雪峰恨之入骨，他說，「他們搞烏蘭夫，毛主席不知道，是李雪峰搞的。」作者們請示中央文革「力沙克是否可以來北京向中央文革彙報情況，力沙克是否可以見烏蘭夫？」信的結尾說：「因為打烏蘭夫的問題在新的情況下，其內容發生了變化……為了徹底清除民族隔閡及由此引起的宗派傾軋，為了徹底解決民族問題這一階級鬥爭的大問題，我們最強烈要求接見我們做口頭彙報。」

造反派之所以會出現反「挖肅」的勢力，原因很複雜。約略言之有二：

第一就現實利益上講，「挖肅」使造反派受到損害。如果說文革是社會角色的調換。那麼「挖肅」則是革命角色的調換。用滕海清的話講：「運動是不斷向前發展的，運動中的積極份子也是不斷變化的，不斷一分為二。」（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接見呼市工宣隊學習班時的講話，見十二月十四日《農民運動》報）造反派組織多是前十七年受壓各階層的聚合，其成員或出身不佳，成份不好，或思想作風不合規範，或受到不公正待遇，工作受排擠，事業不得意，精神不舒暢。內蒙造反派四大領袖之一，師院教師高樹華文革前在日記中寫道：「我就像門前那棵低頭薦腦的向日葵。」相信這是多數造反派共同的寫照。他們因不滿、失望、受壓而造反。但是，造反的成功並不能改變社會既定的價值標準。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出身、成份、歷史、思想、作風、性格、社會關係等方面的先天缺陷仍舊會成為「清隊」——「挖肅」的目標。這些人被挖，就意味着另一派人抬頭——「挖肅」為那些在文革初期犯了錯誤、被打入冷宮的、根正苗紅的保守派提供了東山再起、報仇雪恨的機會。造反派中人理所當然地反對這場危及自身的運動

。造反派由此而分裂成反對「挖肅」和贊成「挖肅」這截然不同的兩派。反「挖肅」派成了「挖肅」的對象、三右主義份子。一九六九年五月以後成為「批滕派」；「挖肅」派則演變成「保滕派」。

第二，就思想觀念而言，造反派頭腦裏裝的是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和毛氏階級鬥爭理論的大雜燴。這些觀念，或與毛相投契而大受支持，或與時代需要合拍而大行其道。文革初期，毛在打、砸、搶、抄、抓和社會秩序中選擇了前者，利用無政府主義達到了天下大亂的目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由此得到滋養而根深葉茂。而毛的「五·七道路」的社會空想、對「官僚主義」的憎惡，暴力革命的主張又正中久受壓抑的造反派的下懷，於是，上下默契，一拍即合，互相利用。造成了一場接一場的轟轟烈烈的運動。

然而，時至一九六七年中，毛要恢復秩序，決定為造反派所鍾愛的無政府主義劃上句號，以實現「全國上下一片紅」。可是憑此起家的造反派對這個新秩序、新政權十分反感，他們認為（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這是舊體制的復辟，是兩條路線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因此就有了「三右主義」種種，就有了形形色色反「挖肅」的思想、言論。《烏蘭察布盟日報》就是要借助「楊、余、傅事件」重新揮舞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武器，把滕海清與楊成武拴在一起，以期達到打倒滕海清、破壞舊世界、保護造反派及其價值觀的目的。

至此，熱衷於「挖肅」的人們不得不因為第二戰場的開闢而兩頭奔忙，一方面，他們要為挖出更多的「新內人黨」而浴血奮戰，另一方面，他們又得分出一隻眼睛盯著身邊的戰友，時刻準備著從戰壕裏面把那些叛逆者拋出去。值此多難之秋，一度威風八面的造反派組織也不得

不承受分崩離析的痛苦，分裂的雙方從此體驗到不同的人生，緊跟「三套馬車」的「挖肅」派只好堆起討好的微笑與東山再起的保守派握手言和，共同對付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敵人。而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曾為滕、吳、高的上台流下激動的眼淚的反「挖肅」派則身陷圈套，忍辱含冤，嚐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擴大化」：血腥颶風席捲全內蒙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晚，在核心小組會議上，高錦明提出「要抓『內人黨』四三會議以後的活動，鬧（內蒙方言，意味「搞」）地下人民革命黨……由專案辦負責。」權星垣出點子：「人民革命黨的問題，應從特古斯突破。」根據巴圖的口供，會議決定，立即正式逮捕巴圖、鮑音扎布，額爾敦陶克陶等八名蒙古族幹部，將每個人都建立專案，分別關押，免其串供。第二天下午，核心小組在新城賓館會議室召開專案會議，主管此事的李樹德做了具體佈置，大計方針是八個字——「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四月二十四日、四月二十五日在郭以青的指揮下，內大「巴圖專案組」和軍區步校「鮑音扎布專案組」對二人進行突擊審訊。已經自誣誣人的巴圖校長，在嚴刑之下，不得不編造出「新內人黨」的口供。在連續十八個小時的刑訊逼供、誘供下，鮑音扎布根據審訊者的提示和社會上關於「二〇六號案件」的傳聞，含含糊糊地交待出「一九六三年六月份在集寧召開過『內人黨』代表大會。」（原文如此）並編造了會議的參加者——哈豐阿（內蒙人委副主席）、特木爾巴根（內蒙高等法院院長）、額爾敦陶克陶（語委主任）、格日布僧格（內蒙人委副秘書長）、索德拉木（內蒙人民出版社社長）、旺丹（烏盟盟委副書記）、特古斯（宣傳

部副部長）、特布信（內大教師）、額爾敦巴圖（烏蘭浩特二中教師）、桑傑扎布（內蒙師範學院教師）、多古爾扎布（畜牧廳廳長）、烏力圖（民政廳廳長）等三十多人。」儘管一停止用刑，他就馬上推翻供詞，並拒絕寫書面材料，但這已無關緊要。在得到這一口供的當天，核心小組就召開了有李樹德、李德臣、郭以青、郝廣德等人參加的擴大會議。

會議由高錦明主持，聽完了專案組的彙報後，對「新內人黨」的存在一向深信不疑的高錦明振奮不已，當即令李德臣起草了《關於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叛國案件的報告》。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高親自簽發急電報告中央。報告稱：「二〇六案件，已初步突破，證明『內人黨』是存在的。而且長期與我為敵，大搞民族分裂主義。『事實證明，『內人黨』就是烏蘭夫的『暗班子』。』」

「巴圖專案組」和「鮑音扎布專案組」取得的成績，極大地鼓舞了上至核心小組下至革命群眾的幹勁。專案人員乘勝追擊，在繼續審訊巴圖、鮑音扎布的同時，又組織人馬利用前二人的口供，採取更加凌厲的手段審訊其他六名「新內人黨」骨幹，並迅速擴大捕獵範圍，獲取更多的口供。能夠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的當然不乏其人。但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痛苦畢竟有限，在棍棒交加、精神恫嚇之下，假口供汨汨而出，源源不斷——有的交待自己是蒙修的情報員，有的承認自己是「新內人黨」的骨幹，有的揭發了自己的上級、同事，有的把自己的妻子、親友拉進無底的深淵。

為了減輕肉體的折磨，為了獲得短暫的安寧，為了立功贖罪，或者完全是為了報復，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共產黨幹部說出了「特殊」的口供。這些內蒙人稱之為「灰說六道」（即胡說八

道)的口供，或者被審訊者嚴肅地記錄下來，或者由犯人裝模作樣地寫在紙上，最後都有條有理地插進專案組的檔案袋裏，整整齊齊地擺到核心小組的桌案上，最後再添油加醋地傳達到老百姓、捕獵者和被捕獵者的耳鼓中。

惡性循環開始了，一種新的公式：逮捕——審訊——揭發；再逮捕——再審訊——再揭發，迅速形成。與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人們的互相揭發類似，內蒙古的黨員幹部、學者教授、社會名流的自誣與誣人，揭發與悔過就像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中所描寫的那樣「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圍滿了觀眾的沼澤中，他們踩別人的時候，對自己的上升都懷著一絲希望，殊不知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一同沉沒。他們的表現沒能爭得站在堅實地面上的人的援手，只給自己留下了永遠不可告人的悔恨。」

這又是一個屍橫遍野的戰場，如果說「中國的文化人」在反右中「最悲慘也最恥辱」(戴晴)，那麼，中國的蒙古族，在「挖肅」中寫下的則是本民族有史以來最悲慘也最恥辱的一章。一九六八年七月，在滕、吳主持下，召開了內蒙革委會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會議正式通過了挖「新內人黨」的決定。李樹德代表革委會作了關於「內人黨」的性質和如何對待的說明。七月二十日通過了《關於對「內人黨」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的內容以革發(83)1號文件的形式印發全區。該文件將「內人黨」分為三個時期，認為，第一時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一九三六年)的「內人黨」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黨，第二時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內人黨」是地方民族主義的政黨，第三時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以後)的「內人黨」及其週邊組織是反革命組織。文件認為，這個組織在烏蘭夫的包庇下，在「

九四七年「五一」大會成立之後，違背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發出的「不組織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指示，在表面上宣佈解散，實際上轉入地下，並組織了一些變種組織，繼續推行「內人黨」的反動政綱，與蒙修勾結，進行反黨叛國、民族分裂的罪惡活動。該組織同烏蘭夫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勾結在一起，成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勢力。

這種貌似尊重歷史，實則踐踏事實，表面區別對待，實際上可以任意解釋的文件在文革中比比皆是。此文件亦不例外。只要「前門飯店會議」是正確的，只要第三期「內人黨」存在，文件中所說的「蒙奸」、「特務」、「牧主」、「反革命份子」、「內人黨骨幹」、「支部委員」、「無明確職務而實際起骨幹作用的份子」等等概念，就足以做出陷人於罪的各種解釋，就可以變成將任何無辜者網羅在內的恢恢天網。試想，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去過集寧，就必定是特務、蒙奸、「內人黨」。如果僅僅根據口供就可以確認某人是「支委」、「骨幹」、「反革命」，那麼，還有誰能保證自己「交待清楚」了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會議和這個文件只不過是溫度計中的水銀柱遲早要達到的某一刻度而已。它以地方最高權威機構的名義周知全區臣民：今後可以放開手腳大挖「新內人黨」了。

挖「新內人黨」的颶風以呼和浩特、集寧為中心，迅速席捲烏蘭察布盟，繼而席捲中國的第三大省區。蒙族、幹部、共產黨員首當其衝。其他民族，一般民眾緊隨其後，甚至連挖「新內人黨」的專案人員也不能倖免。

下面是颶風所到之處出現的遠非「精彩」的片斷。

▲原土左旗北什軸公社社長、共產黨員。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在公社被打死。兇手們連夜將屍體運到距公社五里遠的一棵大樹上吊起，定為自殺。其弟雲毛杏是北什軸公社後甚岱大隊黨支部書記，被北什軸大隊翟虎旦等人打死後，連夜將屍體運放到鐵軌上，被火車撞爛，誣為自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挖「新內人黨」死難者子女達楞哈日的上告信

▲土左旗有些純蒙村、被誣鑿成「小台灣」，強迫拆遷。如兵州亥的馬群大隊、三間房大隊都拆散了。還有蒙漢雜居村，強迫人家分開，搞「三紅夾一黑」（「紅」指漢族，「黑」指蒙古族作者）。把蒙古族社員當成敵人，當成反革命監視起來。挖「新內人黨」的過程中，當時死的和以後致死的二百六十多人，致殘一千多人，挖了一萬一千人。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土左旗旗委書記雲瑞在四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在執行左傾擴大化錯誤路線過程中，全社誤打成「東聯」或「內人黨」成員的有二百一十四名，其中國家正式幹部職工四名，致殘四十八人，其中輕殘四十一人，重殘七人，致死八人。在這二百一十四人中，蒙古族一百七十六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集體辦學習班的有一百二十人，個人隔離反省的有四十三人，公社群專過的有十四人，旗群專過的有十二人，最長時間達三年之久。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土左旗北什軸公社革委會《關於「東聯」、「內人黨」平反遺留問題情況報告》

兩段倖存者的回憶。上層的責任

▲我是土左旗哈素公社馬群大隊、馬群生產隊的一名普通社員。一九六八年清隊擴大化中，我大隊、公社的掌權者無視黨的政策，受壞人利用，把我十八口人打成反革命，漏劃地主。「新內人黨」等。貧下中農有八人受牽連，被隔離，遭受毒打，也被打成反革命。我二伯張二維當時已六十多歲，一直在家務農。我們全家幾代人一直以農為生，任何反動組織都沒參加過，土改時定為中農，「四清」時也是中農，但清隊時卻把我二伯打成漏劃地主。貧宣隊一進村，就把我二伯非法隔離，當夜進行毒打，連續搞了五晝夜，逼他承認是地主。我們要求不要武鬥，就把我、我弟弟等十人非法隔離、毒打。群眾不滿出面勸阻，也被打。烏雲遮天，全村一片殺氣，再沒人敢主持正義說一句話。

二伯被打昏多次，隔離三個月，最後只剩下一口氣時，這夥暴徒為轉嫁責任，急忙把人送回家。我們找大夫搶救，他們不讓，全家苦苦哀求才得允許，當夜把人送到呼市醫院搶救，才撿了一條命。

抓我時，說我要劫法場，定為反革命。把我、張祥祥、趙聚寶三人五花大綁送往公社。捆我時，把新麻繩捆斷了三節。到了公社把我們三人吊在電線桿上，三十多人對我們進行毒打。三個人都被打昏，打了一整夜，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七點多鐘了，三人被打的誰也不認得誰了。當天晚上，又對我進行武鬥，逼我承認是反革命。要我承認我父親為革命犧牲，政府給定的烈屬是假的。我不承認，他們就往死裏打，十幾個人拳打腳踢，用繩子沾著水抽我，用棒子打，打得我鼻、口冒血。我父親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三八年入黨，四二年冬被日本鬼子用刺刀

刺死在刑場上，就義時才三十六歲。光榮烈屬是我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是黨給我們家的光榮稱號，打死我也不能承認這是假的。他們用了幾十種刑法，僅舉二例：把我吊在房梁上用鋼絲鞭打，用泡水的麻繩和鐵棒打我，打死過去用冷水澆頭，醒過來再打，我還是不承認。他們氣急敗壞，把我的兩隻腳上墜上十多斤重的石頭。又把半桶水掛在我的脖子上，直到我昏死過去。

第二天又變換了手法，先是十幾個人一頓毒打，把我綁在十字架上用槓子壓，死過去後，用冷水澆過來。在十冬臘月把我捆在院子裏凍，凍僵後又弄回屋裏用大火爐烤，直到暈倒在地。後來，暴徒們又把一根雞蛋粗、兩米長的鐵棍一頭捆在板凳上，讓我跪下把兩手放在中間，另一頭一個暴徒使勁壓，企圖把我的雙手壓碎，壓得我死去活來。一直整了我十幾天，晚上打，白天綁著到各村批鬥……他們又編出我家藏有機槍一挺，子彈三箱，電台一部，讓我交待。我交不出來，就在我身上像十字架一樣綁上一根五尺長的檩子，把手捆住吊起來，兩頭往下壓，幾乎把胳膊扯下來。我遍體鱗傷，幾乎動彈不得，只能在地上爬來爬去。他們還不給我飯吃，甚至連水也不給一口。我愛人每天從十幾里外的馬群往公社送飯，他們不讓見。他們還到我家抄家，挖地三尺，還威嚇我愛人，當時她懷孕在身，嚇得小產，流血不止，暈死在炕上。暴徒們一哄而散。幸虧別的社員搶救才把人保住，至今落下一身病。

他們打不成我反革命，就派人去集寧，到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張萬精同志處調查，企圖給張施加壓力。但張已被打成「新內人黨」，單位不讓見。他們在張處找到我妹妹寫給張的一封信，就以此為證據，說我們也是「新內人黨」，有攻守同盟，要我交待罪行。我和張十幾年沒見，我妹妹給他寫信，我一點也不知道。甚麼叫「內人黨」，我過去聽也沒聽說過。他們為

此把我整死過去七次。他們打我假烈屬不成，挖彈藥又挖不出來，打我「新內人黨」是沒有問題了。

我出來後才知道，家裏的人下場都很慘。如我三伯，把他雙手每個手指用麻捆住，一直捆到胳膊，然後澆上煤油，用火點著，把雙手燒傷，腫得像小腿一樣粗。三伯受刑不過，幾次自殺未遂……。

——土左旗落實政策辦公室檔案館七十三——七十四卷。

▲文革開始時，我是「四清」工作隊隊長、指導員。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我被調到呼市烏盟盟委整訓，整訓的第二天，我就被打成烏蘭夫反黨集團的「黑爪牙」、「民族分裂份子」，「雲家黑店夥計」等等。大會鬥，小會鬥了兩個多月，根據就是我是蒙族、副社長。我所在的托克托縣伍什家村是蒙漢雜居村。

一九六七年有個「二月逆流」，呼市出了一司、二司、三司。呼三司被打成反革命，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幹甚麼的，也被打成反革命。批鬥挨打成了家常便飯、炒豆子、跪板凳、脖子上挂椅子、烤火爐、站雪地。鬥完打完就放到村子勞改，不准與親人見面，甚麼時候鬥，甚麼時候再揪去。我在外面挨鬥，家裏則由公社武裝部長白炳效組織造反派和貧下中農監管。連孩子上學也不許。

一九六八年開始「挖肅」運動，我的家庭土改時定為中農成份。「挖肅」一開始，我家庭就被改劃為地主。理由是，中農成份是烏蘭夫搞「蒙族成份降一格」政策的產物。家裡的動產

與不動產都上了封條，吃糧、燒柴都得向專人申請，不批准就得全家挨餓。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上吊自殺了。當時我哥榮璉在縣受管制，我在外村勞改，侄子佟格拉在「群專」，家只有妻子和幾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公社革委會主任杜夫、武裝部長白炳效、革委會成員劉長清、大隊書記郭里在限令一天內理人。原備的棺材被沒收了，只能買些舊木板釘成箱子把老人埋了。時隔十四天，七十二歲的父親在病中被五花大綁在門板上，抬到批鬥會場，強迫老人站起來，老人站不住，就讓榮璉和另一個侄子榮德祥扶著，可憐的老人脖子上掛著盛滿了尿的尿壺，兩耳上掛著小腳鞋，被活活鬥死在會場上。半月之內，家死了兩人，這時公社、大隊又把我家成惡霸地主。全家的財產，從房屋到針線全部沒收歸公。一個多月後，在烏盟煤建工作的二哥受家庭株連而死，叔父被定為破產地主關押起來，不給飯吃，又氣又餓身亡。不到百日，我家死了四口。人死了，還不放過，挖「內人黨」，又把我父親打成「內人黨」，我和哥侄們都成了「內人黨」，關在黑屋日夜拷打，重刑之下，我的胸椎骨折，成了終身殘廢。

我一九五一年就參加了革命，當時剛十五歲。當年入了共青團，二十二歲當上了鄉長，二十五歲入黨。成立公社後當了副社長，是黨把我培養，教育成國家幹部，我對黨忠心耿耿，沒想到卻落了這麼一個結果。

——托克托縣伍什家村榮第《回憶錄》

颶風所到之處，連負責挖「內人黨」的專案人員和他們背後的指揮者也難逃厄運。「揪叛站」成員盧珍（原內蒙語文研究所幹部）外調回來後亦被打成「新內人黨」。前面提到的革委

會專案辦三組負責人宋克才十年後寫到：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樹德命我回本單位，我回法院後，李樹德在專案辦點火說：「宋克才很不得力，可能是右傾，也許他就是「內人黨」……」

李樹德這幾句話也是把我打成「內人黨」骨幹的一條禍根，害的我夠嗆。曾幾何時還在為挖「內人黨」出謀獻策，並親自坐陣「巴圖專案組」的政治部副主任郭以青，此時也被「隔離審查」。他的罪名倒不是「內人黨」，而是連他也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兩面派」。

「挖肅」到了這步田地，真可謂「無理可講，無法可想」了。

並不是沒有人向上反映真實情況，也並不是「三套馬車」和中共中央對此一無所知。然而，從北京到呼市的袞袞諸公從未把這種「擴大化」當回事。舉兩個例子——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間，滕海清收到了一份《緊急報告》，《報告》是三個內蒙古革委會委員寫的，它的產生很偶然。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間，區革委會在伊克昭盟東勝旗召開文教工作會議，區革委會常委李德臣（軍隊幹部）、王金保（工學院學生、內蒙古四大造反派領袖之一）、劉文研（內蒙古師範學院教師）前往參加。三人發現這裏的「挖肅」簡直匪夷所思——與他們同住一室的當地的旗武裝部長在會議結束的那天晚上，憂心忡忡地對他們說：「別看我今天還在這兒開會，明天就可能被人家抓起，變成『內人黨』。」他們以為他在開玩笑，沒想到，第二天早晨，他們三人

正在街上走，迎面來了一夥「群專」的人，那位武裝部長被五花大綁押在中間。三人大跌眼鏡，驚駭之餘以區革委會常委的身份上前詢問，得知，因為有人揭發他是「新內人黨」的武裝部長。所以當地革委會決定把他送到「群專」去立案審查。

為了緩解緊張的神經，三人決定到離東勝不遠的王愛昭去。王愛昭是達拉特旗的一個昭廟，有名的旅遊勝地。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們所乘的吉普車仿佛是洪水猛獸，當地人，不管男女老少，老遠一看見它，就四散奔逃。街道為之一空，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命令司機加大油门，終於追上了一群往山裏狂奔的人們。劉文研認出人群中一個小夥子，過去是他的學生，就急忙跳下車，一邊攔他，一邊大叫他的名字。那驚恐的年輕人認出攔他的是昔日老師，雖然停了下來，但還是做著隨時逃走的準備。劉跟他解釋他們是來旅遊的，那青年才慢慢安靜下來。

他對他們三人講了他們奔逃的原因：「這些日子旗裏常下來抓人，抓『內人黨』，誰都能被抓，抓住就送『群專』，往死裏打。抓人的都坐這種車。當地人有了經驗，一見這種車就往山裏逃。在山裏躲個十天半個月的，等沒事了再回家。」

聽了這番話，三人遊興全消——看來違反政策的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他們又找了些人調查，發現事態已相當嚴重。於是連夜給核心組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專講當地違反政策的問題。李德臣、王金保和劉文研回到呼市後，很快就受到滕海清的召見，滕告訴他們：看了你們這兩老一少（李、劉的年紀大，王的年紀輕——作者）的報告，我很高興。你們的報告寫得很好，很有水平，反映的問題很重要，違反政策的問題在別處也有，核心組要認真研究。」三人深感欣慰，以為自己立了一功，問題很快就能得到解決。

他們高興得太早了。滕海清說一套，做一套。三個月之後，以反「九月暗流」為動力的、更大規模的暴力潮把「挖肅」運動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四人幫」、康生等人在這場革命中確實起了很壞的作用。但他們的作用是有限的。深切地關注蘇修、蒙修動向的中共中央，對內蒙古的局勢是瞭解的。但是，出於維護文革，保護「群眾積極性」的考慮，出於「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滕、吳、高）的策略，以毛為首的黨中央並不想正面干預。他們所做的只是輕描淡寫地提醒，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都曾在肯定大方向的前提下，提醒過內蒙核心小組。唯一單獨向滕海清提出注意政策問題的是周恩來，然而，周所做的仍是輕描淡寫。

一九六八年國慶前夕，周恩來接到一封錫盟來信，信是他在阿巴嘎旗插隊的侄女周秉建寫的。

她在信中談到了當地挖「內人黨」的瘋狂和殘忍。她不明白「這樣一些純正坦蕩的人，怎麼會成為牛鬼蛇神、叛逃者、反革命？」周恩來通過北京軍區的陳先瑞轉告滕海清：「錫盟有一名下鄉青年反映那裏有打人的現象，請注意防止類似事情發生。」滕海清委託秘書辦理此事，可他的秘書根本沒跟錫盟工作隊聯繫上。他呢，日理萬機，這區區小事，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既沒有向秘書查詢，也沒有向核心組彙報。其實就是他查詢了，彙報了也沒用。與中央的極左指示和大力支持比起來，這類提醒不過是微乎其微。而且它們從來都是例行公事——歷次政治運動不是一直在講政策嗎？而事後不總是「擴大化」，平反冤假錯案嗎？

十七個月「挖肅」運動戰果記略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挖肅」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八年四月，是「挖肅」的興起，展開的時期。

第二階段：一九六八年五月——六八年十一月，是「挖肅」的深入發展及與各種抵制力量鬥爭的時期。

第三階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九年五月，是「挖肅」達到高潮的時期。

原始人殺活人以祭神，現代人挖敵人以獻禮——黨的九大的「勝利」開幕而獻上自己的一片忠誠和同胞的一身血肉。為了「挖肅」的決戰決勝，六八年十二月初，區革委會成立了「深挖『內人黨』領導小組」，滕司令親自掛帥。同時，革委會下達文件：把清隊工作推向農村、牧區，將敵人統統挖出來。又在全區進行「內人黨登記」。沒在指定時間內登記的，一律按敵我矛盾處理。「挖肅」的戰果在這些政策的指導下與日俱增。

下面可能是本書最枯燥、最壓抑、最悲慘的文字，同時，它也是作者最少加工的一節。它將由各種統計數字、口述材料、回憶錄和採訪筆記組成。

以揭批「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挖「新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清理階級隊伍為主要內容的「挖肅」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內蒙古革委會建立開始，中經四落五起，至此（一九六九年四月）已歷時十七個月。在它被毛澤東宣佈為「擴大化」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它取得的「勝利」成果。

下面是「批滕派」實地調查後公佈的哲、巴、錫、伊、昭、烏五盟中若干旗、縣、公社和生產隊的統計材料。

哲里木盟

以盟西南與遼寧省為鄰的奈曼旗為例，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六九年二月，挖出各種壞人六千餘名，平均每天挖出四十人，佔不到三十萬的全旗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該旗南灣子公社的「挖肅」成果如下：

- 南灣子公社七個生產隊中挖出國民黨員一千一百八十人，其中韓山皋生產隊只剩下三、四戶好人，其餘諸戶從三、四歲的孩子到六、七十的老人都被打成了國民黨。該公社的貧下中農、共產黨、老土改幹部、榮復轉軍人被打死、逼死三十多人。

- 東明公社被打成國民黨的幹部、社員有九百餘人，非正常死亡四十二人。

- 八仙筒公社挖出六個國民黨支部，兩個「內人黨」支部，被打死三十多人，公社的兩個造反組織：旗「紅聯」的下屬基層組織「八一三司」和「紅造反」，前者被打成「內人黨」變種組織，後者成員共十七人，其中十六人被打成「內人黨」骨幹分子。太平莊一個七十多歲的蒙古族貧農老大爺，被打成「內人黨」變種組織——「好人黨」骨幹。

- 葦蓮蘇公社在抓「內人黨」變種組織的過程中，將原公社黨委秘書李坤打成「好人黨」頭目，黨員、幹部、貧下中農（牧）、榮復轉軍人百餘人被打成「好人黨」徒。打死三十多人。

巴彥淖爾盟

以狼山腳下的烏拉特前旗為例，全旗二十餘萬人，十六個公社，僅旗直屬機關和六個公社中就挖出三千一百名「內人黨」。因逼供信致死及自殺身亡者八十餘人，自殺未遂者四十餘人。輕、重、傷不計其數。該旗造反派組織「東聯總」被打成「內人黨」變種組織，其頭頭都成了「小高錦明」。

●白彥花公社，公社一級的幹部十二人，全被打成「內人黨」，其中十一人被專政。一人被打死。該公社衛生院職工二十七人，計劃挖出三十二人，實挖二十五人，差額在家屬中補齊，六歲小女孩也被提審。

●明安公社一萬八千人，挖出「內人黨」一千二百人，十五人中就有一個「內人黨」。死三十四人，其中貧下中農二十三人。公社貧宣隊負責人說：「這裏的文革發展史就是：『內人黨』與『內人黨』鬥爭的歷史，找一個可靠的人比上天還難。」

錫林郭勒盟

以舊稱「炮台營子」的太仆寺旗為例。

●旗直屬機關情況：揪出「內人黨」二百一十三人，「內人黨」嫌疑犯三百六十六人，其中包括工人、貧農一百三十一人，黨團員一百一十三人，造反派一百四十三人。直屬單位中的環節幹部七十四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四十四人。

●各級革委會情況：旗革委會常委十一人，因「內人黨」被專政的三人，被打成「小高錦

明」的一人，靠邊站的三人。寶昌中學革委會委員七名，五人被打成「內人黨」，一人是「內人黨」嫌疑犯。水利隊革委會成員五名，四人被打成「內人黨」，一人被精減。二機廠革委會成員十一名，被「吐故」八人。

●造反派情況：旗直屬機關被打成「內人黨」的二百一十三人中，有一百四十三人是造反派，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五星公社四十六名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全部被揪。寶昌中學「六七造反團」七名頭頭全部打成「內人黨」。農牧系統造反派頭頭除二名是重大嫌疑犯，其餘八名全被打成「內人黨」，原旗人委「古田戰鬥隊」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黨支部情況、旗直屬機關單位共有二十七個共產黨支部，被打成「內人黨」支部的有十七個。公檢法黨支部的十二名支委都被懷疑是「內人黨」。

●公社情況：五星公社三千人口，揪出「內人黨」三百八十四人，懷疑對象一百二十人，其中工人、貧下中農一百一十三人、黨團員一百一十六人，公社幹部十四人，大小隊幹部全被揪鬥。其他十幾個公社主要挖出的是「反動聖母軍」。共挖出一千六百八十四人。

●全旗共打死三十八人，僅五星公社就死了二十七人。

清代為皇室養馬地的鑲黃旗

●幹部及革委會成員情況：全旗科局級幹部九十三名，八十六名被打成「新內人黨」，佔百分之九十二。旗革委會之下有二十個革委會，九個公社革委會，結合幹部一百五十五人，被清理、停職、揪鬥、靠邊站的佔百分之五十三。

| 類別 | 蒙族 | 漢族 | 黨員 | 團員 | 幹部 | 警察 | 貧下中牧 | 轉業軍人 |
|----------|-------|-----|-------|-----|-----|-------|-------|-------|
| 原有人數 | 74 | 4 | 43 | 13 | 34 | 44 | 70 | 24 |
| 被打成內人黨人數 | 72 | 3 | 42 | 12 | 33 | 42 | 68 | 23 |
| 佔原有人數的比例 | 97.3% | 75% | 97.7% | 92% | 97% | 95.5% | 97.7% | 95.5% |

●共產黨支部情況：全旗共產黨組織，有旗委一，總支一，支部六十三個，九個公社黨委，全被打成「新內人黨」黨委或支部。

北部與蒙古接壤的東烏珠穆沁旗

該旗公檢法系統於一九五六年建立，當時只有二十多人。一九六三年出於反修需要，又增設七個邊境派出所和一個城鎮派出所，人員達七十八名。被打成「新內人黨」份子六十一人，嫌疑犯十四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六。詳見下表：

昭烏達盟

以歷史悠久的翁牛特旗（漢譯：神聖）為例：

●概況：全旗人口二十九萬，挖出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人，其中「真理黨」七百五十七人，「內人黨」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反動聖母軍」一千五百二十九人。

●幹部情況：旗革委會三名革命領導幹部，一名被打成「內人黨」骨幹，二名懷疑是「真理合眾黨」。旗直屬單位結合的幹部共二十五人，其中有十四人被揪鬥，另外懷疑為國民黨的一人，炮轟的四人，僅剩下六人沒問題。結合到各公社的領導幹部二十三人，被揪鬥的五人，懷疑為走資派的老班底「三黨一軍」（內人黨、統一

黨、大眾黨、內人軍）的八人。免職三人，剩下七人。

●吐故情況：在整建黨中，各級革委會中被揪出、停職、撤職四百三十九人。海日蘇公社黨委被打成「內人黨」黨委，下設十八個支部有十七個成了「內人黨」支部，一百六十六名共產黨員中有一百六十五人被懷疑是「內人黨」，六十七人被專政。

●造反派情況：原「東方紅」九名常委中有七名被揪，其中六人被專政。下屬的十二個兵團總部有十一個的主要負責人被撤職。「烈火團」成員百分之六十五或被捕，或被敦促投降。其中「赤遍全球」戰鬥隊，被揪得只剩下二人。「聯合兵團」頭頭共十三人，九人被捕，三人被敦促，只剩下一人。

●逼供信情況：使用各種刑法八十餘種，如手指扎針、拔鬍鬚、耳朵眼放爆竹、烤爐、凍冰棍等等，把人當牲口侮辱。多數被捕者手拷、腳鐐加身。「紅山綜合場」製造許多刑具，公開出售。全旗被打死、逼死二百九十七人。

伊克昭盟

以位於鄂爾多斯高原西北部的杭錦後旗敖瀨寶力格牧場為例：

●全牧場共有五十二戶，蒙族佔四十一戶，除四戶牧主外，其餘全是貧牧戶。人口二百五十二人，其中蒙族一百八十八人，共產黨員九人。挖出「內人黨」五十七人，佔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九名共產黨員中有八人被打成「內人黨」，共產黨支部全部成了「內人黨」支部，共青团支部有一半被打成「內人黨」支部。

● 全場幹部七人，其中蒙古族五人，全部被打成「內人黨」。
● 在挖出的五十七名「內人黨」中，貧下中牧三十七名，佔所挖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造反派五十三名，佔所挖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

內蒙古共有七盟二市（現為八盟四市），上引材料僅及五盟，餘下的兩個盟的情況，地方誌和中共文件為我們填補了空白：

烏蘭察布盟

以烏蘭夫的老家，土默特左旗為例。《土默特誌·政治誌》，載：「在『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餘毒』和挖『新內人黨』等運動中，因刑訊逼供致死、致殘二千一百八十三人。其中致死三百三十一人，致殘一千八百五十二人。在颶『紅色風暴』、搞『二次土改』中，新劃地主、富農成份二百一十九戶。其中，蒙古族一百一十一戶。另外，各公社，大隊自行決定上劃成份，批鬥抄家共二百餘戶。因『黑四清』案受牽連批判的有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五人，被定成反動性質的群眾組織及地區單位有十一個……經盟、市、旗革委會批准定性為『烏蘭夫黑幫』、『黑線人物』、『烏蘭夫死黨』、『烏蘭夫反黨叛國第三勢力』、『內人黨骨幹份子』等，將要處理或準備處理的各級領導幹部二百三十九人。因抄家、造反、破『四舊』、『退賠多留一份自留地』等造成的經濟損失——全部九百零四萬（9,043,032）元。為運動中致傷、致殘者就醫及生活補助共支出四十七萬三千三十六元。」（下卷第二百二十四頁）

呼倫貝爾盟

以三個非蒙古族自治旗為例：

● 全民族人口僅兩千多人鄂倫春自治旗，大人小孩幾乎都打成「反黨叛國集團」。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內蒙古人民政府《關於林彪、江青「四人幫」製造「內人黨」假案的報告》

● 鄂溫克自治旗、達斡爾自治旗的少數民族都被打成「統一黨」，死、傷、殘者甚眾。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挖新內人黨死難者子女」上告信

這些統計材料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它們包含著多少血淚，多少哀痛，多少慘絕人寰的故事。陰陽隔絕，冤死者的綿綿長恨我們無法測知，但時空和強權卻抹不掉生還者的記憶。

死難者家屬的証詞

原內蒙工學院動力系研究生，後移居美國夏威夷，從事風力研究的騰和先生，為筆者講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媽（于淑紫，蒙族）原是錫盟黨委辦公室主任，一九六四年，我爸爸（那順巴雅爾，蒙族）被人誣陷，被捕入獄，我媽被貶到錫盟醫院當黨委書記。六八年九月的一天晚上，我媽又要出去開會，臨走時對我說了一句話：「騰和，你記住，你媽不是『內人黨』」。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說：「您早點回來」。那時，她每天晚上都去開會，我們都習慣了。當天夜裏，我突然從熟睡中驚醒，一看，屋裏亂糟糟的，站著好多人，門被砸壞了，頂棚被劃開了，幾個人正

用鐵鍬、大鎬挖地，我一骨碌爬起來，找我媽，媽不在。我問他們來我家幹甚麼？他們說：「你媽是『內人黨』，家裏藏著電台。」當時我的兩個姐姐都去插隊了，二姐的行李捆好了還沒拿走，他們要打開檢查，我不讓，一個壯漢，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上。他們挖地三尺，沒找到電臺，卻找到了別的證據——我家有輛菲力浦牌的自行車，文化革命一開始，我和姐姐就把車上的標誌用刀子刮了，可刮的不乾淨，上面還有MADE IN ENGLAND的字樣，他們說，這是國民黨的黨徽，還有一塊我媽在供給制時攢錢買的瑞士表，也成了反黨叛國的罪證。

這些人走了之後，我把睡熟的弟弟、妹妹叫起來，狠狠地罵了他們一頓——媽媽都被抓走了，你們還傻睡！那時我十三歲，妹妹九歲，上三年級；弟弟七歲，剛上學。從此，我成了弟弟、妹妹的保護人，成了一家之主，一夜之間我就變成了男子漢。

當時，我家住在醫院宿舍，離宿舍不遠有四排新房，「內人黨」就關在裏面，怕他們跑了，房子四周用鐵絲網圍起來。每天晚上，裏面傳出來的審訊聲、拷打聲、慘叫聲，讓人毛骨聳然。弟弟妹妹嚇得直哭，喊著找媽媽。我硬著心腸讓他們把頭蒙在被子裏，給他們講故事，哄他們睡覺，等他們睡著了，再把被子打開，免得被捂死。

媽媽被抓走的第三天，一個看守告訴我，媽媽已經吃不下飯了，讓我送點吃的。送飯前，得先到專案辦公室檢查，專案組全是醫院的大夫組成的，坐在桌子後頭，醫院的工人——燒鍋爐的、司機、炊事員是打手，站在兩邊。這些人平時見我媽一口一個「于書記」畢恭畢敬。現在個個兇神惡煞一般，他們罵我是「小內人黨」，「小特務」。我送去的饅頭、雞蛋都被用鐵鉗子捅爛。媽媽被打了七夜，快死了才住手。盟委的部長們打得熬不過去，紛紛交待，說我媽

是錫盟「內人黨」黨委書記。可我媽一個人也沒有亂咬。後來，她對我說：「咬了誰，誰受罪，有罪讓我一個人受吧。」我提出想見見我媽，專案組不讓，理由是，我媽看我們活得好好的，就更不交待了。事後我才知道，專案組為甚麼抓我媽，部長們為甚麼咬我媽，就是因為我父母參加革命早，資格老。我媽的入黨介紹人是烏蘭夫的妹妹雲清，我爸的入黨介紹人是內蒙副主席孔飛。他們六十年代初調到錫盟，被認為是烏蘭夫為進行反黨叛國活動而有意安排的。專案組從我媽嘴裏掏不出證據，就在我們唯一的親戚——我小姨身上下工夫，小姨是糧食局的打字員，被捕後倒沒怎麼挨打，只讓她看著我父母受刑，她受不了，得了神經病。舉目無親，只有我拉扯著弟弟過活，幸虧媽媽的工資還照發，可糧店不賣我們細糧，只能買玉米麵，我們天天吃貼餅子。家裏不斷有人來抄家，街上的孩子欺負我們，罵我們是「內人黨狗崽子」走到街上，磚頭、瓦塊常常砸到身上，一個鄰居是醫院掛號處的，看我們可憐，弄了一條狗，這是條良種狗，很厲害。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叫「尼斯葛」（蒙語：飛）它給我們看門，頂了大事。學校復課鬧革命，那麼多年沒招生，學校裏人滿為患。一個蹲了兩年班的工人子弟衝我喊：「家裏有問題的給我滾蛋！」我被趕出了校門。心想，不上學就撿破爛吧，以後媽媽的工資不發了，我還可以靠撿破爛養活弟弟、妹妹。在外面受欺負，我們就在家裏養起了貓和兔子，兔子繁殖的特別快，沒多久就有了二十多隻。貓生的崽死了，就把小兔抱過去喂。看到這情景，我偷偷地哭了，這是自媽抓走後，我頭一次掉眼淚——動物之間還有愛，還有溫暖，而人的世界卻是如此殘忍無情。

六九年春天，山坡上的野韭菜長出來了，我聽說媽媽被轉移到了倉庫，就每天騎輛破車到

倉庫附近轉悠，假裝採韭菜，盼望著能看到我媽一眼。有兩次，我真看見了媽媽，她出來放風。看著她，我心裏好難受呀，她的臉慘白慘白的，原來的滿頭黑髮幾個月就變成了花白，臉腫得老大老大，走路一癱一拐的。

心裏常怨怎麼有這個爸爸。八二年，他死了，我為他寫悼詞，見了不少人，看了不少材料，才知道他受了多大的冤枉，忍受了多少非人的刑法。

他十九歲參加革命，一九四七年入黨，六四年被一個右派陷害，被打成反革命被押入獄。六八年又成了「內人黨」，受盡折磨，刑法之一就是鐵絲勒他的眼睛，眼珠都被勒出來了。他原來是個壯漢，放出來時，已經骨瘦如柴，渾身是病，一九八二年死在錫盟科委主任任上，才五十六歲。給他換衣服時，我才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傷疤，肩、背上、胸前、腿上、棒傷、燒傷、釘傷、刀傷，傷痕累累，不忍目睹。聽我媽說，當時把他兩手釘在木板上，用皮鞭抽，棍子打、用火燒，他的每隻手上都有四、五個透掌疤。

也不知怎麼回事，一想起我家的事，我眼前就浮現出祥林嫂拄著竹棒，挎著破籃子，在大雪紛飛的夜裏蹣跚獨行的身影，就仿佛看到了她那呆滯無神、哀苦無告的目光。我看的文學作品不多，也不想多看。輕鬆幽默的我樂不起來，悲傷痛苦的我承受不了。往事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我的心上，一想起過去，就像走進一條沒有盡頭的隧道，漆黑一團，冰冷刺骨，只有我和我的弟弟、妹妹……

前面提到的，原托克托縣伍什家公社，公社副主任榮第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九六九年春，中央指示落實政策，解放軍進駐公社，我聽了非常高興，以為這下可得救

了，因為我從小就熱愛人民子弟兵。萬萬沒有想到，解放軍一個姓魯的的班長帶著幾個戰士，一個夜裏就把公社書記李萬春的胳膊打殘廢了。然後就朝我來了，拳打腳踢打了大半夜，逼我承認是「內人黨」骨幹。這一下，我徹底絕望了。共產黨不相信你，解放軍也往死整你，我還有甚麼活頭？信用社的楊萬財已經在這間屋裏上吊死了，我想好了，一旦能爬起來，就在他上吊的地方吊死。幸虧那天晚上，給公社做飯的王寬世找到貧宣隊和解放軍，說：「從六六年老榮第就挨鬥、挨打，家裏已經整死了四口人，現在他只剩一口氣了，再打，就要出人命啊，到那時，看你們怎麼交待！」這樣，解放軍又出來做工作，講政策，我才免於一死。

托克托縣五申鄉的雲白女告訴筆者：

我的男人李福寬被公社抓去才兩天就死了，公社的「群專」叫我去領屍，我不信。走時是個大活人，挑個子（用鐵叉將成捆的莊稼裝到馬車上去），打旱坯（一種不用加水打制的土坯），一個頂倆，多好的身板，咋能死呢？「群專」說是自殺，我還不信，他下有四個沒長大的兒，上有沒盡孝送終的老母，被抓前還跟我合計著買木料蓋新房，咋會撇下俺們這孤兒寡母去死呢？人家說他是畏罪自殺，他有甚麼罪？「內人黨」連他的爺爺都沒聽過，沒有的事能說成有？可人真的沒了，上吊死的。我哭哇，這一家人，大兒才十歲，小的懷抱著，可咋活呀……給死人換衣服時，我才發現不對頭——這人身上怎麼一股焦糊味？一細看，那肛門裏裏外外全燒爛了！我這才明白人是咋死的。那「群專」不是人呀！他們用燒紅的鐵釘子從肛門捅進肚子，把人活活捅死了呀！

俺男人這麼冤死了，那些「群專」的在公社裏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繼續整人。我不能讓

孩子他爹白死！我領上大兒，寄放小的，到呼市告他們去！我們娘幾個忍餓挨凍去了二十幾趟呼市，告不准。我一咬牙，去了北京，一路上全靠討吃要飯才活下來……。

第一份揭露真相的大字報

逝者如流，民心長在。內蒙古在文革的泥淖中翻滾撲騰了十年之後，「挖肅」運動的「偉大成果」再一次被曝光——一九七八年五月內蒙古高級法院人民院對面的高大影壁上出現了一份數萬字的大字報。它的題目是：「徹底揭批林彪「四人幫」在內蒙地區推行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路線，屠殺少數民族共產黨人的滔天罪行」。大字報的署名是，「挖『內人黨』死難者子女：——達楞哈日（漢譯：大青山）」。

儘管這份大字報的某些記憶不夠準確，某些表述不夠清晰，思想觀點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的局限，但是，它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尖銳性和大量史實震動了呼市，傳遍了內蒙，也引起了北京當局的密切關注。為節省篇幅，這裏僅將其與本節有關的內容摘錄於下：

從此，大挖「新內人黨」運動在全區開展起來，大搞逼供信、車輪戰、強姦、輪姦等達幾百種超法西斯的新式武鬥手段和污辱技能在七盟二市推廣開來（這裏要比一九七八年三月份《人民日報》登的上海科學院的冤案不知嚴重多少倍——原註）。當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滕海清彙報已出現打死人的問題時，他在大會上大發雷霆地說：「死幾個人有甚麼大驚小怪的，不能手軟！」還說：「林副主席說：『殺敵一千，還要自損八百嘛。』我們

的群眾還沒有徹底發動起來，『新內人黨』還沒有被徹底粉碎，還要大力發動群眾，大打人民戰爭。」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份，自治區旗、縣以上單位的蒙族負責幹部已基本被打成「新內人黨」。豐鎮等地開始挖到漢族幹部身上。這時，高錦明同他的謀士權星垣、郭以青、張魯等人策劃之後，跳出來做了一個「九二五」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是：「新內人黨」基本上已挖出來了，再挖就挖到自己頭上了。擔心被自己潑出去的禍水淹沒。如果當時按高錦明的意見停止，人民群眾不會起來批滕，那麼被挖的所謂「新內人黨」就永遠休想翻身，高錦明也就成了「反烏英雄」。如果老滕不聽意見挖出了問題，高錦明就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真是一箭雙雕。然而滕海清按照「四人幫」的指示繼續挖「新內人黨」，把好端端的內蒙古挖成了「洪洞縣」。

我們痛心地看到，原自治區的核心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在林彪、「四人幫」的直接指揮下，不遺餘力地迫害老幹部。一九二二年參加革命，幾十年為黨工作的蒙族老共產黨員吉雅泰同志，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被一群暴徒揪出去，在光天化日之下鬥死在街頭。參加過毛主席「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蒙族老共產黨員高布澤博同志和勇夫同志活活被打死；內蒙高級法院院長，老特木巴根同志被打死了；內蒙人委副主席哈豐阿同志被逼得了重病，不得治療而死；內蒙人委副秘書長嘎日布僧格同志被活活打死，死後還給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聽說最近在華主席的關懷下才得到昭雪，但內蒙古黨委至今不予宣佈平反。

被打死的還有：民政廳長烏日圖、衛生廳長胡爾沁畢力格、衛生廳副廳長古納、農機局副局長剛嘎木仁、內蒙團委副書記沙梯、內蒙醫院副書記娜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烏

日喜葉勒圖同志。因為打「新內人黨」落下後遺症，到唐山學習班之後死去的有：氣象局副局長沈善元、農業廳副廳長張昌會、呼倫貝爾盟委書記關布扎布同志等人，跟黨搞革命幾十年，他們是作夢也沒有想到落了個這樣的下場。而殺人犯至今未受到懲辦。他們不但受到保護，有的還掌了大權。

此外再舉一些挖「新內人黨」中被打而慘死的事例，讓我們仍然活著的人永遠懷念他們吧！如：

內蒙物資局的金雪雲同志，共產黨員，被兇手用鐵鉗子將她的牙齒一個一個地拔掉，將鼻子、耳朵都給擰掉，打得她快要死的情況，她仍然堅持原則，不出賣一個共產黨員的靈魂，不陷害自己的同志，最後被兇手們折斷了腰而死去。

伊盟的小白秀珍同志（蒙古族）被兇手們打得快死的情況下，那無惡不做的劊子手還輪姦了她，然後將爐釘子插進其陰道，把腸子都拉出來，小白秀珍就這樣慘死在暴徒手中。

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公社隱瞞富農成份，混入革命群眾隊伍中的郵遞員潘秀玉，在挖「新內人黨」中，把該公社秘書敖日布扎木蘇抓去，用刀子把他身上的肉一道道割開後，把食鹽揉進去，再用燒紅的烙鐵燙傷口，名曰：「焊人」。敖日布扎木蘇被活活整死後，又將其妻子道爾吉蘇抓來，對她進行多次姦污後，把爐釘子燒紅插入其陰道，活活把她捅死，當兩口子都被殺死後，家裏只有一個不到五個月的孩子也被餓死了。

達茂旗旗委書記包國良的愛人被抓「新內人黨」後，兇手們用繩子拉大鋸，將其陰道和肛門拉通。成了終生殘廢。×盟書記的老婆被抓「新內人黨」後，兇手們將她打的半死

，並在她的陰道內放炮，使其致殘。

像這樣的刑法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是一種創舉了。西蘇旗都和木公社被鎮壓的反革命群眾的兒子，把貧牧社員呼和阿爾斯楞打死後，將其女兒霸佔為妻。達茂旗白音花公社白音查大隊幹部蘭米栓（一貫不務正業），在挖「新內人黨」運動中霸佔了被打成「新內人黨」的牧民的妻子，當那牧民放出來之後，蘭米栓一九七二年還去找人家要孩子，說：「你那個小孩是我的……」結果把那男人逼瘋而死，女人也因種種打擊病死（這一家徹底絕了根）。

達茂旗賽胡洞公社的高越，強迫回民喝豬肉湯，不喝就扣上「大眾黨」（「新內人黨」變種組織）的帽子。還強迫回民姑娘與漢族結婚。回民隊書記者爾同志被高越等人打得跳井自殺，因井裏沒水未死，被高越等人發現後，下井用繩子套住者爾的脖子，當者爾喊「毛主席萬歲」時，就往上吊，就這樣被吊死。該旗農林局幹部李福旺（當過土匪）在挖「新內人黨」中，給共產黨員灌人糞尿，強迫回民吃豬肉，把人活埋後再挖出來，把活人拖在馬後，活活拖死……。

東蘇旗寶力格公社，在挖「新內人黨」中，一些反革命份子把老牧民策部格扎布老兩口抓來，把他兒子兩口也抓來，當眾強行將四人的衣服、褲子剝光，強迫母子、公媳當眾性交。當他們反抗時，兇手們就動手先把母親按在地，然後將其兒子壓到他母親身上，對公媳也如法炮製，兇手們還高興得狂呼亂叫：「你們還怕羞嗎？你們蒙古人歷來不就是這樣嘛」！其母不堪忍受這種史無前例的非人的民族污辱，放回家後立即自殺了。

達茂旗白音敖包公社的楊秋遠（一貫道徒），在挖「新內人黨」中打傷多人，把抓來的「新內人黨」徒的衣褲強行剝光，在男性的生殖器上栓上繩子，讓女「黨徒」赤身拉著繩子，逼著女的一邊唱「北京有個金太陽」，一邊扭著秧歌舞，繞著村子轉。

東烏旗鹽池公社供銷社副主任東日布，在挖「新內人黨」中失蹤，當時，印發了一千多份通緝令，並揚言說：有人看到東日布領著蒙古的邊防軍，在蒙古邊境上巡邏。他的家屬被打成叛屬。可是一九七二年拉鹽的人們從鹽池裏撈出一具屍體，正是東日布。原來他是被兇手們打死後，扔進鹽池的。

錫盟西烏旗公社黨委書記卻紫木蘇同志，堅持原則，既不承認自己是「新內人黨」，也不胡亂咬人。被李秀英（女，漢族，但有蒙古族名，叫斯琴）等兇手吊打、火烤、刀割、不讓吃飯、喝水。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李秀英用鐵器猛擊紫木蘇的頭部，打出腦漿而死。

原達茂旗烏蘭圖格（召河）公社第一書記郭金榜，挖「新內人黨」時在滿都拉（邊境）公社當書記，對工委秘書切日邁格其同志用種種刑法逼供「新內人黨」。逼供無效後，又用槍斃相威脅，並真的把他架出去，郭金榜親自站在他身後，向他頭頂上開槍搞假槍決，切日邁格其受驚嚇而神經失常，無法工作，女人也離婚走了。

還有很多被打死的人，當時被定罪為「自殺」、「叛國」等等，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打死後扔下樓去，吊在樹上，投進井裡，埋到地下，扔進鹽池，放在火車道上壓爛。有的被打死後，放在床上，用一根鞋帶往床頭一掛，也叫自殺。如錫盟白旗武裝部政委紮特就是被兇手打死後，用鞋帶拴在床腿上的。

土左旗巴其公社沙爾沁大隊沙爾沁小隊是一個有二百來人口的純蒙古族村，全村老少都被打成「新內人黨」。巴其公社婦聯主任、中共黨員雲全全被抓到公社，要她交待烏蘭夫宮廷政變時殺漢人用的七十多把刀子放在哪裡？本無其事怎能交待出來，被打得不能動後，用毛驢車送到窯子灣小隊繼續嚴刑拷打。打死後挂在一顆小樹上「上吊死了」。七天後，又將其老伴，貧農保管員雲敖其爾抓到西梁小隊，還是要那七十幾把殺人刀。有的兇手說，老頭子可能把刀子和死人一起埋了，於是又把埋葬不幾天的雲全全的棺材刨出來，把他打死後把屍體送到十來里外的鐵軌旁，誣為撞火車自殺。但死者除頭顱有兩個窟窿外，臉面、衣服均無損傷。兇手卻由此成了「挖肅積極份子」，受到保護，並被安排到紅房子大隊當中學教師。雲敖其爾的兒子雲志堅是內蒙監獄的幹部，被打殘；他愛人的兩個哥哥雲德生、雲毛吉被打死一雙。

打「新內人黨」結束後，因傷殘等後遺症死亡的人也很多。還有幾十萬共產黨員、貧下中農（牧）、工人、革命軍人、知識份子、學生因不承認自己是「新內人黨」而被打得腰斷骨折，有的成了終身殘廢。如巴盟中後旗吳清雲同志，因喊了一聲「共產黨萬歲」被割掉了舌頭。東蘇旗的一個復轉軍人，解放戰爭中身受七處傷，兇手們將這七處傷又重新全部打爛。

「挖新內人黨」真是戰果輝煌，打死五萬多名（群眾調查）共產黨員、貧下中農（牧）、幹部、軍人、知識份子、學生（後遺症死的不算在內）；打傷、打殘幾十萬人，總共打

垮了包括親友在內的幾百萬人的蘇蒙修在國內的「別動隊」。

這張大字報吸引了無數讀者，有的抄錄，有的拍照，有的高聲朗讀，有的悄然淚下。這個長二十米、高三米的影壁，恐怕自光緒十六年（一八九一年）建立以來都沒有這麼風光過。白天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觀；夜裏，這個題為「屏藩朔漠」的高牆下，亮起了手電筒。幾天後，它被官方撕掉了。但是它的內容不脛而走，它的抄錄件被人們藏在家中，作者則將其印成小冊子，分寄給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和內蒙黨委。

儘管官方不願意讓這些悲慘的事實公諸於世，但是，內蒙人民政府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承認：

挖「內人黨」造成了嚴重後果。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人，緊跟林彪、康生、「四人幫」策劃與製造的以「烏蘭夫為總頭目的新內人黨」，這一駭人聽聞的大假案、大冤案使內蒙古自治區各族人民，特別是蒙古族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災難，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和難以估量的損失。

一小撮階級敵人及違法亂紀份子乘機興風作浪，到處私設公堂，刑訊逼供，使用上百種法西斯刑罰，對各族優秀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殘酷迫害。在全自治區共挖所謂「內人黨」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人，刑訊武鬥致死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嚴重傷殘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八人……嚴重地踐踏了黨的民族政策，破壞了蒙漢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關於林彪、江青「四人幫」製造「內人黨」假案的報告》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在人死畜亡、停工減產、「寧可少打三擔糧，也要多挖一個內人黨」的「大好形勢」下，吳濤滿懷喜悅地向缺衣少食的內蒙人民宣告：

革命的火車頭有力地帶動了自治區工農牧業生產，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鼓舞下，從去年十一月以來，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據呼市、包頭、昭盟、烏盟統計，十一月的產值比十月份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三，大興安嶺林管局十一月的產值比十月增長百分之六十六點五，並提前十七天全面完成了一九六八年國家計劃。一九六八年煤炭生產大大超過了一九六七年的生產水平，中央礦增長百分之十五，地方礦增長百分之十八點五。……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貧下中農在一九六八年的農業生產中充分發揚了艱苦奮鬥精神，戰勝嚴重自然災害，奪得了糧食總產×十億斤的收成。在畜牧業生產中，廣大貧下中牧……奪得了總增長率百分之十五點五的成績。（《農民運動》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十年之後，內蒙人民政府向中央報告的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由於挖「內人黨」攪亂了階級陣線……給自治區的生產建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就以畜牧業生產來說，一九六九年的牲畜總頭數與挖「內人黨」前的一九六七年相比，只一年多的時間就減少了一百二十三萬八千餘頭（只），畜牧業總產值減為一千八百八十六萬元。以自治區的工農業總產值來說，也下降了百分之十二點八。在挖「內人黨」期間，除國家和集體財產遭到毀滅性的浩劫外，廣大受害者的私有財產也遭到嚴重的損失，不包括重新劃回來的呼盟、哲盟、昭盟、阿拉善盟，光西部的四盟二市的不完全統計，損失竟達一億兩千萬元。

——《關於林彪、江青「四人幫」製造「內人黨」假案的報告》

結論：歷史真相和民族衝突的隱患

至此，「挖肅」——清查「內人黨」的是非功過已無須贅言。需要說明的是：

1、「內人黨」假案是「挖肅」運動的主要內容，「挖肅」是「前門飯店會議」的邏輯結果。沒有將烏蘭夫打成反黨叛國，民族分裂的華北局會議，就不會有內蒙的三大冤案。華北會議是中共中央授意召開的，其對烏蘭夫的定性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以「內人黨」為首的三大冤案的根本責任在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毛是首惡，應負主要責任。而其他贊成這個決議的領導者，不管是幫兇，還是脅從，都不能辭其咎。

2、因此，將「內人黨」假案說成是林彪、「四人幫」一手製造的，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到目前為止，所有官方披露的材料，都無法證實對林彪的這一指控。江青等「四人幫」對這一案件也不負主要責任。第一，他們並不是華北局會議的授意者和主持者，第二，他們不是這個會議所產生的《決議》的審批者。第三，他們的隻言片語並不能作為對此案負有罪責的法律依據。如果以此為依據，那麼類似的言論周恩來也說過。

3、康生在「挖肅」期間確實起了很壞的教唆犯的作用，但是把責任都推到康生身上同樣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康生的活動是以「前門飯店會議」及其《決議》為前提的。

4、內蒙古革委會核心小組、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人是「挖肅」運動的直接領導者，是這一假案的直接製造者，無論其動機如何，都必須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好人犯錯誤」的說法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以滕「歷史上有功」為

由，將滕海清保護起來的作法不但違反了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且嚴重地損害了以蒙族為首的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感情，極大地破壞了民族團結。

5、「挖肅」運動及中共中央對滕海清一類運動犯的包庇，使中國少數民族中相當多的民眾，尤其是他們中間的知識份子，失去了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信任。促使中國西北少數民族走向了爭取自決權、高度自治、以至獨立的道路，與此同時，它也給文革後的中國帶來了嚴重的不安定因素，八、九十年代西北地區屢屢出現的民族衝突、皆可溯源於此。「挖肅」及其後遺症，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留下了巨大隱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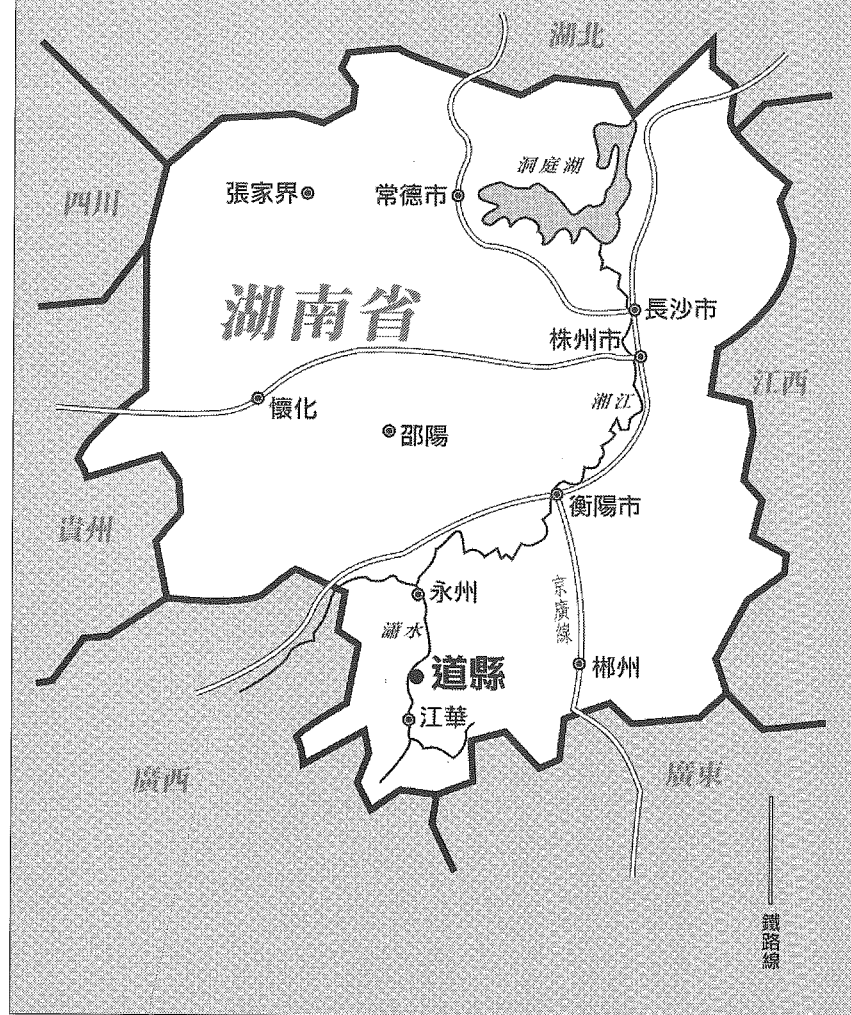
吳迪：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

◎ 章成

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

湖南省道縣位置圖





九六七年夏末，湖南道縣。那是暴雨驟來的前夕，沈悶的空氣中顫慄著緊張和惶恐。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淨與輕快，不堪重負似地喘息著緩緩向前爬去。河面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背景與殺人現場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准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口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攔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

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倖免於難。陳某被釋放後，連夜逃出了道縣，一去不肯再返鄉。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二十二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這個年輕的學子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勳，一九四二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一九四九年後在道縣當教師，並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緣故被開除回家，這時已同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二兒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面。蔣曉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哪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與其父親和幾十個地富及子女一同被殺掉。

那是怎樣一幅殘忍的畫面啊！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

可是，誰是他的同志，又有誰聽他的呢？這個不識時務的青年知識份子！顯然，民兵聶某某不耐煩了，沖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蔣曉初的頭顱。接著，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屍首被踢進了河中。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即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

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只要一陣旋風刮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人立即驚呼著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人們的心弦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梁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擔心亂飛的流彈從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來。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平常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無非為著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逼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店家只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這就是一九六七年夏末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被拋棄遺忘了。她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慄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歷史牢牢沉澱於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子又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曲曲地向前提伸，詢問著這腥風彌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兒的饑啼、還有散落於河畔讓河水溫柔拍打的一具具殘骸……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歷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歷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麼都沒發生，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我們的民族經歷過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我們已經習慣了麻木和遺忘。一九八六年七月，當筆者來到湖南道縣——這個二十年來，一直縈繞於噩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想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縣縣城與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個體攤檔、人聲喧嚷的農貿集市，刺耳的迪斯可舞曲；瀟水河倒映著專治陽萎不舉的廣告，以及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

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麼一段故事：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彙報。聽著聽著，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著誰去。他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一九八二年春，時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探親。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彙報「文革」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委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樣幽默，老老實實答道：「沒有哇，沒聽說過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

？」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氣憤地說，「殺了那麼多人，無法無天！」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秘密採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陸續抽調了一三八九名幹部，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從未對外公開。我們是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面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筆者將在後面的篇章寫到。這裏，讓我們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字，對那場殺人運動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道縣殺人事件……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六八個大隊，一五九〇個生產隊，二七七八戶，共死亡四五一九人，其中被殺四一九三人，逼迫自殺三二六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十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九〇九三人，其中被殺七六九六人，逼迫自殺一三九七人；另外，致傷致殘二一四六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份子三五七六人，四類份子子女四〇五七人，貧下中農一〇四九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四一一人。其中未成年八八二六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一四〇〇〇多人。
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十種：

- 一、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 二、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 三、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 四、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 五、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 六、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 七、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 八、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 九、火燒（含熏死）。
- 十、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些數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又有什麼不可化解的仇恨呢？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歷史背景。筆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討，因為在這篇調查報告裏，我們只想揭開厚重的歷史面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它發生過，的確確實發生過。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歷史的厚重煙雲包裹住的民族傷疤，是不為當政者所見容的，甚至不為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的民族形象。然而

，那些無辜的慘死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部份，我們的手足同胞！這場血腥的大屠殺的深層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道縣尤為慘烈？誰是這場大屠殺的真正兇手？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動亂」、「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等含混的詞句搪塞過去的。然而我們能做的只是盡可能地記錄下這段歷史，並期以給那些無辜慘遭迫害和慘死於屠刀之下的同胞討個說法，警醒我們這個樂於健忘的政府和善於遺忘的國民。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一九八五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兇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參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復辟的。毛主席說的哪里會錯？」

另一個兇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道縣「八五會議」，向農村發出製造紅色恐怖的信號

一九六七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啊！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也不例外，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縣出現了兩派對立的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門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七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升高，兩派的矛盾衝突也達到了沸點。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作「紅老保」。

像湖南許多縣城一樣，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面較高，以往遭際不平的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的勢力較大，而且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之中大多是即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物件，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援。

兩派在縣城裏相互攻擊指責，也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

八月三日——五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之所以寫下這次會議，是因為筆者認為其與此後農村大規模殺人有一定的關聯，至少，其發出了一個「紅色恐怖」的信號。現將會議的記錄摘錄如下：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下午。

地點：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辦公室。

參加人員：各區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志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熊炳恩

同志給會議作總結。

熊炳恩：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

（然後列舉了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複雜，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到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

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各區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數是區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自然聞風而動。會議一結束，星夜兼程趕回各區，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場突發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八月八日，在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先下手為強，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接管」了現有的槍枝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枝彈藥全部搶走。

「八八」搶槍後，「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面「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

感到壓力很大。八月九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搶槍後，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的地方編制，下面各區和公社的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制）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筆者認為，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慫恿，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八月十一日晚上，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門外崗哨林立，戒備森嚴。開了整整一天會的各區武裝部長毫無倦意，正在室內聚精會神地聽取「紅聯」頭頭作武鬥部署：準備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枝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會議決定，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有志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

會上，自然有加強管制四類份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的內容。（筆者實在弄不明白，兩派之間的非理性爭鬥，為什麼要把「四類份子」牽扯進來。似乎只有更嚴厲地懲罰這些早已被剝奪做人的權力的弱者，才能顯示自己是天經地義的一貫正確的革命派。）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十二點。

與此同時，在生產指揮部的會議室裏，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正在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熊炳恩佈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

薯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巧置名目地進行著。似乎誰也沒有佈置殺人。沒有！然而殺人的信號槍已經打響。紅色恐怖已經籠罩著瀟水河兩岸，籠罩著那些將成為這場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無助者及其家庭。

殺頭豬還得批張條子：第一個被祭刀的老光棍

陳智希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病痛又發作了……

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長期從事治安工作的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裏開完會回來，早已疲憊不堪。近年來雖說身體每況愈下，但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也不敢放鬆。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啟動了他心中的階級鬥爭這根弦，他睡不著啊！此時此刻，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裏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了一遍，一個格外使他惱火的影子便在前晃晃去，那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份子、軍統特務朱勉。這傢伙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來後，仍然很不安分。他憑著同共產黨打了多年交道，又有點文化，常把大隊幹部和陳智希弄得難堪。陳智希找他訓話，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稍不留神，說話讓他給抓住把柄，還要「反攻倒算」……據說甚至揚言要殺大隊幹部。

第二天上午，在區幹部會上，陳智希傳達了縣裏的會議精神，並談了本區的敵情。他說：

「同志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敵人的電臺活動，團結大隊地主分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組織……」（據「處遺工作組」調查，全部不是事實。陳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獲得這些情報的，已無從得知了。）

會後，他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勉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批鬥，殺殺他的囂張氣焰。」李來文當然贊成。

可是，僅僅「捆起」批鬥就可以了嗎？陳智希越想越氣憤：這傢伙不除掉，後患無窮！八月十一日，陳智希對壽雁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說：「你回去給胖子（指下壩大隊支部書記朱佳川）說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

朱清華對「搞掉」心領神會，立刻找到朱佳川，傳達了陳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名地緊張。有人提出置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張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口信妥不妥當？」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暫時這樣擱置起來。八月十三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的徐善明，根據陳智希的指示，躲在房裏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了意見。

何建錫說：「光是喊口號，不來點真的，怕是越抓越沒人聽了。」

徐善明深有體會地點頭：「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裏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勉到鬧子（趕墟）上來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亂

的機會，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時的何建錫就連忙迎上來：「胖子，你們大隊的朱勉搞掉沒有？」

「沒有。」

「趕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他的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則更有藝術性：「《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团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里路程，是一條砂石鋪的機耕道，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

「上面已經開口了，你們說，怎麼辦？」回家路上，支書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幹部統一認識。治保主任陳甫說：「還有什麼好商量的，上面開了口，我們就只有執行。」

一路上，議定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區、社指示；二是四類份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這樣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勉和別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天晚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沒有風，格外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說，那天午夜後，風起雲黑，下了一場暴雨。

四類份子訓話開始了。十來個四類份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牆站著。馬燈昏暗。朱勉沒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飯就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像別的人那樣誠惶誠恐。他讀過很多書

，恪守「可殺不可辱」的信條。治保主任念過最高指示後，開始訓話。朱勉斜眼瞧著，很不以為然。陳甫厲聲喝道：「朱勉，你為什麼趕鬧子（趕墟）不請假？」朱勉滿不在乎地說：「我又沒幹什麼壞事，請什麼假？」這時候，有人喊到：「朱勉不現實，怎麼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

——二十年後，參與過殺害朱勉的周吉蘭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境說：拖著朱勉出門的時候，他還不曉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裡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的一個三岔路口，一邊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裏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一下，朱勉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脚，朱勉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了下去。朱勉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斷氣了。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口裏了。回來後，好久還睡不著，心中直衝，睡著睡著，就聽得外面嘩嘩地下起雨來……

殺戒大開，第一個被滅門的三口之家

就在殺朱勉的同一天，「紅聯」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聯」總部。武鬥慘烈。「紅聯」中了「革聯」埋伏，打死二人，打傷多人，大敗而退。「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驚道縣的八一三事件。

失敗者惱羞成怒，但他們還掌控著道縣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物件發泄

，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證明，況且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

這次武鬥是否最終引爆了農村的大屠殺？從時間順序及某種因果關係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則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有理所當然的必然聯繫。

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說：「其實，下壩殺朱勉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面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裏開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的東南角，與寧遠縣交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八十華里。正當下壩大隊朱佳訓等人用群眾專政的鐵拳頭砸爛了朱勉的「狗頭」時，在楊家公社周塘管大隊的紅東廟內又秘密地醞釀著更野蠻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凸凹分明。他叫蔣文明，原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了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躊躇滿志地指示：「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採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蔣司令講完話，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的一位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他說：「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

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最後，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裏。」

周塘管大隊支書書記聽到這裏，焦急萬分地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面了！」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歎道：「階級敵人這麼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文明一笑，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接著語重心長地說：「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只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鍾佩英這號人，怎麼搞？」

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

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了一個與「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八月十四日）晚，蔣司令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了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不過這次會上，除了他的「備戰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鍾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

八月十五日晚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佈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份子，我是子女，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下面的事，就與「搞掉朱勉」基本類似了。所不同的有三個細節：第一，當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十八歲，一個二十歲，喊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第二，鍾佩英是用鋤頭棍棒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到了一個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怎麼得了？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地湧到鍾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性命結束。

事畢之後，辛苦了一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鍾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做一鍋燉起，又打來一些燒酒宵夜。待到鍋裏只剩下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雞鳴，眾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鍾佩英一家被滅門後，濫殺之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殺出了經驗和甜頭的楊家公社。那天，鄭會久早飯都沒吃，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將搞掉鍾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八月十七日上午，蔣文明又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

、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三十一人。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這段歷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裏，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八月十七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老實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裏面的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而且許多領導與「紅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縣裏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是不難制止的。

我們來到這個被稱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見到了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他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那時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唉，那陣子，鍾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那為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死也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

據鄭逢橋說，當時，文革中，大隊在四類份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選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彙報。這個大隊殺第四批的七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

子女用繩子勒死的。不知「耳機」有沒有份，而在這以後的歲月，苟活者可能遠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種無休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那天，我們找到一戶「遺族」，家裏只剩中老年兩個女人，老的在堂屋裏剝豬菜，中年的在坪裏曬穀。

「我們想找你瞭解一下這裏文革中殺人的情況。」

「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納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傷神。她低著頭只顧曬穀，再也不理會。

道縣一九六七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六個區：清塘區、祥林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佔全縣總區數的百份之五十五；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十六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佔全縣公社總數的百份之四十七。

「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創造發明

清塘這地方距縣城大約十來公里。有一條著名的濂溪河從那裏流過，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頤的字而命名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裏，擠滿了從全區各地趕來的生產隊以上的幹部。這次緊急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

昨天上午，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專程從清塘趕到營江，把道聽途說來的「敵情」，經過自己頭腦加工創造後，向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關有志報功

：「你來營江才幾天，我們就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鳳為首組織的《農民黨》，已經發展到了四五百人；一個是蔣家地主崽子蔣偉珠為首組織的《新民黨》，已發展到七八百人，還有電臺。這兩個反革命組織都是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搞暴亂，有行動綱領，有計劃，口號是《先殺黨，後殺幹，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順口溜張口就來，他最後又向關有志建議，「目前群眾的情緒很混亂，為了穩定局勢，你是不是回清塘開個會？」關部長很滿意下級對自己的尊重，他也謙虛地以徵詢的口氣問：「你看開個什麼會好呢？」

「開個幹部會吧。」

「好！要開就快開，開得大一點，區社幹部、生產隊長都參加。」

八月十七日上午，關有志坐著拖拉機，風風火火趕回清塘，主持了這次大會。

會場門口佈滿了崗哨，關有志當過兵，上的是雙崗。會場內橫七豎八地掛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大標語。場子太小，上千人擠在裏面顯得十分擁擠。道縣農民都習慣在腰上別著根長煙袋，稍有功夫就拿出來含在嘴裏，叭著辛辣的煙葉子。濃濃的煙霧中，關有志顯得慷慨激昂，時而站起，時而坐下，拳頭砸得桌子嘖嘖響。高音喇叭音量開到最高，震得耳朵發麻。以下為《關有志八一七講話摘要》之摘錄：

……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八月八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枝，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八月十三號又開槍打死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他們是

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搞反革命政變。他們還有電臺，配合帝修反。我們區已經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別的區也不例外，八區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十一區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偽鄉長朱勉，在訓話會上，公開向幹部挑釁，說什麼「現在你們搞我，遲得三天的話，我們組織起來就要把你們幹部全殺光」。大家聽了很氣憤，當場把他打死了。

同志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麼辦？如果讓他們得逞，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會議結束時，關有志徵求周仁的意見。周仁又是一鳴驚人：「現在政法部門都癱瘓了，真正是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錶的，穿可鞋（皮鞋）的，在哪里發現就在哪里搞掉！」接著，在講到所謂「人民黨」成員久佳公社農民唐玉想當區長時，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發他到閻王那裏去當區長！」

會場頓時亂成一片。許多話在座的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有人緊張、惶惑；有人興奮、激動。是呀，毛主席一再說要相信和依靠貧下中農，這回可是把

生殺大權都交給我們了。他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望著主席臺上的人——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使得他們對這些臺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們也突然感到一種神聖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會，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員蔣白舉，帶領久佳與會人員（約三四十人）衝到唐玉的家。當時，唐玉已經在前一天的批鬥會上，被蔣白舉等人用鋤頭敲斷了一條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蔣白舉把他從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眾人撲上去，一陣亂棒將其打死，然後丟在禾坪邊的水塘裏。唐玉者，何許人也？如何這般惹人惱恨？他，家庭出身中農，原先是小學教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務農；為人生性耿直。蔣白舉在該大隊蹲點時，「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別人敢怒不敢言，唯獨唐玉不識進退，仗著會寫兩個字，幫著寫了一張狀子把蔣部長告了。害得蔣白舉受了批評，仕途也受了影響。這號人留得麼？至於唐玉想當區長云云，「人民黨」尚不存在，他想當區長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況，即便一個人有當區長的想法，難道就犯了死罪麼！

這次會議結束後，久佳、新塘兩個公社的五個大隊迅速行動，行使起「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權力來，四天內殺了十三人。

轟轟烈烈，上關公社的兩次殺人現場大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關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周永記在寶塔角的虎子坪生產隊作動員報告。與會的有齊心、建築、向陽三個大隊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代表，共一千多人。

禾坪上人頭攢動，梭鏢林立。會場被臂帶紅袖章、全副武裝的民兵把守著，只准進，不准出。人們交頭接耳，互相打聽，許多人還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麼戲。

上午九時，太陽已開始毒辣的時候，周永記清清嗓子作報告了。因為沒有麥克風，會場又空曠，他每說一句都必須拼命地扯起喉嚨，「貧下中農同志們，四馬橋那邊的四類份子已經上山了；二中那邊搶槍政變了；八區、十區、十一區的貧下中農已經起來殺四類份子了。我們怎麼辦？」

太突然了，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周永記見無人反應，繼續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皮子無骨頭的，吃刀仔仔飯的，能不能殺他們一些？」

會場亂了。議論紛紛。周永記進一步說：「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他略一停頓，威嚴地四下望瞭望，然後，凜然喝道：「今天，我們就拿何光清開第一刀，給大家做個樣子。」

他的報告一完，齊心大隊團支部書記羅特良便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後擁，把五花大綁的何光清押進了會場。羅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狀」後，模仿電影裏的法官，拖長聲調：「現在，我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何光清死刑，立即執行！」

何光清原以為是像以往一樣是押來批鬥的，一聽是死刑，嚇得魂不附體，癱在了地上。兩個民兵像拖死狗一樣，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剛剛收完了中稻的稻田裏，一馬刀砍下去，鮮血四濺，噴到了散發著新鮮氣味的稻草上。

開完了寶塔腳的殺人現場會，周永記馬不停蹄，又跑到了龍江橋（建設大隊），佈置召開更大的殺人現場會。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

鐘鏗——鐘鏗——！鑼聲陣陣，時緩時急。

通往龍江橋變電站的各條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隊的人，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鑼聲越來越密，有四條隊伍從東風、東方、東進、東源四個大隊曲曲折折而來。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著高帽子、胸前挂著牌子，邊走邊敲著銅鑼和爛臉盆之類的響器。他們被繩索縛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著他們的是一些荷槍實彈的民兵，而跟在這些隊伍後面的則是一幫趕來看熱鬧的婆婆媽媽。

「蔣大婆，你老也去開會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沒看到這樣威武的場合了，怎麼不去呢？」

「喲，這麼說，你老還見過幾個這樣的場合？周領導講了，這是史無前例。」

「見過，見過，那時你還小。威是威武，還是沒有這樣威武。」

「那就快點子走，遲了，又要站背後，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虧，站在後面，連人都沒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講得直，前次你屋裏二崽沒得一寸用，砍了幾刀，才把個腦殼霸蠻剝下來。」

「那又怪不得他，他們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這回就把刀磨快點哈。」

「這一回，不用馬刀了；周領導講了，要用《洋辦法》。」

「啊也——那還不快點走！」

還是去遲了。等這幫婆婆媽媽趕到龍江橋石頭嶺變電站的空坪上時，已經聚集了三千多人。幾十名四類分子（含子女）低著頭，在臺子下跪成一線。搭起的土臺子上，挂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紅橫幅。周永記屹立在臺上，神色莊嚴，胸中豪情激蕩：這才是徹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時間，這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真是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呀！

四鄉八裏趕來的人越來越多。

開會之前，他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人開了個碰頭會。周永記說：「這一次，建設大隊準備先搞兩個，各大隊是否有要殺的四類分子，如果有的話，就搭在裏面用洋辦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隊的幹部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相繼報上了名單：東進兩人；東方、東風各一人；東源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意見沒統一，沒有報。

大會開始了。

周永記一開口，哄鬧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了。人們尖起耳朵，捕捉周領導嘴裏發出的聲音。只有風，依然徑自地刮著，搖得竹枝樹葉嘩嘩地響。

「今天，我們在這裏開一個規模較大的殺人現場會。今天的會，也是我們上關公社殺人的第二顆信號彈，第一顆信號彈昨天已經在齊心大隊的馬路邊打響了。今天各大隊回去後，要馬上行動起來，行使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權力，對調皮搗蛋的要殺他一批。」

當即槍斃了各大隊報來的六名四類分子。

這時，人們才搞清所謂「洋辦法」，原來就是用步槍槍斃，不免有些失望。

散會後，周永記把公社脫產幹部留下來，明確分工，派他們到各自所駐的大隊去督促殺人。寶塔腳、龍江橋兩個殺人現場會後，上關公社專職幹部熊立濟等人分別在各自所駐的片、隊開始組織策劃殺人。

水桶大隊是劉少奇前夫人何寶珍的故鄉，也是道縣有名的富裕之鄉。熊立濟在水桶召集幹部開會研究殺人時，大隊幹部們思想不通。熊立濟急了，反復作思想工作，講到激動處，從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開會的八仙桌上：「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在座的，誰與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

燈光下，刀柄顫抖抖抖，大隊幹部們面如紙白。於是，這個大隊用沉河的方式，殺了五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隊也相繼動手，到八月三十日止，上關公社十二個大隊共殺了一二二人。

壓任務、下指標，蚣壩區殺人奪冠：八天殺人一千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八天時間共殺人一千零五十四人，全區五十人中就殺了一人；佔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

蚣壩區殺人如此之多，後果如此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區到公社到大隊，層層部署，層層動員：區委正副書記、「紅聯」司令、武裝部長、會計碰頭會，全區各公社負責人、武裝部長、群眾組織頭頭會議，各公社、大隊貫徹會議精神的會議。形式雖不同，精神實質一

樣，即肆意誇大所謂「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製造謠言，鼓動群眾心安理得去殺人。

八月二十二日，小甲公社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龍九有感於已落後形勢，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仿口大隊即反饋資訊，該大隊計劃殺五人。大隊黨支部已開會研究，同時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基接到電話，當即答復可以。得到批准後，洞仿口大隊民兵將這五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口，用鳥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中。這五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組織有計劃殺人的第一批殉難者。

同一天，興橋公社。蚣壩區主要負責人王盛光坐鎮興橋，下令民兵封鎖所有道路渡口，嚴查行人，不准放走一個「階級敵人」；並於當晚召開宣判大會，叫民兵五花大綁了楊貴清，謊稱要將楊押送道縣公安局勞改。押到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屍瀟水河中。

當晚，王盛光搖電話給區武裝部長兼區「紅聯」司令何昌學，通報了搞掉楊貴清的情況，同時要「何司令」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和蚣壩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宰掉。這是道縣殺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攤派指標的案例。何昌學於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示下達給了蚣壩和小甲兩個公社。緊接著，全區三個公社和幾乎所有的大隊都相繼召開了殺人部署會。

上面怎麼說，下面就怎麼做。這是道縣農民的特點，也是中國農民的特點。更何況參與殺人等同於出工，還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時間，殺人也成了社與社、隊與隊之間的競賽！到了八月三十日，小甲公社的十三個大隊已有十二個大隊殺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

大隊遲遲不見行動。

公社副書記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龍九幾次向該大隊的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仍然不見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隊的幾個份子平時逆來順受，喊東不敢走西，實在表現不錯：「雷公不打笑臉人」，小甲大隊的幹部下不得手啊！慣於雷厲風行的公社領導急了也火了：媽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許出現「土圍子」！於是，楊、廖二人在八月三十日召開全公社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叻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會後，乾脆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帶著槍枝、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幫助他們「革命」。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當天，將十二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十二個活活的生命做上了「土飛機」。

筆者不敢想像那十二個人在導火索噼、噼燃燒時的恐懼，也不敢妄自揣摩兇手們欣賞自己的傑作時的心態，但我們在二十年後聽到該大隊的一位老人回憶當時的慘狀時，仍然周身發寒。——「轟」地一聲巨響，大塊大塊的血肉落雨一樣地飛了過來。有幾個炸斷了手腳，炸掉了屁股的，還沒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亂滾……民兵們一湧而上，用鋤頭、馬刀為他們解除了最後的痛苦。

當人們散開後，一群群的烏鴉飛來，哇哇叫著，爭相啄食飛濺到樹杈上和草叢中的人肉……

斬草除根，蚣壩公社殺人「冠中之冠」

如果說蚣壩區是道縣大屠殺事件中的「冠軍」，那麼，蚣壩公社則是「冠中之冠」。一個

公社就殺了五二四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一半以上。這當然得益於蚣壩公社系區政府所在地，跟組織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覺悟高；而且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看管佈控嚴密，基本上沒有幾個漏網的；一時跑了的，也要想方設法捉回來。譬如「賀遠能慘案」。

一個月前，該公社賀家山大隊的回鄉知青賀遠能，帶著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賀遠能出身不好，但人長得英俊又聰明，他是在縣城讀中學時認識何端珍的。事情偏不湊巧，他倆在村口碰上大隊幹部周某某。周見賀遠能的未婚妻長得端莊，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們許多貧下中農的子弟都討不到老婆，你這狗崽子倒騙得了這麼漂亮的妹子，明明是帶她來刺我們的眼睛！周咬定賀遠能是「革聯」的探子，叫民兵將其捆起來，關進大隊禮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說情放了賀遠能，但賀的雙手已被棕繩勒斷了。何姑娘含淚將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療了個把月。傷好後，賀遠能於八月二十四日回到家鄉，正碰上濫殺之風盛行，嚇得他在家拿了支電筒，就連夜逃走了。那時，整個蚣壩區已處於極端的恐怖之中，條條道路處處渡口都有民兵盤查。賀遠能走投無路，只得爬上興橋公社的洲背嶺，躲在嶺上的草叢中。這個年輕人已預感到難逃此劫，死神的陰影壓迫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生活於他才剛剛開始，自從愛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變得有意義起來。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撐開手電，開始給心上人寫信：「端珍，我也許永遠要離開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寫啊寫，從兩人相識相戀到他對她熾熱的情感，寫了整整一夜。

八月二十五日拂曉，賀遠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並遠走他鄉。不幸的是，他還沒走出興橋公社，便讓當地民兵抓住了，並迅速打電話到蚣壩公社賀家山大隊。這天上午，賀

遠能的父母和弟弟都被殺，除了遠嫁外鄉的姐姐，賀家只剩下他這根獨苗。而此時，正責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隊「最高法院」賀主席，正在四下尋找漏網之魚賀遠能。接到電話後，賀主席連聲誇獎興橋公社的民兵階級覺悟高，並叫了十幾個人，操著傢伙，風風火火趕到興橋。像捆逃犯一樣綁起賀遠能，推著拉著向瀟水上游走去。沒走多遠，這個高中畢業生就受不了了，滿臉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滾，他哀求著：

「叔叔兄弟們，你們要是肯留我一條命，就請將繩子放鬆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讓我再走了。」

賀主席問：「你要怎麼個死法？」

聽到這話，賀遠能失聲痛哭起來，一路上不停地喊著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陽壩，賀主席叫民兵將賀遠能推到兩塊大石頭中間，背轉身站著；指使三個人各朝他打了一鳥銃。三聲銃響後，賀遠能沒有倒下，仍在痙攣著掙扎。一個自稱曾一銃放倒過野豬的漢子不滿地說：「這傢伙莫非學了法！」於是，眾人在賀遠能身上綁上一塊石頭，將這個嘴裏還在「端珍，端珍」叫著的小青年推下了瀟水河。

這樁慘案的第二天，松壩公社河灘大隊上演了一幕幕更為慘烈的悲劇。

那時太陽還沒出山，村寨籠罩在淡淡的晨霧中。從河灘大隊所屬的各個生產隊陸續湧出一些五花大綁的青壯漢子，和一些手持馬刀、梭鏢、鳥銃和鋤頭的同樣年輕力壯的漢子。他們在一條通向山裏的三叉道口彙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隊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站在一處高坎上，像點牲口那樣將各隊捆來的人清點了一遍：二十一個。又清點了一遍：沒錯，確實是二十一個。這個大隊採取的戰略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先將有可能暴動的傢伙搞掉。

於是，隊伍繼續向山裏前進。

被捆綁著的青壯年漢子們，神態卑微而平和，對於屈辱的生活，他們早已習慣了，這已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認命吧，誰叫自己投胎時沒長眼睛，錯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們還不清楚今天將被帶到哪里去，但前方等著他們的肯定不是什麼好地方。不祥的預感，使他們在別無選擇地走向絕望時，心底未免不生出陣陣酸楚和眷念。他們三步一回頭，望著漸漸遠去的村寨，那裏有年邁的父母，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畢竟還是有意義的。如今要是就這樣去了，留給親人們的殘餘日子怎麼過啊？！

投錯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兒女情長、恩愛寄託。

即便是投錯娘胎，這就是命定他們以承受苦難來偷生，以死來贖罪的理由嗎？他們實在是帶走太多太多的遺憾了，但更遺憾的是他們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為什麼會走向屠場。

屠場就在山腰的一處叫葫蘆的洞口。以往他們打柴、種地、放牧時常從這裏經過；累了、熱了還在洞口邊歇歇腳，消消暑。此時，太陽已從山頂上探出頭來，潑下一片灼白的熾熱，讓人有那麼一點激動，又有那麼一點煩躁。

何興盛命令民兵將一千「人犯」押到洞口邊，他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點乾燥，聲音也有點緊張。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

那裏，一動不動。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岩洞；直到這時，你才聽到一聲淒慘的喊叫。這時，一個叫何遠有的地富子弟，向前衝了一步，跪在何興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殺我，我沒享過福，我跟你們一樣，受一輩子苦。我有一筆錢，準備結婚的，我都送給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後我一輩子都伺候你。」

何興盛嗓子有點乾：「遠有，我沒得辦法救你。不是我要殺你，上面喊殺，我不殺你，我自己的腦殼難保。」

葫蘆岩岩洞，顧名思義，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誰也沒下去過。據說好多年前，村裏有傷風敗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這裏按族規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風嗖嗖。這時，熱騰騰的鮮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頭和石頭上的青苔，且將那些綠色的雜草染得紫紅。

有的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興盛在洞口邊竄來竄去，急得直跺腳。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一大包炸藥，挂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一聲沈悶的巨響，葫蘆岩岩洞重又歸復永恒的寂靜。

時近晌午，何興盛渾身異常輕鬆，像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帶著民兵們凱旋回村。大家邊走邊議論：

「年輕力壯的勞動力都殺了，留著那些老的小的怎麼辦？」

到底是種田人，想問題非常實際。這話立即成為大家的中心議題。

「未必還要養五保？那生產隊的負擔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遠：「那些小的，長大了報仇怎麼辦？」

於是就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

何興盛一想，有道理啊！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彙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一隻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隻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一齊搞掉，行不行？」

接電話的是中共蚣壩區委秘書，答道：「大老虎殺掉是罪有應得；殺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興盛見區裏似乎不同意殺，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罷了。吃過午飯，隊裏繼續有人在鼓噪，何興盛無奈，又打電話向公社請示。蚣壩公社黨委書記接到電話，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可何興盛還是感到不踏實，再次掛電話向蚣壩區委請示。

這回是區委主要負責人之一葉成虎親自接的電話。葉書記虎氣生生地剛從殺人第一線回來，精神抖擻，聲音洪亮如雷，當即指示：「全部殺掉。」何興盛立即將這命令通知給各個生產隊長，並且部署了當晚的行動。

太陽銜山了。河水彤紅如血。整個河灘大隊，村裏村外崗哨林立。早上殺人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家家戶戶，空氣緊張得似乎已經凝固了。那些被殺人的家屬，老老小小縮在家裏，抱頭哭泣，聲音壓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見的世面多了，已預感到了大限臨頭，心裏反倒踏實了些，哆哆嗦嗦從箱子裏翻出幾件平時捨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乾乾淨淨的，隨時準備上路。有

個名叫張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時安分守己，處世謹慎，手腳又勤快，生產隊有事，燒茶弄水搞衛生不用領導喊；且熱心公益，常與她那個從不多言多語的丈夫一道出門修橋補路，兩老口同隊上幹部群眾的關係都還不錯。因此，早上往大隊拉人時，沒有拉他們。此刻，兩口子相對而坐，商量著如何去死。丈夫說，他這一輩子沒有吃過一隻雞，要是能嚐嚐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張秀姣滿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腳快手地將家裏五隻用來下蛋換油鹽的雞全部殺了，開膛破肚，收拾乾淨，做一鍋燉在火塘的撐架上。火苗歡快地舔著鍋底，鍋裏撲撲直響，肉香四溢。張秀姣舀了一碗雞湯，雙手端給丈夫；丈夫雙手接了，剛湊到嘴邊，卻又憐愛地送給妻子先嚐。這一送一讓的，倒叫這對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浪漫，想想又覺得有那麼幾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著笑了起來。也就在這時，敲門的聲音響了……

他們被押到大隊的曬穀坪，那裏已站滿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殺的，就是殺紅了眼睛的人。看熱鬧的人很少，還是個人都沒有膽子去看如此殘暴的場面。有個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臥床數月，剛被從床上拖起來，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這麼晚了，你們要把我牽到那裏去？」

一個手持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兒子判了死刑，殺了；生產隊養不起你，請你去西天享福。」

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一個民兵哄他說：「你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你去找。」

就這樣，老的用繩索捆著，小的用棍棒趕著，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籬筐挑著，哭哭啼啼上

了路。

沒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該是初秋了，已有點涼意，遠處不時傳來狗吠聲。幾個孩子被這黑夜的陰森嚇得大哭起來，讓民兵們厲聲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何興盛忽然感到有話悶在心裏。這些老老少少，說到底多少與自己都有點沾親帶故，但這是革命形勢的需要，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他何興盛容不下他們。他乾咳了一聲說：「你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殺你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你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你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們的周年。」

說完，指揮民兵將三十一個人趕上一隻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中……最大的七十四歲，最小的才五十六天。

順便說說這個五十六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他太小，父母又不識字，而且他來到這個世界太不是時候，偏偏又沒選擇一個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極度的驚恐不安中度過他人世的第五十八天的。這一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隻清亮的大眼睛，看著一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七十二歲的祖母、三十七歲的父親、十二歲的大哥和三歲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頭一次淒慘的啼哭聲中，他的六口之家轉眼就失去了四人！

他的母親能夠倖免於難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裏睡熟了；母親則呆

呆地坐在床沿，哽咽著，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這人最兇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三十七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條。儘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面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傢伙私心重，還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裏搶走了這個五十六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一線希望……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比較文明地請了本大隊一個體面的裁縫，擰著一包點心上張秀華那裏替他說親……

話說回來，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一面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一併殺了，在曬穀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桌上擺的，當然包括張秀姣家中的那五隻尚未品嚐的雞。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一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園：正式挂牌開庭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

道縣的「貧下中農最高（高級）法院」數以百計，有模有樣正式挂牌辦公開庭的，卻只有柑子園公社一家。

西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一陣鳥銃和鞭炮聲中，柑子園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高級法院」，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當選為「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

中午時分，「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門口。那新鮮而工整的油漆字兒在熾熱的日頭下顯得分外醒目。

很快就紅衛大隊的治保主任唐再紅等人跑來，向公社武裝部敬反修部長和梁「院長」反映地主分子陳世碧等人企圖逃跑上山搞暴動的情況。敬反修、梁域當即帶領公社民兵自衛營三十餘人，火速趕到紅衛大隊，將正在田裏出工的陳世碧等六人一併捉拿，押解到公社「貧下中農法院」附屬監獄關押。

次日，「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首次開庭，由梁域主持，對陳世碧等人進行了審訊，並佐之以繩索棍棒。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成立後，共開庭審訊了十三人，其中八人被判死刑。這在當時還算比較文明的，因為畢竟還有那麼個「程式」。後來，因「手續簡化」，「權力」下放到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公社這裏也就只剩下個空架子，有名無實了。

但敬部長和梁院長閑不住啊，時時刻刻關注著下面的殺人進度。八月二十七日，敬反修、梁域兩次指示豔旗大隊搞掉廖上修、鄧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動作太慢，還氣衝衝地給豔旗大隊黨支部書記搖電話，催促殺人。

當晚，該大隊殺了七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紅旗大隊殺人。

第二天，該大隊殺了六人……

八月二十九日，柑子園公社召開各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基層幹部會議。會上，公社黨委副書記裴成芳傳達了解放軍第四十七軍制止殺人的電報，強調不准再殺人，誰殺誰負責。可是，緊接著黨委書記胡化維的講話，卻表揚了哪些殺人多、行動快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沒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那些大隊很不服氣，散會後，東風、勝利等大隊回去後就殺了十五人。

會議當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的職權，召集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碰頭，決定當晚殺掉朱用進父子等四人。

那天夜裏月光極好，敬反修、梁域親自帶領民兵去了。當時，朱用進等四人對自己可能被殺毫無思想準備，直到被拖進了山上茶樹林，才發覺大事不好。朱用進帶頭撲通跪下，磕頭如搗蒜地求饒：「梁院長，我們也是貧下中農，舊社會一樣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話，你們以為是貧下中農就打了保票？就動不得你們？」

「我們犯了什麼法，你也得說過明白呀。」

梁域厲聲呵斥：「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反革命一邊，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們已經蛻化變質，站在階級敵人一邊了，你們也就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

梁域的仇敵朱用進父子等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據後來道縣處遺工作組多方調查，梁域同朱用進之間有個人恩怨，屬於借機報復。

活理全部地富份子及子女，躍進大隊殺人大躍進

八月二十七日清晨。躍進大隊部。一隻蒼白的手搖動電話機手柄，聲音顫抖而激動：「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長。不在？你是……哦，鄭主任啊。我是躍進大隊的何方前，向你彙報一個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們大隊召開了黨、團員和幹部會議，研究決定用掃把掃，殺六十多個。」接電話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鄭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聲，「好傢伙，這麼多呀！你們採取的是什麼措施？」我們準備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裏去。」鄭來喜聽罷，有些擔心地招呼這位躍進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可要注意安全喲！」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裝部李部長的嚴厲批評，躍進大隊行動慢，拖了全公社的後腿。何方前一向身體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領導一指責，嚇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爭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這會兒見領導滿意，且關心愛護自己，十分感動，連連向領導表示，一定會做得乾乾淨淨，讓公社領導滿意。並一再囑咐鄭主任，要把他們大隊的行動告訴李部長。

這時，全大隊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來，一個個捆得結結實實。副支書左隆交也沒誤事，昨夜交代的任務記得牢靠，一大早就將「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現場，用三根棍子又著立在三口窖的邊上，並手忙腳亂地扯橫幅、刷標語佈置會場。

上午九點多鐘，何方前帶隊押著六十四名四類分子及子女，浩浩蕩蕩向石頭山水庫尾端走去。後面還跟了一支人數可觀的群眾隊伍。天氣熱，又捆著拴著，有兩個地富分子年歲太大，走不動，要人拖，大大影響了隊伍前進的速度。押到何家河邊時，幾個民兵拖得不耐煩了，請示何支書後，用鳥銃將那兩個老的打死，扔進河裏。這一招立竿見影，隊伍前進的速度立刻大

大加快，那些恐懼萬分的人們，幾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頭山水庫的尾端，因陋就簡地開了個群眾大會。大隊貧協主席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佈了何光美、左南方等六十二人的死刑。然後驗明正身，分別推下三口窖內。又將稻草澆上煤油點燃，投入窖裏，熏後，掩土活埋。何方果然做得乾淨利索，這個孱弱的支書當時很可能沒有想到，他的躍進大隊後來居上地放了一顆衛星，成為全縣殺人最多的大隊。

看著窖眼上那被腳踩結實了的新土，做事細緻的何方前還是不放心，他和副支書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裏，邊吸旱煙邊商量：裏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層土蓋得住嗎？萬一有人拱出來，怎麼得了！於是，支部決定派民兵在這裏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來了，野地裏星星格外耀眼。水庫裏不安分的魚撲哧躍出水面，發出很響的聲音，嚇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個讀過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麼觸動了，很動情地哼起歌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如今那三口窖和六十二條人命地方早已被綠草覆蓋，年年草榮草枯，全無一點血腥的痕跡。再沒人談起那裏，也再沒人敢去那裏。那裏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頁瞬間的歷史，但卻是我們這個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採訪手記之一：血海拾遺

一、寡婆橋

道縣大屠殺期間，寡婆橋曾是有名的刑場。殺人時，橋兩頭都佈了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明晃晃的馬刀一揮，屍體就被從橋上一腳踢到河裏。殺得多時，河水腥紅一片；有沒殺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橋兩頭的民兵便沿河追趕，用鳥銃射殺。

聽說前道縣師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裏被砍頭的，筆者專門採訪了道縣師範老校長尹少萼。他告訴我們，被殺的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這位鬚髮蒼蒼的老知識份子，含淚訴說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志啊！熱情、正直、有能力，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讀中學時就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解放。解放後，先在區裏當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組織上又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他幹一行愛一行，工作都很出色。一九五八年，籌備成立道縣師範，讓我負責，我第一個就挑了何聘之來當助手。建校初期，他帶領學生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下面那棟教學樓，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領著學生從六〇裏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可是我們的建校功臣啊！當上教導主任後，工作認真得讓人感動；他提倡為人師表，人品學問都是第一流。

他這人多才多藝，精力旺盛，喜歡搞點創作。五八年下半年，寫了個劇本，叫《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三面紅旗的。現在看來算是「左」的了。但就是這個劇本，讓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些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竟把劇本中反面人物的臺詞，當成作者的反動思想。五九年反右傾時，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制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開除回鄉。

在農村，他老老實實勞動，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改造彙報。就在被牽到寡婆橋上殺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復向民兵們解釋：「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那些民兵那裏聽他這一套。死時，他喊毛主席萬歲，「歲」字還沒喊出口，腦袋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殺的還有他的兒子何上明。

二、無名外鄉女

在瀟水河畔的東門鄉政府，該鄉黨委書記蔣井元和紀檢組長馮和光講了這段往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烏家山大隊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過路的女青年，高瘦瘦的。他們立即將她帶到大隊部審訊。開始她一言不發，問急了，才說是廣東人。聽她口音也的確像那邊人氏。於是，郭某四人又將她押往公社。因為那裏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夠，只好又將她押回。正是黃昏時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烏家塘邊，民兵們動了邪念。郭某說，這個女人連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隊也沒用。不如就在這裏搞了她，開開洋葷。其餘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邊將這個姑娘輪奸了。事畢，有人說，放了算了。郭某不答應，怕她今後找麻煩，並用鋤頭將她打翻，丟入塘水中。奇怪的是，這個女青年落水後，幾翻幾騰，竟又站起來了，塘邊的水只齊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頭打。她望了他們一眼，然後一步步向深水處走去……她堅定不移地走了，帶著憤懣、屈辱和對這個世界的徹底失望。

以後有人說她是自殺。

據說，至今沒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個地方的人，而且為什麼會闖入一九六七年八月

道縣這座人間地獄！

紀檢組長馮和光還告訴我們，那時的東門公社北門大隊沒有殺人，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三、滅門之禍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里遠的杉木嶺翻紅薯藤。」橋頭鄉橋頭村的村民周福妹訴說了周文棟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

快收工時，生產隊周隊長猛吹一聲哨子，喊道：「大家快點動手！」於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幾個勞動力湧上去，將正彎著腰勞作的周文棟，以及他的妻子陳蓮娥、兒子周輝死死扭住。周隊長接著命令道：「快推到窖裏去！」這時，周文棟曉得大禍臨頭，跪下哭著求饒，哪還管什麼用？人們發瘋一樣把他們一家三口推進一口多年不用的廢窖裏。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子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見裏面喊得淒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煙口。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得那種場面，走開了。過去，我當過別人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太陽快落山了，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棟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回村。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是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八歲的周大妹正帶著熟睡的弟弟在家，見人來了，還招呼伯伯們喝水。他們說不喝，你媽媽要帶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們。單純的小姑娘哪知是計，背起弟弟跟他們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見杉木嶺那邊冒黑煙，心裏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

人，一個抱起周小弟，一個拖著大妹趕到杉木嶺。周隊長已等得不耐煩了，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八歲大的繫著兩隻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可憐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曉得會遭到滅門大禍。造孽呵！……

這一帶有句古話：人死飯門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當晚，周文棟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他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瓶瓶罐罐，甚至樑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棟何許人也？我們從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道縣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棟的《平反通知書》（編號為〇七八九）中才知道，他一九四九年考入解放軍一三七師某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後在部隊工作，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教師。一九五七年因「愛提意見」被劃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採訪手記之二：倖存者的見證

一、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見證人：周軍陽，女，五十一歲（一九八六年），道縣蚣壩中心小學教師，縣政協委員。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臉上依然可見年輕時的俊秀；那雙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

聲音嘶啞，連哭泣都是嘶啞無聲的。她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復說著：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貧農，但我父親曾在國民黨南京交通警察總局當過科長，中師畢業後我被分到道縣山區洪塘營小學教書。在那裏，我同蔣漢鎮老師結了婚。漢鎮是從部隊轉業回鄉當老師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開始不久，我倆被開除公職，回到漢鎮老家大山窩裏的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土地塘生產隊勞動改造。我們老老實實勞動，安分守己度日。沒想到分到點新糧還沒開始吃，就大禍臨頭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天也是這麼黑，我已經帶著三個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我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錫開了。「起來，開會去！」唐支書聲色俱厲，完全不同往常的樣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對嚇哭的大孩子林海說：「在屋裏帶好弟妹，媽媽去去就回來。」

我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十四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烏銃的民兵押著。我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給他送飯時，他還安慰我說，「關幾天就會放的。這時漢鎮見到我，掙扎著想過來；貧協主席張光松喝道，「蔣漢鎮不老實！他們就拿來鐵絲，幾個人按住他用鐵絲捆。痛得漢鎮直叫，火把下，我見他臉上流著黃豆大的汗珠，心如刀絞般痛。張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區裏去！」我還以為真是要把我們押到區裏去，萬萬沒想到會殺人的。突然間，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

，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好歹毒的唐興浩，為什麼連我的孩子也不放過？記得那年漢鎮見他困難，還借了一百塊錢給他，至今未還。那時一百元可不是個小數目。人啊，怎麼說呢！一會兒，我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地拖來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我的手被綁著，我那六歲的雪原只好牽著我的衣角，八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松，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後面。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塊石頭宣佈：「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佈你們的死刑！」許多被捆著的人，頓時就癱倒了。月亮這會出來了，慘白慘白的。民兵們圍上來，用烏銃、梭鏢對著我們。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們要殺人。心猛地一沈，天啊，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三個孩子怎麼辦，誰來護養他們啊？！

第一個被點名的叫蔣文皇，六十多歲，是個有名的老中醫，出身不好。他從容地向行兇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罵道：「要死的人了，還喝什麼水？」他說：「從前殺人，還有三個熱包子吃的……」話沒說完，就被一鐵棍打倒，踢進了天坑。第二個被點名的是我愛人蔣漢鎮，他已嚇懵了，被他們像推木頭一樣推到洞邊……我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我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一會媽媽就回來，帶你們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只覺得腦後風起，一根鋼針打下來，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我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我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我的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像慘

。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麼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六歲小女孩的哀求……我見女兒還活著，頭腦清醒了許多，背過身子讓雪原幫我解開了繩子。這時，我身邊的一個本家兄弟蔣漢元也蘇醒了，叫道：「嫂子，快來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脫了白，動不得，就用牙幫他咬開了繩子。蔣漢元當時只有十七八歲，身子靈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嚇得他東躲西藏，沒辦法再來救我們。

天坑分幾層，我們跌在上面這一層，後來石頭鬆動，我們又滑到下面一層。這時我發現蔣漢鎮和我另外兩個孩子都摔在這裏，居然還活著。四下全是屍體，除了我們大隊的外，這天早上，睡也在屍體上，我想就是地獄也不過如此。三個孩子都嚷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里有水呀。我沒辦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著給叫得最兇的林松喝。可憐的孩子，他才三歲啊！漢鎮的手還讓鐵絲捆著，我們解不開。這時他精神已經失常，在屍體上走來走去，「我要撒點高梁，我要撒點高梁，給小孩吃。看囉，高梁紅了呵……」孩子們被他踩得哭；我說：「漢鎮，清醒點，這是在天坑裏。」他聽了，不再吭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過了幾天幾夜，孩子們漸漸沒有聲響了。岩洞上偶有冰涼的水珠滴在臉上，使孩子猛然驚動，我才知道他們還活著。林海囁囁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麼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二個八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著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們兄妹擺放在漢鎮身邊，心裏反倒安穩了，孩子們終於解脫了，

而我們一家人不管怎樣也死在了一起。

我發現上方的一個石坎上，有個叫蔣福桂的姑娘也沒死。女人家不知為什麼，總比男人經得熬。她十七八歲，是個富農的女兒。這會也瘋了，老是在叫：「媽媽，快點燈，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虛弱，沒法幫她，只能在下面儘量安慰這個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九月一日，外面下了一場大雨，我喝了幾口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九月三日，彷彿聽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細一聽，是我過去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我在這一帶教過八年書。他們聽到我和蔣福桂說話，就約好來救我們。「周老師，外面已經不准殺人了。你不要怕。」他們說著把四根棕繩連在一起，放下洞來。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這裏了，我一個人還回去作什麼呢？他們就守在洞口苦勸，還吊了竹筒水給我喝。我終於回心轉意了，因為我們一家五口、我的孩子們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萬萬沒有想到。我要弄明白，這是為什麼啊！

他們剛剛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過去。這時，我已在天坑裏過了整整七天。

我得提一句，那個唐興浩一九八五年被開除了黨籍；在處遺工作組的追問下，他才托人將那一百元還給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廣安人，五十四歲（一九八六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還要顯得蒼老。她說，老楊走了這麼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

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麼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裏驚叫著駭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老楊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楊天順，木易楊，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後，他既沒從政，也沒跟國民黨跑到臺灣去，他回到他的家鄉，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老楊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時的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真真畫了金光。可人家說，那是箭頭。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麼說得清？把他開除回家勞動改造已是寬容的了。我和孩子們仍然留在縣城裏。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林鋪公社，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一九六七年暑假，我帶著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記得那是八月二十六日中午，他參加「雙搶」從田裏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躺下來休息一下。剛睡，村子裏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啊，你要小心點。他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去隊上看報哩。」

話還沒說完，外面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沒說，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楊同許多人一起被關在離祥林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學校的教室裏。裏面很熱，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下午四點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

。其他人只能低著頭跪在教室裏。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便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麼，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打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邊繞來繞去。我抬起頭看，門口拿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就低下頭，用牙齒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來。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十二個人，拖到不遠的烏崙塘邊，用馬刀砍死的。又過了幾天，叫出去三十六個人，也是拉到烏崙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那幾天我不知自己是怎麼度過的，我怕死，我跟他們說，我只是楊天順的家屬，我是城裏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歷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啊，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裏來。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三十六個人拖出去後，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裏說：「聽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三十六個人後，沒來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著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為了留條命，為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烏崙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發軟。那場面，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三十六個人的眼睛都是緊緊閉著的，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不敢看。我們是拿著發給的油茶樹木鉤，把屍體一一拖進塘邊的土坑裏的。忙完後，坑裏已堆得滿滿的。押我們的人在上面蓋了層薄薄的黃泥，就算了事。我們中

間有個中年婦女的丈夫也死在裏面，她一見到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著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六九五〇部隊的人到了鄉下制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也就這樣得救了。

腥風血雨後，殺人者如是說

道縣大屠殺十年之後。

高牆。電網。零陵地區的監獄接待室。

幾經周折，我們見到了道縣大屠殺的幾個主要指揮者和兇手。

一、黨叫幹啥就幹啥

關有志，原清塘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他來了，腳步沉重，身材魁梧，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的威風。他沒文化，是個大老粗，說話很直率。這樣的人，頭腦簡單，是典型的當年共產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基層幹部形象。他說：

我五〇年當兵，在部隊入了黨，提了幹。五八年轉業回道縣，任縣郵電局指導員。領導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幹，就派我去清塘區擔任武裝部長。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六五年六七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

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六七年八月一日建軍節，縣裏還因此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我從來沒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援「紅聯」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有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但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答復，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面制止。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麼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關有志應該說的是真心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來，被判刑，並非因為他們在那個腥風血雨的八月指揮殺人或親手殺了多少人，而是因為他們明明得到有關方面下達的制止濫殺的指示後，仍然我行我素，繼續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於是性質就不同了。祥林鋪區區長袁禮甫就是這樣一個轉化成敵我矛盾、並被抓起來判刑的人。

在殺人的高峰期，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四十七軍轉發了這份電報：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份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份子翻天，有的主張採取行動。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统计，他們用烏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份子（包括少數四類份子子女）二〇七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份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份子不宜濫殺，四類份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份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物件和非專政物件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份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七十七個四類份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這份電報只能是據「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的，因此所反映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實的。如說四類份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臺灣國民黨空飄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一說，現已查明，當時四個區報上來的七個「反革命組織」全部是假案。至於「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讓人一頭霧水。但這畢竟是第一份表態反對濫殺的文件！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懾於各方面的壓力，召開了各區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殺人問題。然而，殺人風既已刮起，誰都想證明自己正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長期的革命教育已讓投機者們得出這麼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類份子是階級敵人

，那麼殺四類份子也是應該的，是革命的行動。至於四類分子與八桿子打不到一塊的「革聯」究竟有什麼關係則沒人去理會了。

開會不久，祥林鋪區的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區長袁禮甫打電話：「……以後，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看情況，馬上就要剎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麼方便了。形勢要求我們抓緊點。」

袁甫禮雙目緊皺，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麼機會一樣。哪次運動他老袁落後過別人？這回也得做出個像樣的來！他立刻召開會議，謀劃、佈置祥林鋪區來個「大掃除」！祥林鋪區的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會上，袁區長作總結發言：「這次任務光榮又艱巨，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圓滿地完成……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

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豬勞軍。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袁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一百二十名雄赳赳、氣昂昂的民兵送行。望著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袁禮甫心中激蕩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三天後，這一百二十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了區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內共殺五百六十人。

如今，袁禮甫為他的「大掃除」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結果卻讓我們失望。袁禮甫是由獄警小林帶到接待室的。他同關有志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卻總是很恭順的樣子。他說了許許多多的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良心的懺悔了。他說：

「……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事實。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有什麼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麼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個「想不通」。是否所有參與那場大屠殺的人和被殺人的親屬朋友以及更大範圍的人都對那場文化大革命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想不通」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疑問！

三、舉手表決，要麼不殺，要麼殺光

周光國，原祥林鋪區涇江公社赤壩塘大隊貧協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實的，瘦小的個子，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著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怯地瞅著我們，不知找他的是什麼人。你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人也會殺人，也曾威風凜凜掌管著生殺大權。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林鋪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上面說：人家把刀都架到貧下中農的脖子上了，你們還睡得著覺！……那天，大隊召開各生產隊幹部和骨幹分子會議。人到齊後，支部書記唐紹志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然後舉手通過

。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種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向著周家的人。唐紹志頭一個提到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舉手；周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舉起了手，唐家的卻沒有一個人作聲。你要殺我隊上的人，我就要殺你隊上的人，比著幹，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種場合，就曉得，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十二個全部殺光：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邊一排跪著。我把一百多個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常和別人搞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製了一點。拿梭鏢、棍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看熱鬧的也都自動站到後面去了。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志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了起來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喊。

我的手發起抖來，鳥銃上的鵝弓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邊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鏢戳、棍棒打，接著一窩蜂用石頭砸一陣……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子，渾身稀軟，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嘔嘔亂跳。剛躺一會，聽到門外有人說，山上有人沒打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

見周永斌、周發亭和大隊治保主任唐紹志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籬筐，就是沒有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去補火。唐紹志在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前面，邊走邊唱：「叫你殺，你不殺；叫你奪（刺殺）你不奪；千斤重擔我來挑……」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田拐在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那個時候，五快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到過朝鮮，是復員軍人，膽子大，家裏又窮，聽到這話，二話不說，抗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人沒斷氣，在那裏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巾，拿回家去，因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繫了可以長壽。下了山，又過河來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一九八六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中。——筆者註）。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到山上沒人管，那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一群弱女子的悲慘命運

一、「開大鍋飯」

她本是貧農的女兒，一九六六年十月，經人介紹與下蔣大隊的陳高肖結婚。陳家成份高，

姑娘開始不願意，後來聽說陳高肖的父親雖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但為迎接解放軍進城做過貢獻，功已抵過；再說一看小夥子，人厚道，模樣不錯，能吃苦耐勞，也就同意了。婚後小倆口恩恩愛愛，很讓人羨慕。嫉妒的人則罵這個地主崽子有豔福。

八月二十六日晚，陳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陳高友把他叫走了。陳高肖一進大隊部，馬上被五花大綁起來。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用梭鏢在他腿上捅了一槍，痛得陳高肖大叫：「哎喲，你們要殺人呀！」陳登義也不答話，把手一揮，旁邊七八個漢子一湧而上，亂棍齊下，像打牲口一樣把他打死了。陳登義還把陳高肖和另外兩個照樣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腦袋用馬刀砍下來，以示其革命堅決。

噩耗傳來，女人嚇得暈了過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絆絆跑回了娘家朱家灣。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麼就不開呢？」殺都殺得，哪里還有搞不得的道理。」獐頭鼠目的陳錫位招呼民兵們，「大家吃飽些，攢足精神開大鍋飯啦。」

這群民兵在大隊部裏吃飽喝足了，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頭一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女人死死護著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歲的陳錫位就把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動，就殺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動了一下，她想到幾天前被砍頭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閉上了眼睛，說，「你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陳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褲子。女人說，「你莫撕，撕爛了，我就沒得穿了。我自己脫。」女人又哀求，「你輕一

點，我肚子裏有毛毛。」陳高友嬉皮笑臉地說，「就是要重點，一個地主崽子，壓壞了有什麼要緊？」他發泄完後，還順手從女人的衣袋裏掏走了二十元錢和四丈布票。接著是陳登義，也是殺害女人丈夫的兇手。這位貧協主席，早就對身下這個美麗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願以償。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當第十二個「開大鍋飯」者從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來時，雞已叫了三遍。

太陽出來了，人們覺得應該表現出大公無私的風格，便將氣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單身陳高月家，強迫她嫁給這個貧下中農。當晚，她又飽受陳高月的蹂躪。女人恢復神智後，乘人不備，逃回了娘家。後來，腹中胎兒早產，產後十天死亡。

這些禽獸不如的傢伙，粗看清一色的貧下中農，細查卻不對了。讓我們按照輪奸順序，看看他們是什麼貨色吧：一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系貧協主席，後因貪污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兇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污公款、姦污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復蓄意殺害一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一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一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閒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污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一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姦污過婦女。

當這樣一些人手上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麼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二、離預產期僅僅一周

再過一周，十九歲的唐水蘭就要做母親了。她興奮也有點緊張，細心感受著孩子的跳動，揣測著是男孩還是女孩……孩子的搖籃做好了，尿布也一疊疊整理好了，還有小衣小襪的，都準備妥當。娘家還送來了一擔鴨子。

然而，八月下旬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了一個未來母親的一切。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一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氣候特別炎熱。唐水蘭挺著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一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一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漓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一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隻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一劃，毛毛就出來了！」

三、要麼嫁人要麼去死

這地方叫竹山園子，一片綠油油的楠竹在微風中細語婆娑。

那天下午五點，一陣淒慘的叫聲打破了這裏的寧靜。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人扭著回鄉度暑假的小學老師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兒子，來到竹林中的一口地窖邊。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厲聲吆喝。這一家三口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兇手們又將柴草點燃，丟進窖中，濃濃的煙火吞噬了絕望的慘叫。但悲劇還沒有結束，因為向雨生還有一個漂亮的十八歲的女兒在家裏。他們留下她，是因為他們中的某某想娶她。這人太窮，年過三十還是一條光棍。他們回到向雨生家時，向的女兒向麗麗正伏在地上哭泣。他們揪住她的頭髮問：「你父母已判處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給我們貧下中農。」向麗麗聽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聲大哭：「我要我父母親，我不要嫁人！」

兇手們見她不識抬舉，馬上押著她往竹山園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員圍觀，見她面色蒼白，頭髮凌亂，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親！」到了地窖邊，殘煙仍在往外冒。兇手們用棕繩捆住她往洞裏丟時，給她最後一次選擇：「只要你答應嫁給何某某，我們就馬上放了你。」向麗麗停止了哭泣。也許在這一瞬間，她才意識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貴。在當時的道縣，許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口下屈從嫁人，而換回一條性命的。可是，這時對向麗麗來說，時間也是奢侈的了；還容不得她答應與否，那夥人中的一個早已不耐煩了，一個狗崽子的女兒這樣不識好歹，還留著做什麼！他舉起一把鋤頭，狠狠地朝這個剛滿十八歲的姑娘頭上挖去……

那時，天還沒有黑定，竹篁襯映著晚霞，如一幅鮮活的水彩畫；但向麗麗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這般美麗的景色了。

比起向麗麗，這三姐妹的命運似乎要幸運一些。她們都是同一個大隊的，都只有十七歲，父母也都在濫殺風中被殺害了。她們都姓塗，名字分別叫塗月華、塗美珍、塗秋蕾。

那是一個炎熱的中午，三人像牲口一樣被關進了公社的農貿市場，關在一起的大小小有七十多個人，多數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達到了極致，人們的神經麻木了，就連小孩也不會哭了。他們就那麼蹲在地上，眼光無神地一片沉默，等待著某個時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一聲令下，把他們送上屠場。這時，一個區裏的領導路過這裏，見人堆裏有那麼多小孩，順便說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殺了嘛。」

就這麼一句話，竟然救下了四十多個少男少女。其中就有塗氏三姐妹。

她們又被送回大隊關著。晚上，當她們一面慶倖自己倖免於死，一面為失去親人悲痛時，大隊貧協主席下達命令，指名道姓要她們嫁給本大隊的三個男子，其中一個還是個傻子。在兇手們看來，這無論如何也算網開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卻出乎意料，竟沒一個願意嫁人。大隊「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殺了你們！」

她們異口同聲回答：「殺了也不嫁！」

於是，她們被捆起來，受盡種種折磨。後來，她們中的兩人在夜裏冒著被殺的危險逃走了。另一個因被指定要嫁的那個男人的哥哥從部隊來信反對，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罷。

三姐妹在死亡與尊嚴面前，勇敢地選擇了後者，這無論如何也是沉沉暗夜裏的一線亮光，她足以讓我們在回首那段瘋狂而血腥的日子時不至於愧然失語，也讓我們有勇氣作為人繼續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瘋狂與血腥中失落

一、大義滅親，手勒養母的女民兵

當聽到這段往事的時候，我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宮之中。

她當時正值豆蔻年華，朝氣蓬勃的也是大隊一名基幹民兵。命運使她從小失去了父母，卻又為她安排了一位熱心腸的孀娘。孀娘收養了她，愛她疼她，待她如親生女兒。孀娘生怕讓她感到自己是個孤兒，她要對得起死去的兄嫂。儘管家境艱難，孀娘還是送她念了書，讓她能識文斷字，能寫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也就懂得了階級鬥爭的大道理。在這青山綠水中姑娘漸漸長大了，當她私下為自己的容貌嬌好迷人而驕傲的時候，也痛苦地發現扶養自己長大的孀娘原來是個地主婆，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是實打實的貧下中農。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提到那位孀娘時，有人說：「這婆娘心好，又幫我們養大了貧下中農的女兒，就特殊對待，不殺算了吧。」於是，就決定不殺了。

可是，待到殺人那天，卻見這位女民兵親手將她那四十多歲的孀娘捆著押到殺場。「帶回去，把你孀娘帶回去！不是講好了，特殊處理的嗎？」大隊貧協主席兼「最高法院」負責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樣，杏眼圓睜：「什麼孀娘，階級敵人！」押到地窖邊就要動手。孀娘到這時還心存一線希望，回頭望著手持雪亮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問：「夯子（妹子），這些年來我究竟虧欠過你沒有，我只想聽你說句實話。」蓄滿淚水的眼中閃動著難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許她並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這樣死，未免太寒心了。姑

娘斷喝一聲：「不用講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將嬌娘的腦殼像削南瓜一樣削了下來。人頭落地，眼睛依然睜著，兩顆豆大的淚珠迸濺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當然，姑娘以後也為自己的「革命行動」付出了代價——附近幾十里知道這事的後生，誰都不敢娶她，雖然她還是很漂亮。再後來，外縣一位因出身不好，年過三十還沒討到老婆的小學教員娶走了她。村裏人可憐她，把往日的事瞞得鐵緊。筆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實姓名，是可憐她的丈夫，也是可憐她。當然，幹出這種事，她不是頭一個。想當年，許多出身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因投身革命而與富貴家庭決裂，及至土改或鎮反，將生身爺娘送到殺場，以示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也是時有所聞的。如此，我們也就不能對這個可憐又可憎的鄉下女孩作過多的指責了。

一一、拋妻殺子的丈夫

這就實實在在讓人想不通也無法想通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一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平時相親相愛，夫唱婦隨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一併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風急火急地告訴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你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聞訊急忙趕去，到邊時卻越走

越慢，最後竟然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許他認為女的不該這時跑到娘家來，給他丟人獻醜了。或許他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個多大的錯誤，居然娶了個地主的女兒！審訊的人問他：「你看怎麼處理？」他竟回道：「由你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一棒子打昏過去，沒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一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屋裏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為好。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一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旁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一個用石頭砸，一個用鳥銃打……這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三、「求求你們，莫讓我光著身子見閻王」

這個石洞就隱藏在這亂石雜草中。很深，裏面很寬，斜斜地伸下去，下面還有陰河。據說，抗日戰爭時期，當地人在這裏躲避過日本兵。那天，聽說日本人過來了，有上千人躲在裏面。果然洞外來了日軍，不過只是三個日本兵。日本人隱約聽見洞裏有人聲，便以為是遊擊隊，嚇裏哇啦地朝洞裏吼了一陣，見沒人出來，就很從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口，又從村裏搬來一架風車，點著了柴草就往裏鼓風。還是沒人出來。三個日本兵不知裏面深淺，不

敢下去，於是很生氣地往洞裏丟了幾個手榴彈，就走了。

這陳年舊事聽起來好像不大光彩，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這個洞真正出名是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這裏處決，殺了也不用埋，一腳踹下洞裏去了事。血光與哭喊聲相混雜，那場面活像是人間地獄。下午，遠處又響起了吆喝聲。四個手持馬刀、烏銃的民兵，威風凜凜地押著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朝洞口走來。

老婦人叫唐長鳳，幾十年一直守寡，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拉扯大三個兒子。如今三個兒子又養育下了兩兒兩女。按說，唐長鳳總算熬出頭了，該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福了。這當然是中國傳統老人的最大的心願了。然而，唐長鳳老人沒有這個福份。這天上午，她的三個兒子、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都被拉出去殺掉了，一個也沒留下。拉扯大一個人不容易哩，怎麼說殺就殺了呢！她知道自己在也是在往黃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無牽無挂。是啊，兒孫們都死光了，還留下個老的做什麼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淨！

她平靜地走在這群不停吆喝著的人中間，一步步走向那個天然的墳墓。快到洞口時，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她的褲帶斷了，褲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來。她本能地叫了一聲，彎下腰，把腿夾緊了。幾乎是用乞求的聲調，對那些年輕人說：「讓我提起褲子吧，求求你們！」她是人啊，無論何時何地，人總是知道羞恥、懂得維護起碼的尊嚴的，何況她是個女人呢！她的雙手是被反綁著的。

民兵們笑了起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還提什麼褲子？起來起來！」

唐長鳳哭了。整個上午，在聽到兒孫們被殺的噩耗後她是沒有流過一滴淚的。她那蒼老的

哭聲原來是那麼的悲涼。她最後一次哀求道：「論年紀，我是你們的娘、你們的奶奶，我一生沒做過缺德的事，你們莫要讓我光起身子去見閻王呀。」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年輕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話、用階級鬥爭的觀念駁斥了老人的糊塗觀念。隨後，便罵著，笑著，推著她快走。

就這樣，唐長鳳一步一步，光著下身走到洞邊，走到她生命的終點。

殺殺殺，血光中的罪惡與無恥

一、靠殺人創收的無賴

他叫胡茂昌。

這人斗大的字不識一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淨，很讓周圍人看不起。即便是殺人風起時，大隊也沒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嚷著要去殺，誰都攔不住，你總不能不讓人家殺階級敵人嘛！胡茂昌為什麼要削尖腦袋去殺人呢？一是當時他心裏直發衝，直想殺殺殺；二是殺人是有補助的，窮得叮噹響的他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二十一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來，自告奮勇地，「我來一個！」待到把「二十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時，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當大家有點畏縮時，胡茂昌上前一步，拍著胸膛：「怕什麼，看我的！」他搶過一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

了，殺卷了口，他嘴裏不乾不淨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一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髮都被血漿糊住了。殺完人，他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一片嘖嘖讚歎。這時，其餘十三名已經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馬刀尖挑起一個頭，舉起來耍耍，可弄了幾下都沒挑起來。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隊書記方才已被胡茂昌的作為鎮住，想不到這傢伙還真是個人才！還沒等他點頭稱是，胡茂昌又一馬當先，殺回村去。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一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一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一摔，也沒氣了。他從搖窩裏抓起最後一個，正要如法炮製，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較好，又與大隊主要負責人有點親戚關係，故決定不殺）踮著小腳，母親一般撲上來，死死地拽住小孫子不放。胡茂昌大為惱火，猛一發力，將老奶奶推倒在一丈開外；順手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腳，朝下使勁一擰，在一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一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五十五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一人，報酬一般是二、三元或十斤穀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一點，每人五元。

二、貪婪的公安和兩條弱小的人命

有關材料上，只簡單地記錄著這樣幾句話——

八月十四日，楊遜卿（橋頭公社公安特派員）親自到大江洲大隊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殺人。該大隊第二天殺了二人。

殺了二人，兩個什麼人呢？秦秀容，女，七十五歲；何國新，男，五歲。

那麼多四類分子及子女尚未開刀，怎麼就殺了一老一少這麼兩個「階級敵人」？楊特派員當然有他的道理。因為大隊開會研究殺人時，有人提到，過去秦秀容家裏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魚燉肉，還說秦秀容身上藏有幾本存摺……楊遜卿心裏一動，覺得機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腳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曉得會落在誰的手裏。說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給蔣介石反攻大陸用的。於是，決定先把這一老一少抓起來。

誰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釘子斷：光洋一塊都沒有，土改時都交出來了。說到錢，家裏只有祖孫兩個相依為命，又沒個勞動力，吃飯都成問題，哪里還有錢存？

楊特派員不高興了。老的死頑固，就威嚇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繩（捆起來）；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說著，還拔出腰間的手槍，比著小孩，嘴裏「叭叭」了兩下。

五歲的何國新沒見過這樣恐怖的場面，跪在奶奶的腳下，哭得淒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吧，交出來……」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靜得叫人憤慨。

何國新又轉向持梭鏢、馬刀的人們，「叔叔、伯伯，你們莫殺我，莫殺我。我會做事，我給你們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摺就不殺你了。」楊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國新又轉身抱著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光洋是什麼呵，藏起有什麼用啊！」

可是，秦秀容寧死不交（也許根本就沒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撫摸著孫子的頭，說：「好細崽，不要以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誰來照顧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個伴。」遂一起被殺。

三、臨死前，一個地主份子的坦白交代

有這樣一個場景，這樣一段對話很耐人尋味。

原屬道縣現屬雙牌縣的理家坪公社，有一個地主分子，被打死時約六十來歲。他解放前還做過國民黨的縣糧食局長，土改和鎮反沒殺，要麼是有點立功的表現，要麼是留下來作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後儘管勞動改造得可以，每次運動一來，照例都要牽出去遛遛亮亮相的。這次跑不掉了，群眾大會上被「判處」死刑。大隊貧協主席兼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宣判後問他，「你知罪不？」

他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麼法。」

「你說要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留下地富當骨幹。」

「我好像沒說過這個話。」

「你還不老實！說，你這樣想過沒有？」

「你讓我想一想我想過沒有。」

「你還不老實！」口號聲驟起。

「我想，殺黨、殺幹我或許可能想過；但是，殺貧下中農我確實沒有想過。」

「你還不老實！你殺黨、殺幹，就不殺我們貧下中農嗎？」

「你們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說，地主是靠剝削貧下中農來生活的嗎？把你們都殺了，我剝削誰去？」

「你，你死到臨頭還不老實！」

「我正因為死到臨頭，才特別老實！」

於是，群情激憤，一湧而上，讓這個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幾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幾根木樁上，然後，黨員、團員、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每人發根本棍，從頭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還問一聲：「還老不老實？」直到打死為止。

殺完地富之後……

那個大隊的「最高法院院長」和貧下中農們不相信老地主的話，自然有其道理；但他們大約從未想過人是不能殺得興起、殺紅眼睛的，殺上了癮，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殺盡，說不定就輪到自己的頭上了。

一、舊恨私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四十七軍六九五〇部隊進駐道縣已有三天，制止殺人的精神貫徹到

了全縣各大隊，梅花公社東風大隊當然也不例外。傍晚時分，東風大隊的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回來，同村的何定信和兒子何若英到何若貝家聊天，鄉下人想聽聽城裏面的新鮮事也是正常的。這事到了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耳裏，卻成了何若貝從「革聯」窩裏回來搞串連。何營長當即吹響緊急集合哨子，帶上十幾個民兵將何定信父子抓起來。然後，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也附帶整了一個漏網富農何喜生的材料，一同報請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殺何定信的意見。

九月五日上午，何子良召開社員大會，宣佈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獅子山槽古裏殺害。何定信的兒子何若英也被綁去陪斬。為了讓何定信死個明白，在殺他時，何子良說：「慢點，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裏的樟樹？」

原來，一九五〇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為一棵樟樹與何子良發生糾紛，還進過區、鄉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贏了，致使何子良耿耿於懷。

當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來了電話，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審訊」為藉口，帶領三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祠堂裏提出來。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貧下中農，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說，我父親也死了，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裏煩，心想照你的說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該殺了，留著以後翻天？「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他喝道，一邊就叫著上路。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窯邊時，何子良就叫民兵開槍；但大家覺得，不是說公社要提

人嗎，怎麼在這裏搞掉呢？都不肯動手。何子良生氣了，狠狠地罵了一句，開槍親自將何若英打死。然後，又叫一個民兵用馬刀把死者的頭割下來示眾。

二、借刀殺人

比起性情魯莽的何子良營長來，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的何代餘支書殺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後，何代餘一直擔任吊高樓的黨支部書記，嘴巴能說會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佔點什麼的。一九六四年農村搞社教運動，大家都不提何支書意見，只有貧農何代井站出來，清了何支書的賬；受社教工作隊「左」的影響，還居然打了何支書一記耳光，而且致使何代餘殺了自家一頭豬用於退賠。老支書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著就來了，何支書在會上思想深刻地說：「階級鬥爭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幾個四類分子，那些一貫調皮搗蛋的壞傢伙也要幹掉他個把子，讓毛主席的光輝徹底照耀我們吊高樓大隊！」不過，老支書把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好、用得活，懂得飯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個一個打；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於是，支部研究決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線——消滅四類分子。何代井不願意幹這殺人的活。何代餘就語重心長地批評他階級立場不穩，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實行「革命紀律」。並坐下來，一同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老支書終於做通了老貧農的思想工作。於是，老貧農何代井煥發了青春，意氣風發地提著把明晃晃的馬刀，村裏村外地趕著去殺人，一時成為令人矚目的殺人英雄，在四鄉出盡

了風頭。等到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差不多殺乾淨了，上面也傳話禁止濫殺時，何代餘立即召開了大隊民兵營長、文革主任聯係會議，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這坨毒（如毒藥一樣的壞東西）。因怕他性子暴烈、會拼命，何支書又想出了智取的辦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喚去大隊部分花生和紅瓜子，何不知是計，早早地來了，坐在大隊部的門廊裏抽煙。何支書看準了，一聲令下，三條漢子沖上來，一頓扁擔打斷了何代井的手腳。然後即刻召開群眾大會，當場宣佈了何代井打人殺人，連小孩也不放過的種種惡行。群眾義憤填膺，一致喊殺。可不，留下這個何瘋子還不知以後會幹出什麼事來。於是，那打斷了手腳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樣，人們趕來一頭雄壯的牯牛，把何的雙腳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後，像拖犁拖耙那樣，拖去兩裏路外的尖尖嶺上處決。可憐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爛了，像個紫紅色的泥球。

最後，十幾個民兵又用鳥銃打了一陣。
其實是有點多餘了！

湘南大地，腥風蔓延

道縣大屠殺，無異於引爆了「精神原子彈」（文革術語），衝擊波四下擴散，連省會長沙湖南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也跟著貼出了「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幅標語。當然，影響最大、照樣畫瓢或有所創新的是道縣周圍的幾個縣市。且舉幾個實例如下。

江華瑤族自治縣：

從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起到十月二十五日止，歷時五十七天，共殺人八百九十八人。其中，曾參加過桂東遊擊隊，任江華地下解放武裝分隊長的老地下黨員唐家雄也身首異處。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虞上勳不堪凌辱被迫自縊身亡。

該縣殺人起步晚，動手時四十七軍已進駐道縣，收刀時已到年深秋。似乎有頂風殺人之嫌。數量上雖比不上道縣老大哥，造成殺人的深層原因卻極為相似。當時，實際上行使著政府職權的江華縣抓促領導小組和縣武裝部的主要幹部，對殺人事件或明或暗地採取了縱容態度。濫殺期間，這些縣級黨政軍領導人曾下發過如此一個《關於制止殺人的六條意見》的文件。現全文抄錄如下，看看這些縣太爺們是怎麼制止殺人的：

江華縣關於制止殺人的六條意見

一、群眾自覺組織起來，造四類分子的反，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大方向是對的。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首先是四類分子挑起來的。因此，我們不能壓制和指責他們。我們應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有關政策，不能犯保護敵人，打擊貧下中農的錯誤。

二、要教育群眾不要上敵人的當，不要被敵人把我們的陣營打亂了，如發現宗派鬥爭，要教育團結對敵。對某個四類分子處理意見不一致，要進行協商。決不能互相殘殺，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三、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與群眾的情緒。指揮部的人員要下去幫助區社幹部開展工作，

要站在廣大貧下中農一邊，因勢利導，不要驚惶失措，不能阻礙群眾運動的發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對的。如果把群眾意見大的四類份子都捉起來，實際上是保護了敵人，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的一種表現。對解放十七年來一貫不接受改造，而現在又要向貧下中農奪權的四類分子，群眾要殺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眾的造反精神是對的，我們只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給群眾潑冷水。

五、教育群眾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暴亂和殺害貧下中農。我們一定要支援貧下中農，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對於他們的某些錯誤行為，通過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有關政策，廣大貧下中農自己一定會糾正過來的。

六、混進革命隊伍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群眾來要，儘量做好說服工作，對地富子女要加強教育，實在說服不了的，群眾一定要的，也得給。

該意見在部分單位下達後，遭到強有力的抵制，雖未能全面貫徹，但其對全縣以至整個地區殺人的影響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如此意見絕非個別現象，其立場觀念也不是江華瑤族自治縣黨政軍領導的專利。

寧遠縣：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開始殺人。先是梅崗公社小歐家大隊殺了四人。接著，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三十八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一樣捆在一起，一個一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

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有人問他怎麼搞時，他笑而不答，很藝術地從地上撿起一根稻草，另一隻手以掌代刀，作了個砍的姿勢，示意斬草除根。幹部們欣然從命。於是，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八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山窩裏的彎子裏村，村子不大，多數都姓鄭。一九六七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澗溪水泛紅，雜草樹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十二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一世替你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剛滿十七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姦，然後砍死。十二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一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裏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一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共殺一千零九十二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江永縣：

江永縣界牌公社黨委書記楊修玉可以說是個活學活用的標兵。大屠殺期間，楊書記回老家

道縣探親，沿途見河裏漂著死屍樹上挂著死屍，又到同僚那裏取了點經，很受啟發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開會時吹了吹風。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劉自進帶著一些人，敲鑼打鼓地來公社報喜，稱該大隊昨晚已殺了六人。整個陵零地區殺人報喜的，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隊亦紛紛部署殺人，先後殺三百二十五人。

雙牌縣：

該縣殺人的特點是零星、分散、殘忍。全縣共殺三百四十五人（含被迫自殺的四十八人）。

新田縣：

以開萬人大會著稱。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才開始殺人，動手稍晚，但聲勢浩大，全縣二十一個公社就有十八個公社先後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

永州市、冷水灘市：

這兩個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屬零陵縣管轄。永州市九月間的幾天內殺一百五十八人，佔全縣殺人總數的二分之一強。冷水灘市，一起打架鬥毆死了人事件，誘發了全市性殺人事件。

南山縣：

共殺一百四十五人。該縣特點是基層幹部階級鬥爭覺悟高，大隊一級自發地追查反革命組

織，繼而殺掉其中的「骨幹」。現已查明，全部係假案。

祁陽縣：

原屬衡陽地區管轄。該縣毗連零陵縣的周塘公社，殺人期間曾逼供出一個所謂的「黑殺團」。公社組織委員李新明擴大「戰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並將追查風擴展到全縣三十三個公社，其間共殺二百一十八人。

東安縣：

中國有名的武術之鄉，距道縣較遠，位於京廣線上，殺人事件中僅殺十一人。值得一提的，大規模的殺人腥風停息了的八個月之後，該縣有關部門因審查一個有作風（男女關係）問題的婦女，引起全縣追查所謂「反共救國軍」，挖出一個有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參加的龐大的「反革命組織」。追查、審訊中，打死一百四十一人；被迫自殺二百七十八人；致傷致殘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如此說開，還真不好界定那場大屠殺的時間段和被殺的人數。當然，這裏只是順便提提而已。

尾聲

出動四十七軍制止殺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點，一支部隊，大約一個加強連，全副武裝，成四路縱隊，走進道縣道江鎮街頭。四十七軍六九五〇部隊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殺人。解放軍來了！制止殺人來了！道江鎮居民走出家門，夾道歡迎。歡迎解放軍的還有千瘡百孔的建築、血跡斑斑的街頭和滿街白花花的大字報！顯示著兩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鬥爭。這裏摘錄兩張不同觀念的大字報，或可感覺出當時整個道縣的火藥味來。

一張是「革聯」貼出的大字報，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後，這樣寫道：

……我縣這場大屠殺，是以「紅戰士」為首的「紅聯」，在黨內走資派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劃已久的。他們從上到下，以行政的壓力，結集全縣的民兵進行武鬥訓練，集中所有的民間鐵匠大製殺人武器。他們公開盜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偽造黨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種會議，欺騙群眾，堵塞水陸交通，遍設關卡，攔路搜查，私設牢房，以高工分、發錢、發糧的手段，誘騙農民進城武鬥，圍攻革命造反派。在農村製造白色恐怖，殺人如麻，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紅聯反動頭頭公然喊出「槍桿子裏出政權！」「刀槍出左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他們孤注一擲地把賭注押在這場大屠殺上，向

黨中央施加壓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懾服於他們的屠刀之下……為了搞武鬥，為了消滅革命造反派，他們不顧一切，不擇一切手段，在廣大農村設立關卡，拆毀橋樑，挖斷公路，封鎖碼頭渡口，抽走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集中於區、公社，為搞武鬥脫產集中訓練……大批的公積糧被吃光，大批的國家財產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優待武鬥人員，大殺雞鴨，大吃大喝，加重生產隊的負擔，生產隊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紅聯欠下的筆筆血債是清算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徹底清算！

「紅聯」張貼的一張大字報則這樣寫到：

全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

全縣廣大革命工農兵同志們：

道江鎮告急！富塘公社告急！！營江公社告急！！！！都龐山在怒吼，瀟江水在咆哮！道江、營江、富塘籠罩著一片陰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來，革聯依仗著非法搶奪縣武裝部的槍枝為反動資本，到處橫行霸道，胡作非為，在道江鎮大肆進行打、砸、搶、抓、殺，接二連三地鎮壓我紅色造反派和廣大貧下中農，造成全縣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進行了新的陰謀策動，逐步往富塘、營江等農村圩鎮圍剿貧下中農和紅色造反派，企圖用抓人、殺人來征服人心，瓦解我紅色造反派，達到他們在道縣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革聯是一個大雜燴湊合的……這個組織原來是以「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組織組成的，由於在壞分子的操縱下，一部分貧下中農出身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看到革聯的大方向不對頭，退出了這個組織……從現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來名革聯的成員來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佔百分之四，四清下臺幹部佔百分之六，貪污分子佔百分之十四，勞改釋放犯佔百分之四，五類分子佔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貧下中農、革命職工等僅佔百分之四十……由於革聯壞頭頭，抗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造成城鄉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眾不能安心生產，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鄉隔絕，逼全縣形成死水一潭。農民群眾要買要賣的東西，不能及時買回賣出，商業部門要調進調出的東西，不能按計劃及時調撥，已將近兩個月未從外地進貨，物資庫存薄弱，如食鹽、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區已經脫銷，有的地區正在告急。供銷系統的供銷任務，原計劃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供應任務可增長百分之十五，由於革聯造成交通運輸堵塞，城鄉關係斷絕，購銷計劃反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聯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解放軍的到來，並沒有馬上給道縣人民帶來平安，就在軍隊進城的第二天，八月三十日，「紅聯」和「革聯」又在縣城發生大規模武鬥。「紅聯」方面指揮失當，被「革聯」打死二人，打傷七人，俘虜三百六十餘人，被繳槍支一二〇餘條，梭鏢、大刀、棍棒丟棄無數。「紅聯」的總指揮部再次遷往清塘區。武鬥的加劇，使已趨緩和的道縣農村殺人有所激化。八月三十日，「紅聯」召開四〇〇多人的追悼會。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志、「紅聯」前線指揮部頭頭賀震

等人在會上聲稱，「四類份子膽敢翻天，就斬草除根！」

我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一些人，尤其是有個一官半職的人，總是主觀地將造反中的一派，與鄉村的四類分子對等起來，高興或不高興，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個人樣的鄉下弱小者開刀。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大概殺殺毫無反抗之力的四類份子和他們的家屬很容易，反正這些傢伙都是階級敵人，不殺白不殺，殺了也白殺；同時可以顯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風，也借此出出心裏的悶氣。

部分區社仍在抓緊殺人。長沙市一位姓劉的老知青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描述了部隊進駐道縣後的情景：大約四點鐘，我們到了縣城。太陽高挂，道江鎮卻已是陰沉的黃昏，清靜得反常，看不到一個行人，家家關門閉戶，只有一隊隊佩著紅袖章、挂著衝鋒槍的解放軍巡邏隊從街頭走過。除了大橫幅、大標語之外，一些牆壁上還殘留著「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佈告。這種佈告言簡意賅，名單比罪狀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儘是紅鉤。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難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嗎？

九月一日清晨，道縣上空無霧。一架伊二型軍用飛機在道縣上空低低飛行，撒下制止殺人的傳單。九月二日，飛機又撒傳單一次。各式各樣的傳單如雪片般飛向城鎮、山鄉和田野。傳單上以醒目的大字印著：

「禁止殺人！」

「殺人犯法！」

「要文鬥，不要武鬥！」

「不要群眾鬥群眾！」

有的傳單沒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六九五〇部隊也分散到農村，開始了艱難的制止殺人的宣傳工作。

鄉下的濫殺風漸漸減弱。但縣城裏的派性鬥爭並未結束，有時甚至因某個突發事件而升溫。九月二十三日，「革聯」將衝入二中的「紅聯」打死十二人，打傷多人。這無疑又激起了「紅聯」派的憤怒，將仇恨再次轉移到農村那些無辜的弱者身上。這也使得部隊制止殺人的工作更加困難。

現在陝西某部隊農場擔任政委的原六九五〇部隊組織股長吳榮華回憶說：「我們到道縣後，馬不停蹄地展開宣傳工作。特別在農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長矛、鳥銃等兇器進行圍攻。罵我們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揚言要同我們「拼到底」。」

現為湖南省某糧食局退休幹部、原六九五〇部隊一營副營長劉富安回憶：「一天中午，聽說清塘區一個地方要殺人，團政委孫潤清立即派我帶二連的一些人趕去制止。到那裏時，天已快黑，人也被殺了，屍體擺在一口水井邊，幾個人手持切西瓜的長刀和獵槍站在村口，堵住我們，經我們再三宣傳，才讓我們進了村。當晚，我們沒有地方住，住進了一個小賣部裏。賣主見我們去，馬上把能吃的東西全藏起來，不賣給我們。他解釋說，『不是不給你們吃，是不敢給；誰給了，上面就會抄誰的家，還會掉腦袋。』我們又冷又餓，在小賣部過了一夜。」

「九二三事件」發生的同時，道縣殺人之風迅速向外蔓延，鄰近的幾個縣市也抓緊動手殺人

，其殺人手段之殘忍較之道縣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就以上事件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堅決制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共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以後，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手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參加鬥批改，不准以任何藉口對其進行圍攻，毆鬥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的關卡，要立即撤消，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這張通告明顯地帶有當時部隊「支左」的痕跡，深受「革聯」之類的造反組織歡迎，可惜好景不長，在以後的各類運動中，「革聯」之類的造反組織將受到軍代表和地方官員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政府的殘酷鎮壓和清洗。但這張通告無可置疑地為最終平息歷時兩個多月的慘絕人寰的湖南農村大屠殺發出最後的通牒。

文革後的善後與處理情況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四年零陵地區有關方面對道縣殺人事件作過兩次象徵性處理。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極左」之風猖獗的日子裏，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鳴冤上告。

一九七八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一三八九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情況大致如下：

一、對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隊、生產隊的殺人策劃者和兇手作出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

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逮捕，並判有期徒刑。如關有志、袁甫禮。

三、對那些謀財害命者、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兇手情節特別惡劣者、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然成批組織殺人者逮捕法辦，追究刑事責任。

劉代修就是一個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劉手上有幾十條人命，判了十年，因為他不該在得到上級明令禁止殺人後頂風作浪。事情得從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說起。李念德原本有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十四口。這家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被以劉代修為首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了四口；六九五〇部隊進駐道縣制止殺人後，大隊負責人劉代修對抗禁令，又殺害了他家九口。剛滿二十歲的李念德因連夜翻山越嶺逃走，才得以倖免。這裏，摘抄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道縣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八六）刑字第十號）如下：

被告人：劉代修，男，四十九歲，不識字，漢族，係道縣楊家鄉金獅庵人，一九六七年任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貧協主席，捕前係楊家鄉金獅庵村農民，現在押。

道縣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一案，對被告人劉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在本院會議室依法進行公開審理，現查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被告人劉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與何議論殺人時，出謀召開支委會研究殺人。何同意後，便分別通知支委黃某某、蕭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經支委會研究，決定殺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當天晚上，被告人劉代修為首在大隊正堂屋召開社員會，宣佈殺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開會時，本大隊蔣昌進，接到公社秘書蔣某某制止殺人的電話，當即告訴被告人劉代修，被告人劉代修唆使蔣向公社誹報被殺者已被民兵牽出去了，並說「殺錯了我負責」，隨後立即組織民兵將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綁押走。當行至金獅庵供銷社門前的公路上時，本大隊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殺人的電話後，立即追上公路，將電話內容傳達給被告人，被告人劉代修仍不聽制止，說什麼：「我負責就負責，坐牢我去！」即指揮民兵將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黃旗子河邊殺害。

經審理，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

本庭確認，被告劉代修，在一九六七年殺人期間，曾兩次得到上級明確制止殺人的通知，仍繼續為首組織成批殺人，情節特別惡劣，後果極其嚴重，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的追訴期內，應追究其刑事責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是在「文革」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受極左思想影響實施的，且認罪態度較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五十二條，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劉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四、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的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撫恤金。如橋頭大隊周文棟一家大小五口無辜被殺後，家中一切當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給這家人發放《平反通知書》（編號為〇七八九）的同時，還補發了被抄財產費三百七十九元，房屋修理費三〇〇元，共計人民幣六百七十九元。因周文棟全家皆被殺，此補發款只能發給周文棟的弟弟。指揮殺害周文棟一家人的生產隊長周某某也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此後，仍然有許多遺屬不服，仍在上告。他們被侮辱折磨過，他們的親人慘死於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中，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月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毀滅了！幾十幾百元人民幣或一紙《平反通知書》是無法撫平滴血的傷口的；那些製造策劃殺人和兇手，大部分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悔過認罪，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一抔黃土。而且，究竟誰是真正的主謀兇手，發生這場野蠻殘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受害者有權追究個水落石出。如果不是這樣，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類似的甚至更為可怕的事情發生？一場血淋淋的大屠殺不能就這樣遮遮掩掩地敷衍過去。然而，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弱小。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願意去揭開那塊傷疤——那是一塊見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旗號，行東方封建專制之實的統治者的一塊心病。

不錯，那些持槍執刀者，大都是所謂的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但是誰點燃了他們心中的仇恨之火，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答案其實非常清楚！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十年，「貧下中農」作為一個階級，被抽象化和神聖化，被賦予在鄉村的

特權地位。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權力利益又在哪裡呢？他們同那些「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一無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當專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殺那些比他們更為可憐的同胞，來滿足那名譽上高人一等的虛榮。這種國民的奴性人格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其生長於專制社會的土壤之中，為專制者所培植，也為專制者所利用。

當時光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後，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已越來越少地被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份子」、「階級鬥爭」，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辭彙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縣那數千人被分別和集體屠殺的慘劇就更是成為一個腥紅的童話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廈，造高速公路，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好好地療治肉體與精神上雙重的傷痛，好好地檢視一下殘殺的原由，又一窩蜂地擠上不知終點的慾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乾乾淨淨。二十五年前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臺空間，表演得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那裏找到源頭和註腳。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之創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不知道那一天能夠客觀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兇，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還數千屈死慘死的山村平民一個公道；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永久的安慰；也給我們下一代一個明確的交代。

然而，我們能夠等到這一天麼？

面對這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中國，為什麼我們眼裏總是飽含淚水……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二〇〇一年第七、八、九、十二期

章成：大陸作家，現旅居美國。

◎ 鄭義

廣西賓陽慘案調查記

解放軍副師長王建勳指揮大屠殺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革重點城市圖



據

有關湖南道縣大屠殺記實所述，道縣的屠殺起於民眾，止於駐軍。我這裏寫的賓陽屠殺則恰恰相反。這是一個在當地駐軍嚴密組織指揮下的大屠殺事件。時間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正是道縣屠殺近一年之後。

十八年後，一九八六年春夏之交，我來到賓陽。關於賓陽屠殺，文革後新修的《賓陽縣誌》簡略陳述道：

一九六八年七月底，縣革委主任王建勳（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副主任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以貫徹落實「七三佈告」為名，動員向所謂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致使全縣被打死或迫害致死三千八百八十三人，加上貫徹「七三佈告」前被打死或迫害致死六十八人，文革中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失蹤三千九百五十一人，造成了一大冤案。

「七三佈告」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頒佈的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文件。以廣西各地近來出現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等「反革命事件」為由，要求更加嚴厲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雖無「格殺勿論」的字句，但殺戒大開的意味滲透全篇。

風暴前的寂靜（七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二日，縣革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號召貫徹落實「七三佈告」。

七月二十三日，縣革委在縣城所在地蘆墟召開萬人大會，駐軍副師長、縣革委主任王建勳在會上作了貫徹「七三佈告」的動員報告。副主任余XX講話，稱「七三佈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廣大群眾穩、準、猛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最強大銳利的武器……」

再一日，成立「賓陽縣落實『七三佈告』領導小組」，四名成員，清一色軍人（王建勳：駐軍副師長，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黃智源：駐軍教導員；凌文華：駐軍炮營政委）。一眼望去，已是殺機隱現。

短短三日之內，一場即將血洗賓陽的屠殺已經部署就緒。二十五日，全縣擡旗息鼓。事後，人們發現這是風暴來臨之前的寂靜。

流血開始（七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二十六日，賓陽縣公檢法軍管會召開會議，對區、鎮一級黨政領導、公安人員、派出所長發出殺人指示。王建勳指出：湖南早已行動起來了，賓陽是國民黨時期的「模範縣」，必然有潛伏的階級敵人。並指責新賓鎮貫徹「七三佈告」不力，還親自點了居民黃德三、羅桂昌二人姓名。當晚，新賓鎮革委雷厲風行，在南橋頭開批鬥會，將黃、羅二人打死，拉開了賓陽大屠殺的血腥的帷幕。

二十七日，新賓鎮墟日（集市貿易日），被王建勳督戰的新賓革委組織遊街，打死「四類分子」十四人。首開成批打死人先例。

同日，縣武裝部組織各區武裝幹部到新賓觀察殺人現場。蔣河公社民兵營長吳某某等立即通知民兵連長押送「四類分子」到公社集中，於二十八日晚十時集中屠殺。一批共二十四人。

二十八日，縣城蘆墟墟日。王建勳授意在最熱鬧的縣城中心遊鬥大批「二十三種人」。據《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二十八頁注解：「文革期間所說的二十三種人是指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份子、被投、被關和外逃反革命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這裏僅列二十二種人，疑遺漏「資本家」。這種「二十三種人」的提法，不知除了廣西外，還流行於南方哪些省份？被煽動起來的群眾以木、石當場打死八、九十人。其中包括縣醫院院長、副院長及內科、外科、婦產科、藥劑科主任等。縣醫院的業務骨幹基本殺絕了。

駐縣醫院宣傳隊負責人李明聽說這件慘案十分震驚，趕到王建勳辦公室彙報。這次彙報，在李明當時的筆記和後來的證詞中有生動的描述：

李明：我向你檢討來了。先彙報一下情況（隨即彙報了縣醫院被打死人的情況）。

王建勳：那裡有甚麼反映？

李明：好人感到高興。有問題的耽心。也有個別人講，不該死的死了。可能多了一點。

王建勳：死就死了嘛，有甚麼值得檢討的？回去要和大家講，不要以為死了幾個人就灰心喪氣。還要硬著頭皮頂著幹。醫院一百多人不死他十幾二十多個算甚麼？現在剛剛開始呀！

李明：原來我對首長指示理解不深。

王建勳：原來叫你們去鬧個天翻地覆，現在給你們震動一下！該認識認識了吧？還要回去給他們講清，要鼓起勁，挺起腰桿幹下去。不要死了幾個人就怕了。

李明：現在被打死的家屬不上班，過幾天準備找他們談談。

王建勳：要對他們說，不幹工作，人家連他們也要幹掉。

屠殺示範（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縣革委主任王建勳在軍管會召開的政法幹部會議上，推廣新賓鎮打死人的經驗，對打死人的物件、時間、手段、辦法和指標要求都作了具體部署。他在會上說：

「我們打這一仗，時間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為一段落。鬥爭的鋒芒主要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次要的是投機倒把份子，賭頭，領頭鬧分生產隊的首要份子。縣的重點在新賓、蘆墟。現在新賓已拉開序幕，不要看不慣，氣可鼓不可泄。這個任務要執行，但又不能開大會，大張旗鼓去發動，只能個別點火。群眾認為是壞人的要專政，你們不要束縛群眾的手腳。」還講：「當運動起來，積極分子開始開槍殺幾個問題不大，但我們要引導用拳頭、石頭、木棍打，這樣才教育群眾，教育意義較大。現在賓陽有四千多名『四類份子』，你們對他們改造十幾年，我看一個沒有改造過來。群眾也花了不少精力監督他們，我們有那麼多精力去發展生產不好嗎？這些人交給群眾專政，用不到三天時間就幹完了又不花一槍一彈。這次行動，時間三天，現在告訴你們一些底：這次運動要對敵人砸死的大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共賓陽縣委整黨辦公室編

印，一九八七年四月，第十四頁）

《大事記》略掉的一些生動的語言，對於我們瞭解王建勳其人的性格、氣度頗有補益，特續貂於後。一上來，王建勳就從他的樣板新賓鎮談起：

「這兩天新賓、蘆墟搞了不少壞人，你們有甚麼感覺？前兩天我講話你們聽不進去的，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吧？要求公安人員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走在運動的後面像小腳女人走路一樣，這是不對的。大家是否認為這兩天殺多了？如果這樣認為就是右傾表現。為甚麼呢？多殺幾個也可以嘛，這兩天殺了幾個人是整個運動剛剛開始，再住後會殺更多的。我在新賓點了一把火，看你們怎麼行動！（《關於王建勳策劃，指揮大量殺人的犯罪事實》中共賓陽縣委，附件之一，第三頁）

屠殺在王建勳嘴裏顯得十分瀟灑、胸有成竹，舉重若輕。他真的不知道他在鼓動殺人，在觸犯天條嗎？他實在知道得太清楚了：

「……今晚會議我講的只能在座的知道，回去不能說是上面佈置的，就算你們說是我講的，我是不認帳的。」（《關於王建勳策劃，指揮大量殺人的犯罪事實》中共賓陽縣委，附件之一，第六頁）

就在這一夜，王建勳還主持了全縣各區武裝部長和公社民兵營長緊急會議。王建勳向不願動手殺人的單位施加壓力：

「有些單位在那裏看，拖拖拉拉不動，回去後要統一行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把敵人暴露出來，然後開展鬥爭。該死的交給群眾處理他們。民兵營長要帶

頭抓幾個壞人。《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就這樣，從軍人「領導小組」成立，五日之內，大屠殺的輿論、示範、組織工作全部就緒，地獄之門豁然敞開。轉瞬之間，紅色瘋狂席捲全縣，把賓陽民眾投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屠殺恐怖之中。王建勳講話之後，幾乎是立即——當日下午和次日，全縣到處召開萬人「殺人樣板會」，再次示範。其後，全縣一百七十二個大隊（小公社），隊隊狂抓亂殺。大屠殺進入高潮。

其間，一批公安幹部以「觀察員」身份遍佈全縣，監督基層屠殺，並每日上報殺人進度。縣、公社領導不斷打電話向「進度」較慢的單位施加壓力。到處都在狂叫：

「不要浪費子彈，要用拳頭、木棍、石頭！」
數以千計的無辜者被瘋狂毆打。

殺人狂潮（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

王建勳的屠殺動員令以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速度即刻傳遍全縣，沒有任何過程，屠殺立即進入高潮。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大橋區豐州公社黨支部書記黃某某召開領導班子會議佈置殺人。當晚把張維玉等五名「四類份子」批鬥後用木棍打死。次日黃某某再次組織動員將「四類份子」及「二十三種人」共三十人捆起，再兩人捆作一團，全部推入村邊極深的廢煤坑裏淹死。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新橋區革委主任張某某和區革委副主任章某某在新橋墟召開屠殺「

樣板」萬人大會，將林臣茂等十四人以捏造的「反共救國團」罪名全部用木棍打死。會後，章某某等還到數個公社監督殺人，並親自點名殺人計有林學光等八人。這一期間，新橋區共打死一百九十三人，自殺十八人。

次日（三十日），大橋區紅橋公社民兵營長彭某某與公社主任章某某召開會議，傳達縣、區民兵營長會議精神，然後，分組討論，當場「規劃」打死人名單。彭某某親自指揮將「規劃」中的三十三人綁到新街嶺，用刺刀、木棍、石頭全部打死。

是日（三十日），蘆墟區國太公社主任謝某某、副主任胡某某、謝某某被區革委主任覃某某批評「行動慢」。謝某某等三人立即召開會議，決定集中全部「四類份子」到公社集體屠殺。黃蘆片集中的二十人在送到公社的途中已被打死；其他各集中到馬蘭墟的三十二人除了幾人要取「口供」，或留下作「活教材」之外，當晚先用木棍後用槍，共打死二十四人。

是日（三十日），與王建勳和六九四九部隊直接關聯的事有兩件，其意義皆極其重大。一是王建勳本人給思隴區領導打電話，嚴詞批評思隴區領導殺人「動作太慢」，要他們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區武裝部長、區革委會副主任黃某某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制定出三條「緊急措施」。一、立即把王建勳的批評傳達各公社；二、檢討殺人慢的原因，如果下面不敢殺，把人交上來殺；三、區糾察隊、下鄉宣傳隊監督執行。八月三日，根據這個王建勳直接授意的「緊急措施」，區糾察隊負責人章某某指揮持槍糾察隊員十二人，將四個公社送來的三十四名一說三十七名「四類份子」於六進坪一次集體槍殺。

第二件事與王建勳副師長本人無關，卻與他的搭檔——六九四九部隊師長董永興有關。本

日(一說三十一日)新客鎮東風街主任謝某某帶一夥糾察隊到熊世倫家抄家。(一說將熊世倫打死後，懷疑家中藏有武器，方去抄家)熊家閉門不開，並擲出一土造手榴彈(未炸)。這夥只會屠殺毫無自衛能力的無辜者的殺手，被一顆自製手榴彈嚇得踟躕不前，只會猛烈射擊卻無膽衝入捕人。新寶派出所所長黃某某等到師部求援，要借四十枚手榴彈。董永興師長說：「不用了，我們部隊出兵，你們糾察隊配合。隨即六九四九部隊派出二個班的兵力，攜四挺機槍包圍熊家(一說四個排)。凌晨三時，發起衝鋒。董永興親臨前線指揮。手榴彈、步槍機槍一齊上，戰況極為壯觀。攻佔熊家後，人們發現熊家三口早已被打死，仔細搜查後，亦未發現任何槍枝武器。清晨，三位敢於自衛者的屍體被拖到南橋頭示眾。

三十一日，蘆墟區武裝部長賴某某到河田召開河田片幾個公社的幹部會，會上「規劃」了二十七人的「專政」名單。

會後，賴某某親自到德明、中興、深柳三公社督陣。組織指揮打死五十六人。中興公社舉行「批鬥大會」，「規劃」名單上的農民吳日生拒絕列會，並閉門執刀。賴某某聞訊大怒，提著手槍將吳日生押上門爭會。吳日生先被割掉耳朵，然後推下河去以亂石砸死。吳妻韋清才撲到丈夫身上，大哭道：「生同生，死同死！」大女兒吳來英(八歲)背著二弟(三歲)，拉著大弟六歲亦隨母親來到河邊，同赴父難。此案被當地百姓稱作「四屍五命六含冤」五命：吳妻尚有六個月身孕；六含冤：大女兒重傷昏迷未死，次日被人發現悄悄背走，含冤終生。

八月一日晨，原大橋區連朋公社治保主任宗某某率糾察隊員將十六個人五花大綁押到公路旁，用棍棒活活打死。此時，王建勳坐小車經過，特地下車觀看了現場。

八月一日上午，新賓區勒馬公社將全公社的「四類份子」和「二十三種人」集中關押，民兵營長韋XX召集幹部會議，決定遊鬥後全部打死。下午一時，武裝民兵押解這批「階級敵人」到新賓遊街，當街跪下，一次集體槍殺二十三人。一位陳姓女地主嚇得奪路逃走，被圍觀者用石頭當場砸死。

八月二日，黎塘區補塘公社民兵營長楊某某、支書侯某某等五人在公社辦公室召開緊急幹部會議，決定學習新賓經驗，把「四類份子」統統幹掉。緊接著又召開民兵排長以上幹部及糾察隊員會議，以村為單位，分工包乾，落實專政對象。當場，民兵營長楊某某點高嶺村十三人，並負責組織打死；公社主任呂某某點新阜村四人，民兵副營長張某某負責「落實」補基村七人；支書侯某某負責「落實」三擇村十三人；公社會議張點吊塘村二人。次日，楊某某與張某某指揮民兵和糾察隊，將以上「規劃」的三十七人押到北溝舊煤窖，排成一橫隊，行刑隊在後面，楊XX一個手勢，三十七人一同飲彈身亡，屍體全部投入煤窖深水中。

八月二日，大橋區豐州公社民兵營長黃某某在公社會議上傳達了王建勳的講話，會議決定將關押在公社的「四類份子」共二十七人全部幹掉。立即將他們用繩子捆綁拉到離會場三百米遠的一個水深十幾米的廢煤坑旁，強迫後者推前者往下跳，實在不敢推，幹部民兵才動手。

有一位船家婦女會水，落水後遊至坑邊，幹部、民兵使用石頭猛砸。一民兵用尖刀朝她胸部連刺數刀，鮮血頓時染紅了水面。被稱為「豐州煤坑慘案」。

直殺得兇手心虛膽寒（八月二日—六日）

殺戒一開，嗜血的魔鬼便再也收不回去。殺！殺！殺！瘋狂的人們憑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殺紅了眼，越殺越順手，越殺越刺激，越殺越酷虐！直殺到始作俑者王建勳也心虛膽寒之地步。

八月二日晚，賓陽縣革委會召開各區（鎮）革委正副主任、宣傳隊長緊急會議，王建勳開門見山，擬定了議題：「今晚會議要解決一個問題，即各區貫徹執行《七三佈告》的情況，做得好的要學習，不好的也要講。」

彙報上來，全縣十五個區、鎮，在短短的一周之內，已殺了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這個差三人即滿兩千的數字，終於把一直鼓動、督促殺人的王副師長嚇住了：「不要再殺了！殺得太多了！殺罪大惡極的得了！」為了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王建勳仍然堅定不移地宣稱：「我們猛烈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進攻，大方向是對的。向敵人專政是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如果對敵人專政手軟，就是國民黨的立場。」

所以「該殺的還得殺！」

這個所謂的「剎車會議」之後，各地仍然大殺。怕以後不易再亂殺人，許多地方還加快「進度」。如鄒墟同德公社八月三日傳達了會議精神，馬上打電話通知原訂的十八個「專政對象」，每個人自帶一根繩到公社集中。宣佈完「罪狀」，用受難者自帶的繩子綁起來，亂棍打死，投屍獨石江中。其中有位生產隊幹部覃采雲，正在田裏勞動，接通知後立即回家，衣沒換，水沒喝，拿了「語錄本」和一條繩子就走。被縛時，哀求公社幹部：「我沒有甚麼罪，請留我

一條命，做工養小孩！」已毫無憐憫之心的人們照樣用木棍將其痛毆致死。

直至八月六日，集體屠殺紅色風暴才止息。多年後，人們評價說：這個「剎車會」實際成了「動員會」。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們才第一次從官方文件上俯瞰到賓陽屠殺的全貌。據《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內部文件）披露，在貫徹「七三佈告」那短短的十一天裏（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六日）：

「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國家幹部五十一人，工人二十七人，集體職工七十五人，教師八十七人，農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一批打死的最多有三十四人，被槍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還有個別活埋，手段十分殘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十人都被打死；有一百七十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十四戶被斬草除根，全家滅絕。一家被殺害兩人以上的有一百九十戶，四百三十五人。」

在賓陽聽當事人說殺人現場情景

一九八六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站在賓陽縣城中心打量這塊曾經浸浴在血泊中的土地，不禁感慨萬端。街市繁榮，燈火輝煌，叫賣之聲不絕於耳……那末，連交通都為之阻絕的一片屍體呢？那用石灰掩蓋不盡的滿街鮮血呢？今日之繁榮，將十八年前血腥覆蓋了，往事變得無法

理解。數字與簡單過程只能勾勒事件之輪廓，我想瞭解人：狂暴的人、絕望的人、被殺的人、殺人的；被煽動被裏脅的人……我想，只有瞭解了人，人的思想與情緒，那看來無法理解的大瘋狂才能得到起碼的解釋。

除了談話和看案卷，我採訪了幾位人物。

賓陽縣法院王院長：我認為殺人風是無法的概念，以「革命」取代一切。毛主席講：「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當時全國上下，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只記得一位縣裏派駐公社的宣傳隊長在村裏說一句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但也不是全部殺掉。」說是亂打死人，實際上也不是全沒有標準。事後，法院判了五十二人，僅四人屬於挾嫌報復。農村挾嫌報復，宗族矛盾多些，但殺人名單到公社審批時，還是按當時原則辦事的。

紅衛兵黃某某，一九四七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十月在縣委操縱下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黃某某親自參與殺害四位老師事件，用手槍執刑。參與殺害九名武鬥戰俘。

在押犯盧某某，老初二畢業生，曾將一位被害青年屍體剖腹解恨。特地將他從看守所提到一個專供談話的小屋裏。談笑自若，似無愧疚之情。

黃、盧二人談的皆殺人現場的一般情況，綜述如下：

「批鬥會」一般在街上，每家必須去人。按名單把要打死的人推到前面，一一宣佈「罪狀」。「罪狀」一般十分簡略：某某右派；某反動學術權威；某某投機倒把份子……然後背誦一段「最高指示」〔法律依據〕：「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然後高聲煽動群眾：「對這些牛鬼蛇神，大家說，怎麼辦？」在場的者皆大呼「幹掉！」「殺！」於是一擁而上，亂棍打死。局

面從未失控，無當場亂點名打死的，全按名單來。場面混而不亂，雖是亂打群毆，但不會傷其他人，被打死的人與群眾之間，保持一段距離，分得很清。

一般群眾也參與打人，打幾下就下不了手了。較殘忍的有這樣幾類人：光棍、舊軍隊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資派」、對立派的「反戈一擊者」，還有各種諸如，害怕如不努力表現而殺到自己頭上的人。從年齡上看以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居多，十四、五歲也不少。

群眾下不了手時，便逼「四類份子」動手，人都處死之後，再把動手的「四類份子」打死。收屍掩埋也是「四類份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不少「四類份子」自知難逃一死，只好自盡。

在縣城裏，蒙難者一般並不綁縛，因他們無處可逃，亦毫無生望。一聽傳喚，便老老實實的踏上死亡之途。不叫罵，不求饒，不分辯，表情冷漠，毫無反抗意識，跪地上任人痛打至死。若被打倒，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

絕望！深入骨髓的絕望！

殺人狂潮中籠罩賓陽縣的恐怖與絕望

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被納粹軍隊集體屠殺的猶太人也表現出類似的絕望。在戰爭結束後的大審判裏，當年的目擊者向法院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人們全身赤裸，一絲不掛地走到已填滿死者的萬人坑裏。劊子手殺得累了，在坑邊抽菸稍息。即將被處決的人都利用這最後的時間同親人們擁抱告別。有的孩子不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於是父親便親切地向孩子解釋

，並舉手指向孩子示意天上那個最後的歸宿。然後，躺在屍體上，等候屠手們走過來射殺……這證詞令法庭大為震撼！我猜想，這震撼正是在劫難逃的絕望！

在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的「文革」大屠殺中，入了「另冊」的人絕少有逃出升天的。「革命」像風暴，像瘟疫一樣籠罩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你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沒有「路條」，沒有軒昂的革命氣宇，滿臉掛著恐怖與驚惶，你究竟能逃往何方？無處可逃亦無人逃的絕望，寫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殘暴的一頁。

在這種令我們的後人無法想像的絕望之中，人們紛紛自殺。其中，死得最為艱巨者該算是新賓鎮的黃應基了。在弟弟黃寧寧被活活勒死，弟弟黃朝基被打死，妻子羅淑賢鬥打投環自盡之後，黃應基悲憤欲絕，走投無路，當即撞牆尋死；未果，又以斧自劈頭部；仍不死，最後懸樑上吊，總算達到了目的。當時氣氛之恐怖，不僅無人敢收屍，連家屬亦不敢一哭。武陵鄉一女哭夫，背上揹的幼子被扯下來扔在地上，用鐵鎚鎚死。一女哭夫，說同情階級敵人，下批便將其打死。屠殺之初，無人害怕，連看熱鬧的孩子都不知道怕。直到後來屍橫街道，汽車停駛，將桂南這一重要公路樞紐交通斷絕，直到縣城所在地蘆墟（廣西歷史上著名的四大名鎮之一）汪起了血泊，人們才懂得了害怕。一入夜，縣城中心行人絕跡。殺人的，被殺的，目擊的，家家關門閉戶，毛骨悚然。一種巨大的恐怖如天羅地網罩住了賓陽民眾，無人得以逃脫！

數日採訪，一幅又一幅當年的圖畫在我眼前浮凸出來，我逐漸大致瞭解了瘋狂中的賓陽人，於是賓陽大屠殺逐漸變得可以理解。不禁想起文革之初的北京「紅八月」，何其相似乃爾！都是毛澤東之煽動，都是當權者支援，都是執法者協助，都是泰山壓頂之勢向「階級敵人」實

行「群眾專政」，都是數日之內即令被害者精神崩潰，喪失一切反抗意識，都是為時短暫但瘋狂至極，都是開始「發動群眾」……後來自己已被殺人狂潮嚇住，出面「講政策」、「急剎車」以求洗刷罪責，等等……「紅太陽」身邊可以有「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邊陲之地何不可有賓陽大屠殺！

然而，理解決不等於原諒。這次賓陽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屠殺，使賓陽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在廣西名列榜首！抗戰時期，全縣被日軍殺害的群眾三百餘人。那是民族戰爭。中共建政之初，「剿匪」鎮壓三百餘人。那是拿槍的敵人。何以在和平日子裏，眨眼之間將十三倍於戰亂死亡者的人民私刑處死？

賓陽屠殺整整十五年之後，一九八三年，賓陽縣黨政當局對文革期間被無辜殺害和迫害致死的三千九百五十一人全部平反昭雪，並以縣政府名義給死者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

不知道一紙「通知」是否可以撫慰那慘死的數千亡魂？

頭號劊子手王建勳殺人升官，至今逍遙法外

甚為遺憾的是：依據共產黨以政策代替法律的非法之法（對廣西當局三令五申：歷史問題宜寬不宜嚴，宜粗不宜細），對文革時的殺人犯全縣僅判刑五十四人。查閱案卷時，我隨手記下三例：其一，原公社武裝部長賴某某，組織殺害五十四人，有期徒刑八年。其二，黃某某，原大橋區豐州公社黨支書，組織殺害三十三人，有期徒刑七年。其三，莫某某，原縣宣傳隊駐鄒墟區同禮公社工作組負責人，刑訊逼供，製造八十三人的「反共救國軍」假案，僅倖存十餘人；

並親自組織、指揮殺人若干，有期徒刑十五年。算起來，平均每殺害七十人，才判處一人有期徒刑。全縣判刑的五十六人之中，僅一人死刑。也就是說，一命抵三千九百五十一命。這簡直是對社會正義與法律的嘲弄！

量刑如此之輕已令人咋舌。然而，更令人驚詫莫名的是：被法辦者紛紛大呼冤屈！難道這不算寬大無邊嗎？不是，因為賓陽大屠殺之首犯，那位六九四九部隊的副師長王建勳被軍隊包庇至今。被判刑的兇手們申辯道：若不是王建勳煽風點火，打氣督戰，我們也不會殺那麼多人，落到今天這步田地。於是紛紛主動上交當年的筆記本，電話記錄，會議記錄，王建勳一手製造賓陽血案鐵證如山！

賓陽縣紀委書記李增明神情凝重地遞給我一份列印文件：《關於王建勳策劃、指揮殺人的犯罪事實》，文後落款為「中共賓陽縣委員會」。我立即感到事有超出常規：依照慣例，此類公事理當由職能部門出面辦理。一反常規，由黨委親自出馬，顯然表達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情感與決心。果然，這是一份行文極為克制，卻字裏行間噴發著怨憤之火的起訴書。出自對上俯首貼耳的基層黨委，在近四千條血債面前，在嘲弄輕蔑面前，終於起而抗爭了。口氣儘量和緩，但時間、地點、罪行、人證、物證、個別案例、全縣統計毫不含糊，字字如板上釘釘。在陳述了全部犯罪事實之後，這份長達二十八頁的文件以肯定的語氣宣稱：

以上的大量事實充分證明，王建勳就是我縣出現亂殺人這一慘案的首犯。殺人數量多、手段殘忍、民憤極大。我們認為該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最後，一反向上行文的謙恭，毫不妥協地提出要求：

我們意見：應逮捕法辦，從嚴懲處，以平民憤。

中共賓陽縣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兇手們的冤聲，賓陽縣委的抗議，究竟從何而來呢？——賓陽大屠殺之首犯王建勳至今逍遙法外。這位親自策劃、組織並指揮了大屠殺，雙手沾滿了賓陽民眾鮮血的劊子手，反而步步高升，官至廣州警備區第一副司令，最後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幹休所的深宅大院裏安度晚年。

——為何量刑如此之輕，甚至給首犯以安撫庇護？

——「自己人」！這些對無辜百姓大下殺手的劊子手們是毛澤東、共產黨的「自己人」。他們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得到默許甚至直接秉承聖意。他們的失誤，最多是太熱情，太忠實，太瘋狂，把「好事」幹過頭了，把「經」念歪了。往屁股上拍兩巴掌也就是了。依照刑律坐牢、殺頭是萬萬不可的！否則，在需要瘋狗咬人之機，還有誰敢於效命呢？

當李增明書記遞給我《起訴書》時，我注意到文件簽發的日期是一年半之前。也就是說，在長達一年半之久的時間裏，賓陽縣親自出面的這一起訴狀仍無人受理。我感到這幾十頁紙張的沉重。我不敢抬眸去承接李增明那探詢的目光。在一個毫無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度，我一介書生，毫無回天之力。我只有真實地記錄下這些可怕的事實，留給時間，留給我們的後人。

總有一天，他們會審判這殘暴的一切。

數十年的屠殺還在繼續

每當提筆寫這種文章，我的心就流淚。

每當想起我們中國人的奴性與忘性，我的淚水只能往肚裏流。

我知道，有不少的人會在心裏不以為然：總翻老賬有甚麼意思！今天大陸不是挺好的嗎！還要殺到甚麼程度我們中國人才能猛醒呢？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的年代裏，還滿意殺夠嗎？血流漂杵的內戰不去說它了，雙方都有槍。那麼中共建政之初的「肅反」、「鎮反」呢？「反右」呢？「大躍進」造成的四千萬人餓死的人為大饑饉呢？還有「治世之亂」的「文革」呢？漸行漸遠，都不去說他了。「六四」呢，也過去五年了，也淡了忘了。忘了就好了。忘卻了曳光彈織成的火網，那些火，那些在自己身邊倒下的青年，忘卻了日夜守候在電視機前以淚洗面的日子，在自己的車上貼的抗議暴政的中英文標語，那些堅貞的誓言……忘了就好了。心靈就會平靜，行動就會自由，一笑泯恩仇。

在這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屠殺面前，在這永遠也流不盡的鮮血面前，我們這些苟活下來的人，我們這些奴顏媚骨的人，我們這些善於遺忘，善於盡釋前嫌的人應該感到羞恥。

由於利益所在，由於知情有限和寸光鼠視，由於精神枷鎖，更由於奴性與忘性，我們往往寬容暴行。歷史沒有這些局限和人性的弱點，因此歷史是無情的。我們的後人會記下我們今天的奮鬥，同時也會記下我們在暴政面前趨炎附勢、奴顏媚骨的恥辱。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於普林斯頓

原載《中國之春》第一三三期

鄭義，中國作家，有《老井》、《楓》、《紅色紀念碑》、《神樹》等著作，現旅居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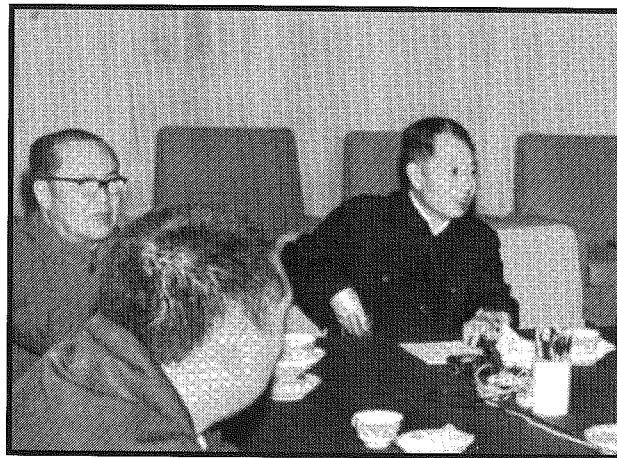
韋國清剿殺四二二派

◎ 徐勇

軍隊與保守派聯手武裝鎮壓



● 韋國清（上下圖左）是剿殺廣西422派的元兇，因為支持鄧小平復出，受鄧底護，文革後又成為中南海紅人，位於華國鋒（上中）胡耀邦（下右）左右。



在

文化大革命中，地處南陲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全國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與其他省的受害者大多死於文革中的種種冤假錯案不同，廣西的無辜群眾大都死於由軍隊直接指揮參與的大屠殺中，而且時間都是在1968年全省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政權機構成立以後。據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調查組來「落實政策」時民間所作的非常粗略的統計，1968年7月以後，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以「貫徹執行《七三佈告》」為名，調動軍隊，武裝一派，在全國範圍內武裝剿殺反對派，加上他們利用「清理階級隊伍」、挖掘「反共救國團」、「對階級敵人颶十二級颶風」等等名義對反對派和所謂「階級敵人」的殺戮，共殺了近十萬人之多！

這種屠殺，不僅在於軍隊動用了最先進的機槍大炮，還在於滅絕人性的殘忍。文革中人吃人的慘劇，就發生在廣西軍隊對反對派群眾的武裝剿殺中。據八十年代中共的內部文件顯示，僅武宣縣一地，在廣西當權者們颶起的所謂的「十八級颶風」中，被吃掉的「階級敵人」及其子女就有一百數十人。被殺者達五百二十六人。（《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共武宣縣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九八七年五月）據八十年代去實地調查的作家鄭義報導：「吃人之風遍及廣西，許多地方與武宣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過武宣」，《紅色紀念碑》，台北，華視文化公司，一九九三年，97頁）。

為了斬盡殺絕反對派，在廣西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默許和暗示下，邕江上游故意開閘泄水，活活淹死最後堅守在南寧地下人防工程中的三千多名反對派。所有這些，都和一個人有關，他就是號稱為「廣西王」的中共領導人韋國清。經歷過文革的廣西人談到韋國清，常常用「血

債累累」一言以蔽之。但從八十年代初起，中共中央多次派調查組去廣西調查這些大血案，每次都為它們的殘忍性震驚不已，最後都因為韋國清的關係，雖然給「反共救國團」平了反，但在追查責任的處理上都以一筆糊塗帳不了了之。

「廣西王」韋國清和廣西文革中的兩大派：聯指與四二二

韋國清，壯族（一九六五年僅族正武改稱壯族），原紅七軍的老幹部，參加過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他的最主要功績，是在中共五十年代「輸出革命」時，帶領一個龐大的軍事顧問團，幫助胡志明打勝越南奠邊府戰役，建立北越的紅色政權。一九五五年韋國清被授予上將軍銜，並任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一九五八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後，一直擔任自治區主席和第一書記。文革一開始，當上了廣西文革領導小組組長，一九六八年又任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他大概是文革中唯一的從未下過台，也未靠邊站的省委第一書記。文革後歷經華國鋒、胡耀邦時期，韋國清非但沒有下台，還官升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員長等職。是個地地道道的「廣西王」。

韋國清之所以能穩住他「廣西王」的位置，與他對毛澤東、鄧小平的竭盡忠誠、百般獻媚分不開。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期間，毛澤東幾乎每年冬天要到南寧來休息冬泳，韋國清深諳為官之道，動用公款為毛專門修建了兩座大花園：河東的明園和河西的西園。毛為此稱韋國清為「我的廣西老朋友」，在文革中一再保他。因為他又是鄧小平紅七軍時期的老部下，華國鋒時期他力主鄧小平復出，更是保鄧有功，被鄧小平視為知交，一直官運亨通。

文革開始，由於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援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這一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而以大中學校學生和另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反韋國清的「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因為這一派大都是一般群眾和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一直被軍隊看成為「牛鬼蛇神總司令部」。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援過「四二二」。但不久他們在全國逐步掌握了權力，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的文革派拋棄。

韋國清和廣西軍區對四二二派恨入骨髓，但是一直沒有機會下手。中央文革小組對「四二二」的日益疏遠和拋棄給了他們下手的機會。然而，要屠殺，必須有名正言順的的殺戮藉口。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春，他們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製造屠殺的合法藉口的工作。

製造「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冤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報告，報告說：我們在廣西「破獲了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六十三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

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廣西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在向上謊報軍情的同時，韋國清等人開始向下達了不惜代價製造假案的指示。在以韋國清為首的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給全區各級革委會的指示的題目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中說：「我區破獲的『反團』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僅涉及面廣，且敵人鑽進群眾組織利用派性發展串連……當前該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證、集中主犯、追組織、追聯繫。」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還發佈了關於破獲「反團」的公告。公告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份子，混入了群眾組織中，有的當了群眾組織的頭頭，打著造反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其組織。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指」派的自稱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

所謂的「反團」案雖然到了一九八三年已得到徹底平反，證明是個荒謬透頂的冤假錯案，但它當時給廣西人民帶來的災難，卻令人髮指。

所謂的「反團」案一公佈，許許多多不同觀點的平民百姓就成了他們消滅的「階級敵人」。至於「罪證」，「莫須有」便是，讓我們翻開當時廣西革籌、廣西軍區主辦的《廣西日報》，看一看韋國清等人給當時的自治區「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

其實是省委一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所定的罪行，不難看出，那些所謂的「正確路線代表」所採用的正是極其卑鄙的流氓手段而已。例如，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廣西日報》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裡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是沒有任何證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在歡呼「七三佈告」的大會上，當時的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發表講話說：「根據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兵小將揭發，謝王崗、袁家柯是三反份子、走資派……」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廣西軍區、革籌小組在向中央報告攻打「四二二」據點的理由時，把自己指揮解放軍用大炮炮擊解放路、民生路、上國街、博愛街等引起民房起火，說成是「四二二」縱火焚燒居民房屋。因此，為了制止「階級敵人」製造更大規模的縱火事件，我們派解放軍對「階級敵人」採取了強制措施……

南寧作為廣西首府，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是當時廣西的權力機關，他們及其在南寧的軍隊領導人，尚且如此製造「敵人」。下面各地區、縣以至農村中的效法者，其手段和辦法就更加難以形容了。

南寧警備司令部發出通緝令抓的「反團」骨幹，都是「四二二」派的，南寧市三千五百四十七人被列為「反團」份子，全是「四二二」觀點的群眾。

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團」的有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廳級幹部一人，縣級幹部二十三人。百色地區僅僅那坡縣一個縣就逼出「反團」四十名「團長」。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與「反團」有關，迫害致死。全縣一天打死三百三十八人。

整個河池地區被打逼致死七千八百六十四人。

欽州地區七個縣市打死、逼死、失蹤人數達一萬零四百二十人。

在柳州地區柳江縣，打死了所謂「反團」份子以後，還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挂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僅防城縣一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六人，被迫自殺十七人（救活十三人），暗殺三人，外逃一人，重傷二十一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6頁）。

據今天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武鳴縣的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錘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四十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武鳴縣「自開聲討人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約兩千五百人，其中「農村居民二千一百七十六人。」而非正式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部份親屬一千八百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30—32頁）。

另外，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很大部份是華僑，因華僑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員，受到武裝部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一千三百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縣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抓捕七十四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一個「反共救國團武鳴華僑農場支隊」，並宣佈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一千三百三十七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二百二十一人被抓捕，二百零二人被關押，一百六十二人被吊打，一百零七人被打逼死。三百四十一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四二二」，派了一個連去縣武裝部，不得不繳了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

再據今天官方的《容縣誌》記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七百三十八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6頁）。

看著這些鮮血寫成的數字，真令人不寒而慄。但這只是一些主要的抽象數字。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有多少和睦的家庭頃刻間被滅門，有多少美好的生命瞬間被毀滅啊！

在當時，「反團」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呢？下面的悲劇很能說明其奧妙所在。

一天，一個中學幾百名師生集合在一起開大會，大會標題是「堅決鎮壓反革命鬥爭大會」。大會開始，一位老教師被虎視眈眈的「紅衛兵」押上台前，主持開會的「工宣隊」負責人宣佈：「今天我們開大會，鬥爭我們學校的反革命份子，這些反革命集團，有組織、有綱領，他

們擁護劉少奇、鄧小平為領袖，要反共復國……」接著要「反革命份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教師臉色浮腫，走動困難，他慢慢攤開講稿，一字一句的交待起了「罪行」，他說他參加了「反動組織」，在本校還有同一派的學生×××、×××也參加了這個「反動組織」，當他一唸到此時，他所唸到的這十幾個學生也在學生隊伍之中，一下子被「路線覺悟高」的另一些學生馬上用繩子綁了起來，一起推到主席台前。大家一看原來都熟悉，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謂的「反革命反動組織」的證據呢？沒有。當天，這十幾個才十三、四歲的「反革命」馬上被分別關押起來。深夜，各種「偵破專案組」出動，把「反革命」雙手吊到教室的樑上，索要「反動組織」的「名單」、「印證」等。這些「反革命」開始並不害怕，以為他們沒有證據，瞎說能定個死罪嗎？誰知道，「專案組」晚上「審訊」時，先問：「你是不是反動組織成員？」「不知道！」「不是！」馬上拉起繩子，一陣拳打腳踢，盡往死裏打。有的用鐵鉗挾被打的學生，用竹子、鐵釘釘學生的手指，把人吊到離地一米多高又突然鬆開繩子使人跌下來，直到昏死過去。不用兩天功夫，這些學生就「老老實實」地交待「自己是反動組織成員」了。但是不管怎麼打，直到逼死三人，還是沒有甚麼物證。怎麼辦？「反革命組織」已經講出去了，證據卻沒有。人是打了，逼了，死了，證據卻只是「莫須有」。

既然你逼人家成「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證據，那為甚麼光我們是「反革命」，而你們不可以是呢？後來這十幾個學生受到了「啟發」，幾個被打的人暗裏通氣，向「工宣隊」交待罪惡「時把「聯指」派打人，踢人很兇的那幾位「革命派」也聯名「交待」，「他們也是我們發展的反動組織成員，而且是骨幹份子，為了殺人滅口，妄圖消滅罪證，他們想把我們打死，其實

他們早被我們發展成為聯指組織中的「反團」成員……

這一招果然厲害，「工宣隊」吃驚不小。是啊，殺人滅口可是階級敵人的一貫手法，階級鬥爭是很複雜的……不成，不能讓這些人當「專案組」。不久「專案組」打人兇手被調開，「反革命」才得以減少了一些皮肉之苦。但是「文化革命」不結束，「四人幫」不倒台，他們精神上的創傷永遠無法去掉。

十幾歲的小孩就這樣無緣無故地也被逼成「反團」成員，聯繫到幾十歲的人，聯繫到在農村的人們，只要稍有一點觀點與他們不同，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被打成「反團」，而後槍殺、活埋、用木棍活活打死，就更不知其數了。

軍隊直接出面指揮的全省大屠殺

紅色絞肉機在一九六八年的廣西隆隆開動，製造出了成千上萬的「反革命」、「敵人」。「階級敵人」越來越多，「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怎麼辦？殺！由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明裏暗裏地指示組織，由各地駐軍、武裝部、革委會具體施行，先在農村各地以「對階級敵人颶十二級颶風」的名義殺人！靈山縣被打死三千二百多人，都安縣被打死四百四十一人，百色地區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三人，開鳴縣被打死六百九十八人，上林縣被打死和迫害死一千九百零六人，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死八百五十人，其中以「清隊」名義私刑處死六百零三人；河池地區被打死七千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使「階級敵人」聞風喪膽」。據今天大大縮水了的官方縣志記載，文革中廣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尤其是一九六八年韋國清等人下令的對反對派「四二二」的「颶十二級颱風」中的死者遠遠高於其它各省。下面是一些隨手拈來的記載：

廣西貴港市（原名貴縣），一九六八年四月，縣革委會支持成立「所謂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對另一派群眾進行鎮壓。調動了除木格以外的各區民兵一千人進城。四月十五日，開始圍攻少數派據點，並連續十天搜捕了數百名少數派群眾。在此期間，被保紅指揮部打死殺死、迫害致死的共二百三十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捲全縣。據統計，受這一場「十二級颱風」的影響，全縣五月份有二千一百二十九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8頁）。

廣西天等縣，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至十七日開了「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大會，「大會期間及大會後，各社、隊普遍出現亂殺人的事件。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的一千六百五十一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0頁）。

廣西博白縣，「在貫徹『七三佈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九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三百三十七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08頁）。

廣西合浦縣，「二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颶起了一股亂殺人的歪風，至五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的九百六十一人」（《全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8頁）。

廣西扶綏縣，「七月下旬至八月初，落實中共中央『七三佈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份子』、『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9頁）。

廣西平果縣在「颶十級颱風」中，「全縣被亂殺的七百一十五人，被迫害致死的二百一十六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401頁）。

廣西橫縣，亂打亂殺中，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5頁）。

廣西陽朔縣，「全縣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6頁）。

廣西羅成么佬族自治縣，「六月十五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的誓師大會』，（亦稱萬人對敵鬥爭大會）。有縣、區、公社、生產隊幹部八千九百九十八人參加，錯誤批鬥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死五十九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使全縣一千三百八十九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么佬族自治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0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常死亡人數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廣西文革中共有大約七十三個縣（市），僅此官方大大縮小的統計，以平均每縣（市）被殺七百到一千人計算，便有至少六到八萬人被無辜屠殺！

當時的《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對階級敵人就是要鎮壓》（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社論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別有用心地說甚麼「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是迫害造反派，他們是甚麼「造反派」？根據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證明，他們或是走資派、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或是土匪和國民黨，或是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這些「階級敵人」在農村待不下去，紛紛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行動起來，把「階級敵人」投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於是廣西由軍隊直接出面的全省範圍的剿殺反對派的一系列戰役開始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廣西駐軍的八個連的解放軍戰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五月一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四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四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被打死和逼死的有一百零八人。一九八〇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調查組，對曾被認為是「階級敵人十惡不赦的罪證」進行調查，結果，除了派性以外，根本沒有甚麼「製定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的東西。人們根本無法理解他們把這麼多人判處死刑的證據是甚麼。

五月二十二日，廣西軍區政治部印發《關於鳳山縣武鬥情況的調查報告》中說：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黑線串到鳳山，與叛徒、右派、下台幹部、走資派等挑起武鬥，加上牛鬼蛇神的階級報復，南寧「工總」、德保「走資派」、車蘭縣的「走資派」來過鳳山「活動」，還有香港特務也來過鳳山。因此，他們廣西軍區和廣州軍區活學活用的先進單位——鳳山縣被廣西黨

內走資派「極端仇視」，「那裡的一小撮階級敵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現，狂叫甚麼：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同志，我們一千個不同意！一萬個不同意！」他們還狂叫「劉少奇萬歲！」有的甚至常寫信給鄧小平，要求翻案。請看階級敵人跳得多麼高，這種階級敵人就是挑動武鬥的禍首，因此，對他們要採取「強硬措施」。

六月一日，原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廣西常委、國務院僑委副主任）被區人委辦公廳「革命領導小組」遊鬥，並把他押上街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眾和毒打，然後使之跪在烈日之下，結果李在回家之後神志不清，再加上被趕出家門，當邕江河水洶湧而至的時候，李被大水活活淹死。

悲劇一個接一個地發生。桂林武鬥嚴重，柳州武鬥嚴重，還有武宣縣、上林縣……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發佈「七三佈告」，韋國清以捍衛七三佈告為名，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作階級敵人，發動武裝圍剿，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

七月五日，區革籌負責人召見兩派群眾組織的常委，宣讀傳達「七三佈告」，佈告說，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蒙蔽和欺騙一部份群眾，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為迅速制止這一小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支援下，努力實現以下幾點：停止武鬥，保證運輸暢通，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交回搶去的解放軍裝備，依法懲辦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等現行反革命份子。

七月十一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三萬人大會歡呼「七三佈告」的公佈，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佈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隨後幾天，廣西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論，如《堅決執行，誓死捍衛》、《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對階級敵人就是要鎮壓》等。駐桂空軍派飛機在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賀縣、融安等市縣以及鐵路沿線大量散發「七三佈告」。所有的口徑都是「四二二」是違反「七三佈告」的「階級敵人」，除此以外，沒有別人去搶解放軍的裝備，沒有別人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這些現行反革命都是在「四二二」那裡，必須堅決「鎮壓」。

臨桂縣革委會委員胥××，是臨桂縣「聯指」派頭頭。在「七三」佈告下達後，他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十九名縣區幹部。胥某親手殺死三人。一九七一年九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乾乾淨淨，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一九八四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胥犯，但有的人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其實當時是完全顛倒，這種情況的出現根本不足為奇了。

八月二十四日，柳州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郊的「聯指」武裝人員聯合攻打柳江縣福塘的「四二二」據點，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共耗費現金十萬四千多元，糧食五萬多斤。

在賓陽縣，全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人。在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勳（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副主任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揮下，自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時間裏，打

死所謂的「階級敵人」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國家幹部五十一人，教師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體工七十五人，農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致使一百七十六戶全家滅絕。

解放軍與聯指武裝炮擊南寧鬧市區達二十三天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門衛森嚴。在會議室裡，軍區的幾位要人正在醞釀著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研究如何武裝消滅全省反對派的「戰略戰術」問題。廣西軍區調六個連的兵力，這是他們的打算。南寧「聯指」的近萬武裝，還不夠，怎麼辦？有的認為還要調各個縣的「聯指」入城。經過反復研究，決定調武鳴、橫縣、邕甯、馬山、崇左、上林、玉林、陸川、貴縣九個縣的「聯指」力量，並劃定兵力部署的位置。

「四二二」的部份群眾，見到解放軍參加攻打，就趕快「反戈一擊」，宣佈改變觀點，有的開始對「反團」一案不怎麼相信，但是看到「解放軍」也這麼說，不禁懷疑起自己身邊的人，是不是就是「反團」？輿論壓力導致許多令人不堪回首的事發生。八月四日，「四二二」指揮部保衛處的武裝人員，對南寧警備司令部通緝的所謂「反團」的首要份子陳××、覃××、潘××、唐××、陸××、白××，開始不相信，但輿論壓力所致，他們不得不把這六個人抓了起來「開庭」。「審判」結果，宣判六人死刑，立即執行。當把犯人押出刑場時，「犯人」喊冤不止，但是，在「階級鬥爭」激烈動蕩的年代，誰敢理會他們的聲音？

可是，這種自相殘殺並沒有使軍隊對「四二二」群眾的剿殺計劃停止半步。七月五日，「七三佈告」頒佈，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在南寧開三萬人大會後，各地區、縣馬上紛紛效仿。全

區有三百萬人參加了熱烈歡呼的大會，紛紛行動起來抓「壞人」，各地亂捕亂殺的現象加劇，各地被打死、殺死的人數比佈告公佈之前增加了幾倍。有的地方對「四類份子」全家殺絕，有的對不同觀點的群眾搞所謂「批鬥」，被吊打、逼供、活埋、槍殺的不計其數，滔滔邕江河，每天都有屍體在上面漂浮……

接著各地的「聯指」紛紛到了南寧，準備消滅廣西的最後一批壞人。人們看到，在廣西軍區獨立師的指揮參與下，江南的大炮在移動，火車站也調來大炮，炮口對著「四二二」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展覽館。七月的太陽像火一樣滾燙，炮手們一遍又一遍地擦著炮彈，他們已經等不及了，紛紛請求允許開炮，人們根本分不清誰是解放軍誰是聯指的武裝人員……

七月八日，天空晴朗，當太陽升得竹桿高的時候，人們看到天邊出現兩個白色的東西，漸漸地，轟轟的響聲越來越近，飛得也越來越低，「隨著飛機飛過，人們看到飛機的尾部紛紛揚揚地飄出許多傳單，白點越飛越遠，傳單越飄越低，」人們好奇地奔跑過去，爭著，搶著，都一睹為快。但是當人們拿到手裡一看，不同的派別，心情各不一樣。「聯指」群眾看了，認為這「七三佈告」是表揚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四二二」群眾看了，卻感到壓力很大。為甚麼這幾天從《廣西日報》到軍區領導，都講「七三佈告」是鎮壓「階級敵人」的銳利武器，而且全區各地正在紛紛鎮壓「階級敵人」。

七月十五日清晨，邕江南北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聲音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處在中華路的水塔仿佛看到和聽到甚麼……

中午十二時，隨著「最最強烈的抗議」的吼聲，「聯指」歷數「四二二」的「罪狀」之後說：今天「四二二」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居然開槍打死我參加遊行慶祝「七三佈告」發表的革命群眾多人，「這是階級敵人對抗中央『七三佈告』和破壞『七一五』大會的反革命事件，我們要給予堅決的反擊，徹底清算『四二二』一小撮反革命的罪行……」

隨即，反對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的炮轟，一朵朵煙雲從解放路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像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廣西軍區和「聯指」的六〇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這是南寧市舊城的主要街道，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主人，據當時當權的人說是「階級成份特別複雜」，這裏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是「特務、牛鬼蛇神的聚居點。」在「炮轟」中被夷為平地。

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解放雖已二十多年，他們賴以棲身的仍是這些小瓦房。今天，他們剛剛吃過午飯，準備走到街頭巷尾聽聽一天來使人聽過而後怕的消息，聽聽戰事究竟何時結束。但是他們抬腳往門外一邁，隨即聽到「呼呼」的炮彈頭與空氣摩擦聲，還不及收回腳，屋上的瓦片已被氣浪震得粉碎，屋頂一下子升入半空，火像著了魔似的把房子劈劈叭叭地燃燒起來……

人們聽到除了轟轟的炮聲，接著是「噠噠噠噠！」的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衝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隨著這一陣轟炸，隨即被取消了「發言權」。南寧上空只剩下「聯指

之聲」廣播喇叭聲。廣播是這樣講的：「四二二」一小撮階級敵人，殺害了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製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十八點十五分至十九點三十分，解放路的土匪們竟敢向我敬愛的解放軍開槍開炮，把炮打到廣西軍區大院內，致使我解放軍多人傷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南寧市的居民一般都知道，從解放路到廣西軍區的桃源路，沒有現代的導彈是很難打到的，何況，解放路處在「聯指」、解放軍炮火的包圍之中。想不到這種破天荒的奇想，竟被廣西軍區當作「四二二」的罪狀報告了中央。

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下午，只聽「聯指」的高音喇叭又震耳欲聾地吼叫了。它說，「四二二」一小撮階級敵人，為了挑起更大規模的武鬥，正在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縱火破壞，燒毀大量民房、商店和船隻，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巨大損失，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七三佈告」貫徹落實的鐵證……當這些壞人燒毀民房時，我「聯指」戰士勇猛衝上前去救火，去搶救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卻遭到「四二二」據點的開槍射擊……請看階級敵人的面目多麼醜惡……

十六日，廣西軍區負責人召見廣西「聯指」常委，指示他們要「掩護群眾救火」。

十九日，南寧「警司」發佈告「立即行動起來，撲滅反革命份子製造的火災——給全市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一封信」。同時，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的報告中也說：「階級敵人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縱火破壞，燒毀大量民房、商店和船隻……還向中央呈上了《執行武裝掩護部隊、群眾救火的報告》。報告說：由於著火的地區都在新「四二二」的控制區域

，情況複雜，暗堡火力點很多，需要作周密準備。我們採取的措施是：一、組織了指揮所。二、抽調四個連執行武裝「掩護救火」任務。三、已發出了堅決迅速制止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縱火事件的呼籲，在全市反復廣播，開展政治攻勢，追捕緝拿反革命縱火犯及幕後策劃者。

二十一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二十七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〇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牆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司」的廣播和宣傳車卻還是說是「四二二」自己用炸藥包炸毀的。

七月二十七日，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司」和廣西「聯指」也同唱一個調，說的是「廣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犯下了「滔天罪惡」。

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七月三十一日十五時，對反對派佔據的展覽館發動武裝大圍剿開始。據官方一九九〇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記載：「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和南寧「聯指」武裝人員圍殲廣西「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參加圍殲的解放軍有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某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

玉林、陸川、貴縣、邕甯、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門隊。指揮所設在明園飯店，下午三時開始包圍炮擊。」（二二頁）經過一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八月一日八點，用去高射炮彈六九〇發，機關槍子彈一千多發，衝鋒槍、步槍子彈一七〇〇〇多發，終於解決戰鬥，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被消滅。「聯指」和部隊一邊開槍一邊朝裏面衝著，還一邊對已停止抵抗的反對派人員喝令舉起雙手，共抓獲「俘虜」四百七十三人，打死二十三人，部隊和「聯指」被打死六人，傷五十多人。

八月二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四二二』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

軍區某些負責人一邊檢討，一邊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部隊和南寧、武鳴、邕甯、橫縣、崇左、上林、馬山、玉林、貴縣、陸川等縣「聯指」武門人員大舉包圍「四二二」的解放路據點。整個反對派控制的十二條街道，被打成一片廢墟……

八月五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一千三百四十人，抓獲「俘虜」六百四十四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從被打死的人數，我們知道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戰後，「聯指」用翻斗車搬運死屍，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的有六百八十具，就近火化的有六百九十四具，在朝陽溝掩埋的七十五具，從解放路俘虜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五十二人，其中有一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二十六人慘遭軍隊槍殺。

據不完全统计，廣西軍區指揮「聯指」攻打解放路、展覽館據點，到八日為止打死一千四

百七十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先後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當陽小學、五里亭小學、南寧幼師、區交通學校、區、市看守所等。其中關在區看守所所有二百六十五人，區交通學校的七百一十一人，南寧幼師的四百四十一人。這些人都被列入了「殺人放火」、「四類份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共救國團」的「要犯」、「首犯」。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的有二千三百二十四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二百四十六人。南寧市解放路一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三十三條，各種房子二千八百二十座（間），建築面積四十六萬平方米，使街道的五個分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國家財產損失價值六千萬元以上（同上，第二五—二六頁）。

水淹南寧地下人防工程，數千「四二二」成員全軍覆沒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八日，對於廣西人民來說，是一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的發生日。

解放二十多年來，廣西在經濟建設上可謂一事無成。但在戰略公路和人防工程的修建上卻大出風頭。尤其是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曾被中央軍委表揚為全國典範。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四二二」近三千人（一說七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因為這一地下工程的先進性，軍隊和聯指一時無法攻入。

但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

案：打開邕江上游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自然也就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一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一個主要頭目去請示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和軍區政委韋國清時，有過一段極妙的對話。當時韋國清一聽來人對最後一戰的作戰方案的彙報，便佯作大怒：「你們混帳！我管不了你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泄洪，我更管不了那麼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一窩蜂，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懂不懂？國際鬥爭，世界革命美援越，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懂不懂？國際鬥爭，世界革命，懂不懂？你們那些屁事，我那有時間過問？」

雖然是面遭痛斥，但那位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一是事關數千人命的集體謀殺計劃在韋看來不過是「派性」，是微不足道的「雞巴臭事」。二是韋主任畫龍點睛般地說明了人為的大壩開閘，可以說是「泄洪」，即因為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的自燃現象，幾乎年年都這樣，不就沒有了任何殺人的責任了嗎？於是那位聯指頭目立刻命令控制了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通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七十四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還說，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一九五八年七十一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才能行走。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不得不從防空洞中爬出來投降。但又有不少當場被殺。至於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名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自然全部被活活溺死。堅守在地下

的反對派對軍區和聯指對他們斬盡殺絕的決心已經沒有懷疑，他們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人來救他們一命。他們拍過明碼電報，派人突圍上京緊急告狀。但曾經利用過他們的親愛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此不置一聲……

他們更蒙在鼓裡的是：韋國清指揮的廣西軍區對他們的軍事鎮壓，其實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為他們打開的「綠燈」的。在韋國清等人大動干戈之前，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五十分至六點十五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主要領導人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份同志和軍隊部份幹部，並對廣西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席接見並講話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這次講話後來被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會、革籌組或軍管會、支左部隊大量印發，成為所有群眾組織及幹部、群眾的必讀教材。它標誌了毛澤東及其文革派決定拋棄為他們在打倒劉少奇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造反派」，轉而依靠和組建軍人政權。

在這次接見中，所有中央首長講話都充滿對「四二二」派的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對四二二派完全形成群起而攻之，只準認罪不準抗辯的局面。他們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中央領導人對群眾組織代表講話中少有的。確實給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之感。當康生在講話中第一個點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區黨校教員）站起來時，首先就來了一個下馬威：「你這樣的黨校教員，毫無黨員氣味，你這樣的黨員，是代表甚麼黨？你是代表國民黨，是謝王崗的黨！」接著周恩來也說說：「你是『四二二』的嗎？」（朱答：『是』。）你代表哪個『四二二』？（朱答：現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現在在南寧放火的『四二二』嗎？」對四二二

派其他代表的逐一點名指責中，也大多是這種不容分辯的、扣大帽子的訓斥口吻。比如，講話中說到明明是廣西軍區導致的南寧鬧市大火時，有這麼一段訓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話：

吳法憲：南寧的火就是你們放的。

總理：房子燒了那麼多，就是你們四二二燒的。

吳法憲：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帶燒了一千多間房子，是不是你（指曹東峰）指揮的？

黃永勝：百貨大樓是你們佔的，火不是你們放的是誰放的？

周恩來等人更斷言「四二二」已經被所謂的「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所控制，實際上，「四二二」派已經被周恩來等人宣判為該誅該殺的反革命組織。

於是，曾被周恩來、中央文革捧為「響噹噹造反派」的「四二二」在廣西全軍覆沒。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一些禽畜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一具具屍體從上游漂來。香港、澳門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一時震動世界。廣西當時的當權者韋國清等人一聽，倒是立刻感到是揭了他們的「醜」，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到一屍，可以由公家報銷人民幣十元。

更多的屍體是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之中。自一九六八年起的很長時間內，儘管省市

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裏噴射福爾馬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一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更令人深省和深藏玄機的是那位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那個聯指頭頭×××的命運。因為民憤實在太大，他在一九七〇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神秘地死在獄中。他在公安廳工作的妻子明知這是殺人滅口，她丈夫做了韋國清等人的替死鬼，但此時喊冤，也已經太遲了！

官方文革大事年表載四萬七千名中共黨員參與殺人

消滅了省府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等人立刻馬不停蹄地對剩下的各地「殘餘份子」進行斬盡殺絕。八月十日，軍區首長命令：用解決南寧解放路的辦法解決鳳山反對派的問題。會後馬上調宜山、河池、巴馬等九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六九一一部隊、鳳山人武部中隊共三千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一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十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人！僅這一次圍剿，就槍殺了一千零一十六人，佔該縣整個文革中死亡人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七。被殺害的人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過遊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全縣八十六個大隊，八十一個大隊有人遭軍隊和「聯指」槍殺。「圍剿」勝利後的八月二十五日，鳳山縣革委會在血泊中宣告成立。

八月二十日，桂林的反對派也被消滅，被直接殺死的有三百四十五人。反對派參加桂林市

革委會的二十二個委員中，有十九人被關進監獄。在全自治區範圍內，軍隊和聯指共抓獲反對派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關押期間動用十五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

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八月十二日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二十六個所謂的「戰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作禽獸展覽，並組織了近五十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一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

接著，全區的反對派只剩下一些「殘匪」。例如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有的甚至帶槍跑入深山。軍隊故伎重演，假稱：下山交槍一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韋明景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十七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怒火萬丈，下令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一九六八年圍剿到一九八二年。

僅僅一九六八年開始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廣西被所謂的「紅色政權」——省革籌小組和軍區發動的軍事圍剿中殺害了近十萬人！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十萬無辜百姓的骸骨上宣告成立，韋國清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革委會主任，歐致富為副主任。

人們可能會問：在如此殘忍的殺戮中，直接動手殺人的兇手究竟是誰？在八十年代進行的復查中竟然發現：除了數萬軍隊奉命殺人外，最積極殺人的竟是共產黨員！據官方的統計：在整個廣西的大屠殺中，有四萬七千多共產黨員參加直接殺人。有官方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所載為證：「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二萬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九千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一萬九千多人。」（第132頁）這難道還不說明

問題嗎？

徐勇：廣西省作家和文革研究者。

解放軍血洗沙甸

◎馬萍

雲南回民村被趕盡殺絕

雲南省蒙自縣雞街沙甸村位置圖



北

京「六四」屠殺，舉世皆驚，人神共憤，其實，這只是中共血腥紀錄的一部份。中共利用軍隊屠殺中國人民不勝枚舉，發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沙甸村血案便是其中一例，其手段之殘忍，不下於北京屠殺，祇是由於地處偏僻，又加上中共的新聞封鎖，難為世人所知罷了。

從大躍進到文革派爭：沙甸回民與中共矛盾激化

沙甸是一個回族聚居的村落，屬雲南省蒙自縣雞街公社管轄，約一千餘戶，人口七、八千人。

沙甸回民篤信伊斯蘭教，性情耿直、剛悍，村民以種植蔬菜、烤菸為生，也有做小生意的傳統，如販牛、販菸、販賣蔬菜等。五十年代初，雲南為中共「解放」之後，沙甸亦隨之發生急遽的變化。由於中共殘暴的「害民」政策，使沙甸回民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因此和中共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化。

沙甸回民對中共最不滿的，首先表現在中共政府的農業政策上。沙甸也和大陸所有的農村一樣，經歷了土地所有制的變更過程，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以後，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國大陸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困難時期」。當時，毛澤東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當時政府為執行毛澤東這一政策，遂將沙甸生產隊由蔬菜隊改為糧食隊，改變沙甸回民的種植習慣。按照中共的政策，被劃為「蔬菜隊」的農村，中共在統一收購蔬菜的前提下，每年亦供應菜農一定數量的糧食；沙甸改為「糧食隊」後，供應的糧食當然也隨之斷絕，再加上糧食的收購價低，沙

甸回民又缺乏種植糧食的經驗，造成他們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在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困難時期，沙甸回民和大陸所有的農村一樣。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於是他們要當局尊重他們的種植習慣，從「糧食隊」改回「蔬菜隊」，但這一小小的要求，他們從五九年呼喊到七五年，不僅沒有達到，反而遭到壓制和報復。

令沙甸回民不滿的另一點是，他們提出了嚴懲「貪官」「污吏」的要求（這「貪官污吏」矛頭所指乃當年沙甸的一些中共黨幹，包括蒙自縣縣委書記和縣長）。他們提出這些幹部的「多吃多佔」、「侵吞公款」等問題，可是，這些貪官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長期受到庇護，反而一個個因為「階級立場堅定」而官運亨通。

除此之外，中共對沙甸回民傷害最大的，是強力壓制他們的宗教信仰。沙甸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有頗多的宗教儀式。但長期以來，中共派了工作組進駐該村，經常以耽誤生產為由，禁止其宗教儀式，如沙甸回民違令，便以「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予以打擊，輕者交付村民批鬥，重則由公安機關逮捕關押。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更是變本加厲，無法無天。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搗毀教堂，批判「阿訇」（回教宗教職業者），許多人被活活打死。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村，不僅遊鬥村民，還肆意焚毀穆罕默德像，將豬骨頭丟入水井內；在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甫成立之際，即在全省樹立了一個叫金桂仙的「先進」回民典型。此人為大反「宗教迷信」的闖將，鬥「阿訇」，砸教堂，並帶頭殺豬，由此當上了省革委會副主任。沙甸回民對他恨之入骨。

造成沙甸回民同中共當局矛盾激化的近因是派鬥。雲南的「造反組織」分為兩大派，一個

是「八派」（八二三派）；一個是「砲派」（砲兵團派）。雲南省革委會成立之時，宣佈「八派」是革命派，「砲派」是反革命派。於是，在雲南，凡是加入「砲派」的，不管是群眾還是頭頭，人人被鬥。沙甸回民是清一色的「砲派」，所以被稱為「砲窩子」。在批鬥「砲派」之初，很多「砲派」頭頭為了避風，潛躲沙甸。後來部隊包圍該村，限令交出「砲頭」。「砲頭」們投降後，部隊進村大肆抓人、打人，一片白色恐怖。

基於上述幾個原因，使沙甸回民與中共當局矛盾愈見加深。

回民代表上京：中央領導潑冷水，以平叛相威脅

一九七四年，中共上層又出現了新一波的權力鬥爭，康生、江青之流抓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上層的動作也反映到了民間。雲南立時又出現了兩大組織，一個是以原「八派」為主的「反復辟」，一個是以原「砲派」為主的「反潮流」。「反復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而「反潮流」則處於受壓地位。

沙甸回民自然都參加了「反潮流」。當地政府採取了極端措施，在雞街公社成立了「民兵指揮部」，由軍隊發槍，對沙甸形成包圍之勢。也就在同時，蒙自縣委再度派出工作組進駐沙甸，嚴令禁止一切宗教活動，並肆意捕人鬥人。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沙甸回民群情激憤，數度到蒙自縣革委會請願，提出要求：（1）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2）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3）懲治貪官污吏；（4）把沙甸由「糧食隊」改為「蔬菜隊」。但所有要求不但遭到拒絕，而且還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大

帽子。

此時，雞街公社「民兵指揮部」製造突然事件，抓捕了兩個回民，引起了沙旬回民的激烈抗議，遂演變為武鬥流血衝突。事態繼續擴大升級，造成了滇南社會的動盪。

沙旬回民和中共當地政府的衝突給中共高層帶來了震動，一九七四年秋，康生、江青、王洪文、謝富治、張春橋等人電告雲南省革委會，要求沙旬回民派代表赴京。當時沙旬回民接到這一消息後，欣喜萬分，以為他們的問題將有望解決。於是沙旬回民選派了數名代表上京。

在北京期間，上述數位中共高層人物，也確實接見了他們，但對他們的要求，卻沒有絲毫讓步，並威脅沙旬回民。回去要立即停止活動，否則就要「平叛」。

帶著滿腔希望的回民代表，如同當頭潑了冰水，使他們絕望至極。他們回到沙旬，沙旬回民均感天理不公，決心堅持他們的合理要求，為自身權利抗爭到底。

出動上萬兵力與炮兵炸毀沙旬，死人逾千

一九七五年春，解放軍開始「平叛」。

參加這次「平叛」的至少有五個師級單位，兵力不下一萬人。

他們最初和北京屠殺採取的手法一樣，由一團副參謀長率領一排戰士，於深夜偷襲該村「回民指揮部」，他們的目的是「擒賊擒王」，力圖以最小的損失將沙旬平息，但天不從人，該排兵力一進村就全部被俘虜。隨後部隊改為強攻。但一個小小的沙旬，由於民心一致，竟和部隊對抗了四天，都沒被打進去。

據說當時中共一個副總參謀長大發雷霆，罵昆明軍區「飯桶！」「難道打一個小小的沙旬，還要總參謀長來親自指揮？」最後，部隊採用先砲轟再出擊的辦法。可憐一個小小的沙旬村，在大砲的轟擊下，血肉橫飛，牆傾屋摧，沙旬村除西南一角房屋小有保存外，其餘全部被炸成廢墟，解放軍遂乘此勢進入沙旬，部隊進村後，見人就殺，不管是老人、婦女、小孩，無一倖免。由回民領袖馬伯華率領的一百餘回民青年，均被用機槍一排掃死在田畦之上。

當時還允許醫務人員搶救傷員，那些受傷回民，在被送往蒙自縣醫院的途中，哭得呼天搶地，其狀慘不忍睹。

這次屠村，真正死了多少人，當然是絕密的。但據當時的情景估計，不下千人，而傷者更難以計數。據一位目擊者，在「平叛」結束不久，曾進入該村，只是殘牆頹垣，時有被炸斷的人手和腿散棄其中，空氣中還瀰漫著一股濃烈屍體臭味。

為了給中共軍隊屠殺沙旬回民一個「合理」的藉口，中共當地政府採取了一小撮（注意，和北京六四屠殺的提法一樣，又是「一小撮」）罪行展覽，展覽了很多「實物」，指控馬伯華等企圖在沙旬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罪證包括有「國旗」、「文件」等等，另外就是馬伯華等人殺害解放軍的兇器。其中甚至有迫擊砲、機關槍等武器。

多年以後，「四人幫」垮台，這個「展覽會」的實情才逐漸暴露出來。原來，那些實物不是假造的（如「伊斯蘭國旗」、「文件」），就是「借」來的（如那些輕重武器）。他們弄虛作假，無非是要達到栽贓和洗刷罪名的目的。

沙旬「事件」在「四人幫」垮台後也被「平反」。中共當局把責任全數推到了「四人幫」

附表

身上，說是他們幹的。事實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沙甸村至今還是女多男少，有一個縫紉小組人們叫它「寡婦組」，四十多個婦女，男的都在那次「平叛」中被軍隊打死了。

（本文原載《探索》雜誌，一九九三年）

文化大革命七大慘案一覽表

| 事件 | 大興縣慘案 | 青海 223 事件 | 內人黨 大血案 |
|-----------|------------------------------------|--|-------------------------------------|
| 時間 | 1966 年 8月26日至9月1日 | 1967 年 2月23 日 | 1967 年 11 月至 1969 年 5 月 |
| 地區 | 北京市郊大興縣 13個公社，48個 大隊 | 青海省西寧市 | 內蒙古自治區 七盟二市 |
| 起因 | 北京紅八月恐怖， 公安部長謝富治 8月26日講話 | 1967 年 1 月 28 日中 央軍委八條命令， 支持軍隊鎮壓右派 | 1966 年 7 月中共中央 批判烏蘭夫，定性為 三反份子 |
| 死亡 人數 | 325 人 | 169 人 | 官方數字 16222 人 民間數字超過 5 萬人 |
| 受害者 背景 | 地富份子及黑五類 22 戶被殺絕 | 青海 818 造反派 | 中共黨員、幹部、 知識份子、牧民 |
| 負責人 | 公安系統領導、公 社主任高福興、團 委書記胡德福 | 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 | 區革委會主任滕海清 及吳濤、高錦明、權 星垣 |
| 善後 處理 | 為受害者落實政策。 高福興、胡德福等四 人被判刑 8 年 | 1967 年 3 月 24 日 周恩來為 818 派平反 、逮捕趙永夫。文革 後，趙永夫獲平反 | 全案平反。滕海清為 鄧小平庇護，升官 |

(根據本書資料)

(製表：金鐘)

| 道縣大屠殺 | 賓陽慘案 | 廣西 422 慘案 | 沙甸事件 |
|---|-------------------------------------|--|-------------------|
| 1967 年 8月13日至10月17日 | 1968 年 7月29日至8月2日 | 1968 年 7月起至8月8日 | 1975 年春 |
| 湖南省道縣， 波及鄰近地區 | 廣西省賓陽縣 | 廣西省南寧等 地縣城市 | 雲南省蒙自縣 雞街公社沙甸村 |
| 兩派武鬥，保守派 誣稱階級敵人翻天 ，道縣領導小組八 五會議 | 貫徹中央七三佈告 | 貫徹中央七三佈 告，七二四佈告 抓反共救國團， 軍隊支持聯指派 | 炮派被壓， 回民不滿。 |
| 地區 9093 人 (道縣 4519 人) | 3883 人 176 戶被殺絕 | 近 10 萬人 | 超過 1000 人 |
| 四類份子及家屬 造反派 | 四類份子及 23 種人 | 442 造反派 | 回族村民 |
| 縣人武部政委劉世斌 及區人武部長關有志 ，公社、生產大隊黨 委書記、貧協主席 | 縣革委會主任， 6949 部隊副師長 王建勳 | 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 ，中央一致支持鎮壓 | 解放軍 5 師兵力 |
| 被害者平反。千餘 名黨政幹部受處分 ，數十人判刑。遺 屬賠償 | 1983 年全部平反昭 雪。王建勳升廣州 軍區警備區副司令 | 反共救國團平反， 442 落實政策。韋國 清升官，至解放軍總 政主任、人大副委員 長 | 文革後平反 |

出版後記

文革屠殺事件的特徵

◎ 金鐘

去

年第三季度，《開放雜誌》連載「湖南道縣大屠殺」時，就有讀者以其震撼性，建議我們出版單行本。因為發生美國九一一事件，連載至十二月才刊完。接著，今年春天，美國狄金森學院研究文革史的知名學者宋永毅先生，正在編輯一本文革中若干著名慘案的文集，包括道縣大屠殺在內，並有意交開放雜誌社出版，我們欣然同意。這樣一本書，就會比單個事件更豐富、更有力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經過三個多月的編輯、整理與核實資料，包括一些朋友的協助支持，這本書終於竣稿，並邀請北京新聞界前輩胡績偉先生和中國社科院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先生作序。

在付印之前，我們覺得有必要對「文革大屠殺」這個命題作若干說明。

毛澤東發動和掌控的「文化大革命」，從一九六六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年間貫穿著殘酷暴戾的清洗和殺戮。關於文革死亡人數的研究，除留美學者丁抒先生發表在開放雜誌一九九九年的一篇文章《兩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死亡人數統計》外，迄今沒有見到更權威的研究成果，中共官方據說有一百多萬「非正常死亡」的內部說法，迄今亦未獲證實。

經歷過文革的人記憶猶新，和大躍進餓殍遍野相反，死人集中在全國大中小城市。批鬥、逼供、監禁、勞改、武鬥中折磨、處決、毆打、自殺等方式致死，遍佈神州大地。受害者的遭遇及其規模，已經相當廣泛地記錄在中國官方文件、出版物、傳媒及傷痕文學一類文藝作品中，雖然現在已越來越難得見到這種記錄。但是，如本書所載，發生在文革中的具有大屠殺性質的重大慘案，卻是當局迄今諱莫如深的，包括文革結束後的一段言論比較開放時期，都嚴禁報導與出版。

以本書所載之道縣大屠殺、大興縣慘案、廣西四二二慘案和賓陽慘案、青海二二三事件、沙甸事件及內人黨大血案來看（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血案是一個家庭的遭遇，但反映了北京六六年紅八月的恐怖暴行），文革中這類屠殺事件與文革一般整肅運動相比，呈現如下特徵：

一、時間短促而集中。除內人黨血案延續一年半（是一般運動的極端擴大化）之外，多數慘案不超過兩個月（如道縣、廣西四二二案），賓陽縣、大興縣、沙甸村及青海二二三事件，都發生在幾天之內。在極短的時間裡，大規模殺人，有的地點一天殺一百多人。完全構成「集體屠殺」性質，為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所僅見。

二、殺人方式極其野蠻。如道縣、賓陽縣、大興縣、內人黨、四二二諸案，都是私刑、酷刑和暴民逞兇的性質，沒有任何執法形式。刀砍、棒擊、繩勒、石砸、火炙、水溺、姦殺、投井、肢解、砍頭……無所不用其極，內蒙古有二十六刑，「幾百種超法西斯」刑求手段，廣西甚至將「階級敵人」打死後，剝皮烹食。道縣則有「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亦夾雜暴力逼供信，但都沒有這些慘案施暴的肆無忌憚與瘋狂。

三、官方煽動與操縱。正如宋永毅先生在前言中所指，文革大屠殺各案「是國家機器行為與暴民政治的有機結合」。雖然有暴民政治的社會基礎，但無當局的蠱惑煽動乃至直接操縱，不可能在一個嚴密控制的極權制度下發生如此嚴重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大興縣在公安部長謝富治打死壞人不要管的講話後開始殺人；青海趙永夫在中央軍委鎮壓右派的命令下向「八一八」開刀；廣西的慘案更是發生在中央專門針對廣西下達的「七三佈告」後，以貫徹七三佈告之名鎮壓造反派；廣西、青海、沙甸諸案甚至是解放軍武裝上陣充當劊子手；規模遍及湖南數縣的

道縣事件，則是在縣、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門鼓勵策劃下殺人。

四、實行階級滅絕政策。由於毛澤東一意孤行，長期肆意歪曲並強制灌輸階級鬥爭理論，不僅使血統論、出身論成為專政、暴力、批鬥和殺戮的依據與基礎，在文革中製造無數冤假錯案，而且，使身處廣大農村最底層的早已被剝奪基本人權的「四類份子」，成為文革暴行中無端的犧牲品。尤其道縣，賓陽、大興縣諸案最為悲慘，很多安分守己的前地富份子或國民黨政府人員連他們的家屬都遭到突襲式殺戮，甚至一家殺絕，老少婦孺皆不能倖免。在廣西四二二這個犧牲最重的大慘案中，背景之一是四二二派中有不少「出身不好」的成員，一直被韋國清當局視為「牛鬼蛇神翻天」，鎮壓也受到周恩來為首的中央支持，以至文革後雖然上訴叫冤如潮，但平反阻力甚大。

五、捏造罪名。所有屠殺事件，都有殺人的莫須有罪名，如內蒙的「內人黨」、廣西的「反共救國團」、沙甸的「伊斯蘭共和國」、道縣的「殺貧下中農」，聳人聽聞，毫無證據，嚴刑逼供，不惜以此大開殺戒。文革後被全部推翻。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司空見慣，但以捏造罪名隨意展開一場大屠殺卻屬罕見。

六、血流成河，無人負責。本書所列七大慘案，受害者幾乎都在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或給予一定的賠償（少得可憐，如道縣一家五口被殺，物件搶光，遺屬僅獲賠六百八十元）。在追究責任方面，中共高層的政策是抓小放大。如道縣事件，一九八四年「處理遺留問題」時，獲判刑的都是縣以下的社隊幹部，一名殺人數十名的大隊貧協主席劉代修只判刑十年。而所有慘案的高級負責人，如內蒙的滕海清、廣西的韋國清、王建勳都被庇護下來，並升官重用，韋

MASSACR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Song Yongyi
P.O. Box 31429, Causeway Bay,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July 200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開放叢書

文革大屠殺

| | |
|------|---------------------------------------|
| 主編 | 宋永毅 |
| 出版 | 開放雜誌社 |
| 總編輯 | 金鐘 執行編輯 蔡詠梅 |
| 美術設計 | Catherine Hoo |
| 地址 | 香港軒尼詩道 402 號德興大廈 603 室 |
| 電話 | (852) 2893 9147 (852) 2893 9197 |
| 傳真 | (852) 2891 5591 |
| 電子郵箱 | open@open.com.hk |
| 網址 | http://www.open.com.hk |
| 通訊處 | 香港銅鑼灣郵箱 31429 號 |
| 總經銷 | 田園書屋 |
| | 電話 (852) 2385 8031 傳真 (852) 2770 2484 |
| 承印 | 藝城印刷公司 |
| | 電話 (852) 2897 1089 傳真 (852) 2558 2439 |
| 出版日期 | 2002 年 7 月初版 第 1 次印刷 |
| 定價 | 70 港元 |
| 國際書號 | 962-7934-09-7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滕二人更獲鄧小平親自保護，連一點反省也未見到。韋受鄧小平支持，使沉冤如山的四二二案，在政治上一直翻不了身。中共當局出於保毛的戰略需要，對文革的犯罪行為皆冠以「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時期，受極左思想影響」所致的遁詞。事實上，毛的影響不僅在階級鬥爭這些大理論上，在具體政策方針上，往往也是一言而為天下法，致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如廣西殺「反共救國團」，就是在毛一句「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鬥爭的繼續」下進行，無法無天，打殺一大片。軍隊也是殺人犯的庇護者，文革後賓陽縣委以黨的名義起訴王建勳，迄無下文，王在廣州軍區庇護下，逍遙至今。而曾被關押的青海屠夫趙永夫，後來竟也獲平反，因為他的後台是軍內文革組長徐向前元帥。因此，道縣大屠殺的作者，沉痛地寫道：「不知道哪一天能夠客觀地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兇，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可恥、最殘暴也是最荒謬的十年。揭露這黑暗中最恐怖的一頁：文革大屠殺的真相，是本書編者和諸位作者對中國未來進步的莫大貢獻，本社負責出版，也感到一份榮幸。文革的大屠殺事件應不止書中所列幾例，專家學者們必會加以補充。

本書各篇資料充實，大多是作者參與「落實政策」或實地調查所得，不少資料來自於各地政府在文革後修編的地方誌，如有不實之處，也請讀者指正。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歷史的真實將不斷地顯現出來。